

#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②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③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④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⑤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⑥ 中国市场名城
- ⑦ 中国地热城
- ⑧ 中国书法名城
- ⑨ 国家园林城市
- ⑩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⑪ 国家卫生城市
- ⑫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⑬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 目 录

## 【本期特载】

罗炳辉在鲁南（下） 阿都嘎 04

## 【峥嵘岁月】

战争年代山东党的交通工作回忆（三） 白焕文 11

孟良崮战役中的无线电对抗 斯 简 17

铁军大帐追歌行（十三）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24

## 【名人素描】

王远知年谱 蓬莱外史 31

程照轩：岁月峥嵘 功绩卓著（下） 方继礼 35

## 【文化掇英】

转变中的山东教育 孙陶林 41

王嘉麟重赴鹿鸣筵 平 凡 44

## 【探索发现】

爆破英雄刘厥兰 高 雷 46

## 【史海撷萃】

曹嵩之死系列考据（下） 臭咸鱼 51

## 【蒙山沂水】

和尚与龙头 李存修 55

大美新临沂之——沭河 本 编 57

## 【诗画赏析】

沂南“曹嵩冢”画像石考辨 吕宜乐 59

起航新时代 唱响“好地方”

——关于歌曲《沂蒙山区好地方》的一段往事 王 滨 61

## 【文史论坛】

由石邦杰其人谈现代史料的去伪存真问题

刘 开 63

## 【百家渊流】

琅琊诸葛氏由来及谱系概说（下） 葛成民 葛厚竹 66

## 【文明之星】

邱峰：从“师傅”至“师父” 叶 婧 70

## 【沂蒙名医】

当今之“送子观音”

——记张凌翔 刘凤才 73

## 【史志动态】

80

封面：沭河

（详见本期《大美新临沂之——沭河》）

封底：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

选自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谋攻篇》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临沂市史志系统内部

# 罗炳辉在鲁南 (下)

阿都嘎



罗炳辉一家在临沂县东北园

## 三、最后献礼

由于罗炳辉的身体状况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不太好，不适宜担负紧张、繁重的第一线指挥任务，陈毅、张云逸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他的工作问题。其实，早在罗炳辉率第五旅北上行至淮北宿迁之时，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即于1945年10月13日致电陈毅：“因罗近来身体多病，不宜担任紧张繁重工作，将来二师（即第二纵队）以四、五旅和四师一个旅组织之，由韦国清任师长，罗拟调山东华东局任军区或其他对他健康较适当的工作为宜，请你考虑决定。”接到张云逸等的电报，陈毅、黎玉进行了认真研究，于10月31日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罗炳辉同志仍须在前线工作，顾及其身体，可否以之任鲁南野战军副司令兼二纵队司令，以便使五、九两旅能逐渐以韦国清为中心。”1946年3月30日，陈毅、张云逸经过反复研究后致电刘少奇：“现第二纵队已由韦国清代理，今后培养韦作二纵的中心，罗不宜回去。因此，考虑罗的工作，提任华中军区副司令为宜。罗因气候关系，亦愿回华中。同时，如留山

东，在我们附近则更好照料，能否提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另外，宜派其参加国大，并于将来取得国军军职。前山东国大名额较少，不及列入，可否由中央名额设法？以上是我俩意见，特请示你，希见复。”4月4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东局：“同意以罗炳辉为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但罗不必参加国大。”这样，罗炳辉出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此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企图日渐明显，解放区应对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的战备任务愈益紧迫，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及山东野战军领导人多不在位。其中，饶漱石、陈士榘和宋时轮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张云逸、黎玉赴延安参加会议未归。陈毅主持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全盘工作，还要经常接待北平军调部及驻徐州、枣庄、济南等地的三人小组代表，进行政治外交斗争，公务繁忙。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罗炳辉不顾自己大病初愈、身体虚弱，毅然结束休养，主动请缨。

罗炳辉以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身份首次公开出现，是在临沂参加山东解放区军民举行的悼念“四八”烈士的纪念活动。这年4月8日，参加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罗炳辉惊闻噩耗，悲痛万分。4月19日，山东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代表万余人，在临沂大众剧场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大会。大会由陈毅主祭，罗炳辉、舒同等陪祭。

4月27日，罗炳辉奉命率山东野战军南线指挥部人员一部，前往鲁南前线视察部队，检查备战工作。此后一段时间，罗炳辉或乘卡车、或骑战马、或坐民船，对第二纵队、第七师、第八师部队逐旅、逐团视察，连续奔波，风雨无阻，跑遍了团以上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已将远离前线的部队主力秘密运送到解放区边缘的战略要地。就华东地区来说，1月份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全部兵力是17个正规军47个师，但在停战后的半年中又陆续增调了6个军19个师，在华东解放区及其周围布下的兵力达23个军63个师，约52万人。同时，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和改编伪军，使之充当发动内战的马前卒。其间，为扩大占领区和进攻基地，国民党军有计划、逐步地向山东、苏皖解放区发动“蚕食”袭扰行动达977次，侵占解放区城镇村庄400余处。

面对这种情势，中共中央于5月28日电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要求对敌人的进攻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采取惩罚行动。其中指出：对山东枣庄伪军的进攻，可向军调部提出抗议，要求解散伪军，否则即打击之。5月31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华东局等：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据此，陈毅决心抓住国民党军向华中第四分区（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开始动手的时机，在山东选定罪恶累累、人心痛恨的伪军为作战对象，发起讨逆作战。这样，既能打击敌人，又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

5月31日，罗炳辉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电话通知，于当晚8时返回临沂，向陈毅汇报情况。当夜12时，他终于回到离开将近1个月的家里。第二天一早，罗炳辉又要与家人分别了。临行前，他自知身体不支，便郑重地告诉张明秀：“我受党长期的培养和爱护，这次重上前线是为党和人民捐躯，也是完全值得的……我毕生没有打过败仗，在我牺牲前，我还要再打一个胜仗，作为我对党的最后一次献礼。”同时，他有些依依不舍，关照张明秀要照顾好孩子，保重好身体。孩子们看到爸爸要走，都哭了起来。罗炳辉深情地对孩子们说：不能用眼泪给爸爸告别，要学得坚强些，今后的生活道路，还得靠你们自己去闯。他说完，摸了摸镇涛的头，吻了吻新安、鲁安的小脸，然后登上战马，前往军部。



6月1—5日，军部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讨论鲁南、华中等地的作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部分领导，山东野战军及所属各纵队、师的领导，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等，陈毅主持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会议决定在山东地区分别向德州、泰安、大汶口、枣庄、周村及胶济铁路东段的伪军发起讨逆作战，并研究了有关作战部署。5日晚饭后，罗炳辉由军部乘卡车，直接赶往峰县前线指挥部，具体布置作战事宜。

6月6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人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罗炳辉、袁仲贤联署发出了作战命令，指出：“自我忍让撤出长春后，国民党仍在东北扩大战争，并在华中华北积极准备向我大举进攻，特别最近国民党集中4个师的兵力进占我淮南路西的解放区，与杀伤我枣庄代表，如不给以有力的报复，则不能停止顽军的进攻。”“我为自卫作战，决先机解决山东境内顽方孤立据点，求得主力能集中机动，以便于迎击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并对各部具体任务区分进行了部署。

根据军部统一部署，罗炳辉负责指挥对鲁南枣庄地区王继美部的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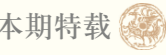
枣庄号称山东第一大庄，是鲁南历史悠久的煤城，位于徐州东北75公里处，是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上的要点。它北指群山，东逼平原，既是徐州外围重要据点，又是挺进山东腹地的前进基地。当时盘踞这一地区的是王继美部。该部原为伪军保安大队，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枣庄矿区守备队，共4000余人，并派第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纲指挥。在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前，该部正猬集于中兴煤矿公司南大井据点，而被由华中皖江地区北调的新四军第7师部队紧紧包围。

6月7日，由罗炳辉、舒同、袁仲贤组成的山东野战军南线指挥部向山东野战军、山东军区报告了夺取枣庄的作战部署，主要内容是：①增调第八师第二十二团1个营配攻枣庄作战，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第六十一团离枣归建。第八师第二十四团仍在西仓黄店不动，师直率第二十二团主力进至明爱庄。以第七师主力待机准备临城可能东援之敌，遗防由鲁南军区特务团接替。②担任包围临城与打击临城东援任务部队，统由谭希林指挥，攻夺部队由曾希圣、王吉文指挥。③第二纵队（第四、第五、第九旅）、警卫第九旅第一步作战任务与布置不变。④决心于9日晚开始对枣庄攻击。同日，罗炳辉来到枣庄，召开了由第七师、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及鲁南军区第二十六旅第六十一团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检查了各部队战斗准备情况，讨论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6月9日晚19时，在罗炳辉的统一指挥下，各参战部队同时向枣庄王继美部盘踞的据点发起攻击。由于守军炮火猛烈，爆破组牺牲数名战士才接近城墙，实施爆破。第八师的部队首先突入，第七师部队接着也打了进去。经过数次冲锋与反冲锋，王部经不住猛烈打击，听到枪声纷纷缴械投降。王继美率残部向南突围，途中被第七师第十九旅截歼，王继美当场被击毙。至翌日晨5时，全歼当地伪军4000余人，其中俘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纲、专员鲍国良以下官兵3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286支、重机枪95挺、各种炮15门、汽车5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大批。而国民党方面未料到王继美部这么快即被全歼，还于6月10日上午接连两次派飞机来空投弹药，均为山东野战军所“接收”。

王继美部被全歼，枣庄的解放，给了蠢蠢欲动的国民党军以当头一棒，使枣庄当地10万矿工居民重见天日。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罗炳辉并没有放松警惕，更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认为以后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做好迎击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6月14日，他就当时国内形势和解散伪军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他指出：“和平、民主与团结为我党中央在和平建设期间始终不变的总方针。这次枣庄伪军王继美被我解除



武装，纯系自食其果。”他同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也可能以此为借口向我进攻。所以我解放区军民必需百倍警惕，注视反动派的动态，准备好自己的力量，为保卫解放区、保卫和平奋斗到底。

枣庄战斗胜利结束后，罗炳辉根据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决定，亲临第二纵队第五旅部队驻地，动员和组织该部的南下工作。第五旅的前身是他亲自组建并带领出来的新四军原第五支队，他曾经为这支部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支部队的成长也打下了他深深的印记。6月12日，是第五旅奉命启程的日子。罗炳辉专门来到该旅旅部，为自己的老部队送行，并带来鲁南军区、鲁南行署及第3军分区筹集的30万元慰劳费。他在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告别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时局特点，明确了任务要求，提出了殷切期望，也流露出无比的眷恋之情。之后，在罗炳辉的深情目光中，成钧、赵启民率领第五旅全体指战员向南进发。

连续的奔波，紧张的战斗，精心的操劳，使罗炳辉原有病症不时发作。6月13日，在峰县前线指挥部，罗炳辉又一次感到头痛、头晕，连6月5日在临沂时因头晕跌倒而致的扭伤也更加严重。医生为此给他注射了3针药剂，仍无效果。此时，罗炳辉不由地想起正在临沂的娇妻爱子，便提笔倾诉牵挂之情：

明秀同志：

今天才知你们移住鹿头，前封信不知收到否？如未收到，请追问，因附有在延安时我给镇涛的一封信。我现有一信给镇涛，我的情形在信上说明了，其他一切均好，你们都好吗？新安这一次怎样？讲了什么话？鲁安更好玩了，我均很想念。镇涛接到我那封信的真实情形怎样？我估计是可能令她醒觉起来，真是有好处，最差的可能是恶转为更加糊涂，我总的愿望是要把她挽救回来，真心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女革命家，可是总只是我的乐观愿望而已，因她中毒太深，光明认为黑暗，可耻认为了不得的光荣。这一鸿沟距离太深之故，如能有希望好转，前封信是重要关键，你当能煞费苦心的帮助爱护她的进步，可是人心、人肝各人带，究竟她是否能懂人事呢？她这人总是聪明，可是完全糊涂的聪明，如是清醒的聪明，就易解决了。因是我的女儿，我不得不负我父亲的责任，不愿看着她坠落到粪坑里去，你当然自始至终均是同我一样的意愿在挽救她，我们共产党员对整个人民成千成万的都要教育好的责任，难道自己一个女儿不能把她教育好？心里总是不安的。可是你的苦心总是真诚，迟早可感化顽石的。她看了我的信的真实的情形，盼详告我。母亲的信和照片寄去否，我很挂念，确实对不起年老的母亲，割心割肝的在想念她的女儿，这我又要承认我也有错，前次带来的信，同样拖了几天才让人带出去。秀，你对我是特别照料关心，可是对母亲的安慰信写的太少。详情再谈。

致

全家安康礼！

炳辉

1946年6月13日

于峰县

在这以后的几天，罗炳辉还强撑着病重的身体，召集第七、第八师等部队领导研究了枣庄的善后工作，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就鲁南战备工作进行再深入研究。这时，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企图更加明显了，重兵云集，鲁南战事一触即发。6月17日，罗炳辉派宋时轮赴临沂向陈毅军长汇报敌情，听取指示。这是他生前进行的最后工作。

6月18日后，血压很高的罗炳辉又患了急性肠胃炎，并发烧不止，时常昏迷。可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立刻询问：有什么电报来没有？前线有什么消息？

19日，陈毅闻讯，从临沂赶来，守护在病榻边。

20日，罗炳辉腰部、头部疼痛难忍，甚至痛得在床上打滚。

由于前线医疗条件简陋，医生建议送临沂治疗。但罗炳辉不同意，说大规模内战就要爆发，自己不能离开前线。陈毅动员他说：你就安心回临沂治疗吧，前线有我和其他同志。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把病治好，你才能重返前线。我们等着你尽快康复的消息。罗炳辉这才同意。

6月21日早饭后，罗炳辉由峯县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乘一辆大卡车启程赴临沂。他躺在担架上，时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韦国清、山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凯和医护人员、警卫人员随车护送。

当天，烈日炎炎，热浪滚滚。卡车在崎岖坎坷的公路上缓慢地爬行着。为了防晒，卡车棚杆上罩上了油布，反而更使车厢内不易透风，如坐蒸笼。罗炳辉汗如雨下，难受至极。下午3时，当卡车行至兰陵时，他让停车休息，并吩咐警卫员去买东西给大家吃。

就在这时，罗炳辉的病情突然恶化，昏迷不醒。同行人员立即把罗炳辉抬到兰陵镇进行急救。警卫员急忙跑到当地长途电话站，通过总机，向在峯县前线指挥部的陈毅报告情况。陈毅在电话中指示继续抢救，随即带着指挥部及第二纵队的领导同志，乘车向兰陵镇赶来。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官乃泉闻讯后带病从临沂骑着摩托车赶到兰陵参加抢救。但罗炳辉已经呼吸困难，处于弥留之际。

1946年6月21日下午5时，罗炳辉那颗对革命事业炽热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时年49岁。

#### 四、名垂青史

将星陨落，三军恸哭，万众哀悼。

罗炳辉逝世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临沂。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参议会于6月21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发出讣告，沉痛宣告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病逝。讣告指出：罗炳辉同志“毕生保国保民，功业永垂不朽”，他的病逝“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极大损失”。

6月22日凌晨，罗炳辉的遗体运抵临沂城，停放在文庙已经布置就绪的灵堂。山东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指战员和各界民众惊闻噩耗，纷纷前往吊唁。一时间，临沂城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当天上午，陈毅等陪同张明秀及大女儿罗镇涛、儿子罗新安、小女儿罗鲁安来到灵前。张明秀望着罗炳辉的遗容，想到从此自己将失去志同道合的战友和伴侣，孩子们也将失去亲爱的父亲，顿时泪如雨下，痛不欲生。

由于正值盛夏季节，罗炳辉的遗体不便保存，故在运抵临沂的当天下午4时，即装棺入殓。陈毅在入殓仪式上致哀词说：“我们与罗炳辉同志多年一块作战，现在却只能瞻仰遗容，这是我们最大的悲痛……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紧张局势之下，使我们更加沉痛。但我们应在最悲痛时也不消极，将教育我们对法西斯反动派更加仇恨。”“他的死是一个号召，号召山东全体军民起来继承遗志，实行严正的自卫！”陈毅最后在灵前宣誓：“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一定去完成！”

6月23日，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山东军区司令部及罗炳辉家属发来电。电文如下：

中共华东中央局、山东军区司令部并转罗炳辉同志夫人张明秀同志和罗炳辉同志



女儿罗镇涛女士：

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的病故，是我党我军与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炳辉同志早岁加入滇军，参与护国、北伐等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战争中，又于1929年冬领导江西吉安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懈。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四军第二师奋战皖东敌后，创造皖东解放区，立功尤著。中共中央谨以悲痛的心情哀悼他的逝世，并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六月二十三日

同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讣告，指出：“罗将军系华东解放区名将之一，抗战八年中，率领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军民，坚持敌后抗战，打击敌伪，创造了淮南根据地，保卫了华东解放区，功绩卓著。”

6月23日下午5时，临沂城上空，风沙弥漫，哀乐低回。新四军军部暨山东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及各界民众10万余人，隆重集会悼念罗炳辉，并举行安葬仪式。罗炳辉棺木装在卡车上，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舒同执绋前导，各机关领导同志迈着沉重的步伐，沿沂河河畔缓缓向烈士塔墓地前进，不时为沿途路祭而停步。整个送葬队伍长达数华里。各机关、部队、团体和市民代表分列两旁，向灵车默哀、致敬。到达烈士塔墓地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门内举行最后一次路祭。安葬仪式开始了，哀乐悲鸣，全体肃立，张明秀和孩子们已是泣不成声。当警卫人员将棺木抬入墓穴后，陈毅、舒同和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郭子化、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将一幅绣有“中共”黄色大字的红旗，覆盖在罗炳辉的灵柩上。

陈毅在墓前发表了演说。他那浑厚的四川口音饱含着悲痛，更充满着力量。他说：“当我们与罗副军长永别的时候，我代表中共华东局暨山东八路军、新四军的全体指战员，向他致以沉痛与崇高的革命敬礼！”

陈毅最后庄重宣誓：“罗炳辉同志，您好好的安息吧！我们今天在你墓前宣誓，在你遗像前许愿，值此内战威胁极端严重之际，我们誓必以胜利地保卫和平，来纪念你。同志们！全中国的和平进行了数月谈判，现在证明我们人民的和平不能由反动派

恩赐，反动派也绝无诚意放下他对中国人民的鞭子。我们不能向人乞求和平，恩赐和平。我们只好准备好自己的自卫力量，如果反动派敢于进攻我们，一定要将他击退！让我们在取得和平民主的最后胜利时，再为罗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罗炳辉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各解放区一片震惊，人们以不同方式哀悼着。延安《解放日报》在6月24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罗炳辉病逝的消息和中共中央的唁电，以及罗炳辉传略；在29日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陈毅在罗炳辉墓前的演说；在这前后几天，还连续报道了山东和苏皖边区悼念活动的情况。

6月25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出唁电：“惊悉罗炳辉同志病逝，无限悲痛。时局方艰，递失名将，不仅为我军之重大损失，抑亦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炳辉同志生前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与伟大的战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钦敬，我们党为实现炳辉同志遗志而继续奋斗！”

同日，聂荣臻、罗瑞卿、肖克、刘澜涛发出唁电：“罗炳辉同志逝世，痛心曷其益感，我党我军与人民损失之大，唯有朝夕激励，坚持奋斗，以继死者之志。”

这一天，中共四川省委也发出唁电：“今倭寇虽除，而和平民主平等自由尚待争取，炳辉同志突告病故，此乃我党我军与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

淮南地区是罗炳辉曾经长期战斗过的地方，淮南人民对罗炳辉怀有深厚的感情。6月29日，苏皖边区政府发布政令：为纪念罗副军长建立淮南解放区之功绩，特令将淮南路东之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1960年恢复原县名），并于该县建立纪念碑，永志不忘。

7月5日，张云逸、黎玉由延安回到临沂。此前因在途中，未能将毛泽东、朱德给罗炳辉的亲笔信及时带到，也未能赶上参加这位老战友的追悼活动，甚感遗憾。这时，国民党军已对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罗炳辉的夫人张明秀及子女要撤离临沂，张云逸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依然陪同她们专程给罗炳辉扫墓。

1947年1月下旬，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第八十三师等部攻占临沂。之后，国民党军为了泄愤，竟惨无人道地掘开罗炳辉的陵墓，将他的遗体挖出来，用绳子倒吊在树上，刀刺枪打，百般凌辱。家住临沂东关的渔民卢建功等，冒着生命危险，两次保护罗炳辉的遗体，最终趁夜悄悄把罗炳辉的遗体掩埋在沂河沙滩上，使国民党军再也无法找到。

全国解放后，张明秀写信给陈毅和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寻找罗炳辉的遗体，并重新安葬。当地人民政府派出专人，在卢建功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罗炳辉的遗体，重新举行了安葬仪式。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提议，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临沂建立大型革命烈士陵园。陈毅曾亲赴临沂指导陵园的建设。1950年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罗炳辉的遗骨迁葬于陵园内。从此，他就长眠在这里。

罗炳辉陵墓高11米，系直线四角塔型构筑，下为墓台，上为碑亭。碑亭饰有红星嘉禾浮雕，顶缀罗炳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获勋章造型。碑亭大小12面，分别镶嵌着墓碑。正面东侧是朱德题词：“革命到底死而后已，精神不死万古长青。”西侧是周恩来题词：“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不朽。”墓碑上还有刘少奇、任弼时、陈毅等的题词。刘少奇的题词是：“志在革命，功在人民。”任弼时的题词是：“永垂不朽。”陈毅的题词是：“为被压迫阶级争自由剧战久经到死不离民众，当反革命势力已陨灭丰碑特建勒铭永记殊勋。”

# 战争年代山东党的交通工作回忆 (三)

白焕文

## 我到战邮总局以后

中共山东分局决定邮、交、发三位一体一元化统一领导后，我于1943年4月份由分局组织部党内交通科调到山东战邮总局报到，驻地在莒南县的甘林村。赵局长很热情地接见了，并安排四个半天的时间听取了我关于党内交通工作情况的汇报。赵局长听完汇报后，既肯定了党内交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对如何建立秘密交通干线站谈得不够具体和突出。并告诉我遵照李部长的指示，仍做交通巡视员工作，让我多学习和熟悉一些情况，便于今后更好地做好战邮工作。

当时战邮总局的组织机构和主要干部配备是：战邮总局局长赵志刚（也是山东分局组织部党内交通科科长和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秘书科科长张善堂，交通科科长乔为中，邮务科科长李旦复，发行科科长刘砚田（后王冠杰），会计科科长李斌，邮报社宁世、于渤同志，还设有员、股、班等共有40余人。

邮交发三位一体统一领导的通信组织，从合并几个月的实践来看，它对党、政、军、民、学的通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也存在一些认识不一致的地方。山东分局的批评是，有些宗派情绪。为了求得思想认识一致，曾有省教育厅厅长孙陶林同志作过报告。有的同志起哄，不同意这种说法，后战邮总局、大众日报社召开了座谈会。针对存在的问题，又认真学习了整顿三风的23个文件，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的各大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四月底日程安排上，有一个下午专门座谈党内交通工作。赵志刚局长主持了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地点是在三界首南羽山的一个村子，参加会议的是各区党委及湖西地委派出的代表。赵局长讲了邮交发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强干线站的领导和做好发行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级党委的代表遵照分局的决定，将各级邮局领导健全起来。会上湖西地委代表说，交通畅通在我们地区太重要了，我们离上级



领导机关远，经政、伪、顽区多，但我们能较及时地收到文件、信、报，干部来往能顺利通过，这与交通员同志的辛苦努力和铁道游击队的大力协助以及鲁南地区的主动配合是分不开的。回去后要同晋冀鲁豫地区协商将通延安的干线加强起来。其他地区的代表也发了言。

不久，大众日报登载了各区党委书记写的文章，这证明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会议已圆满结束了。各代表也将交通座谈会的精神带回去，为开展好战邮工作打下了基础。六月，战邮总局组织了以杨易辰为组长，马瑛、白焕文参加的工作组，任务是对农村基层组织摸索开展发行工作的经验。探讨在报刊邮件投送站是以小学教师为主，还是以妇救会与识字班等为中心。选择的地点是在日照全县境内。

出发前，赵局长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提出了要求。发行科为我们印制好了调查用的表格。赵局长又把马瑛和我叫到一边交代说，杨易辰同志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李部长将他介绍到我们这里来帮助工作。虽然是个通信员，但身体不太好，在下去工作期间，多加关心和照顾他。

日照县邮局驻在巨峰一带，县邮局局长是牟乃渠同志。我们去后组织开会，请他介绍情况，参加工作组一起工作。他既不介绍工作情况，对参加工作组也不表态，我们当时还没有时间分析他的情绪，不参加工作组也就作罢。

约一个月紧张的工作，收获不小，了解了该县邮交发的全过程，并发现了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投送报刊信件直送到学校为好，附近村子的学生放学回家时带回去，这为乡邮交通员解决了大问题。我们把情况和意见向县局做了交代后，返回总局做了汇报。

我与马瑛同志接受了赵局长的另一项任务，是协助解决40岁的李旦复科长的婚姻问题。日照县安家大村的安老先生抗日有功，动员不少青年参加了革命工作。过去李旦复科长也受安先生的掩护。他有个女儿叫安巧云，尚未成婚，赵局长叫我们去说

媒。我和马瑛同志只有20多岁，从未办过这样的事。到了安家大村，一说竟成了，这件事在总局都传遍了。

战邮总局召开了一次县局长会议，滨海区邮局局长于淳、鲁中区郭克刚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赵局长主持会议，我为记录人员。这次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过去的工作，布置今后的任务。会议期间，遇到几个问题。杜宪章同志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占用时间较长；牟乃渠同志开会没有发言，也没有认真听。会后得知牟失踪了，后调孙炎同志任日照县邮局局长。

## 建立滨北区战邮局

1943年7月，调我到滨北区成立滨北区邮局，并任命我为滨北区邮局局长兼交通科长。临行前赵局长做了开展新区工作的指示，到分局组织部转组织介绍信时，李部长又与我谈了话。从谈话中得知组织部第二任干部科长李仲林同志已调滨北区任一地委书记了（原一任干部科长陈若克同志，是朱瑞政委爱人，在敌人扫荡沂蒙山区时牺牲）。

我来到滨北五莲山区的红凝子村，该村是当时地委军分区领导机关的驻地，见到了李仲林书记，将组织介绍信交给了他。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周子俊同志组织的发行站的基础上，滨北区邮局在小顾家沟村正式成立了。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如下：我担任局长兼交通科长，通信员崔亭义，收发员一人，发行科长周子俊，报刊邮件收发室四人，交通员12人，会计科副科长胡凯，司务长姓魏，炊事员5人。还有待分配人员李文轩、王俊峰等6人。滨北区邮局管辖县邮局：莒北县邮局局长解兰芍，诸城县邮局局长潘某某。五莲县是区邮局所在地，当时未成立县局。滨北区邮局管辖站：日北在街头设邮站，也叫军邮站，因万毅部队司令部驻地，站的负责人叫王玉林。

胶县南在羊山设党内交通站，该站是1942年分局组织部派张云鹏同志通过当地地下党组织设立的，原为分局组织部直属领导，主要是对青岛而设，滨北区邮局成立后归区邮局领导，站长张云鹏同志。

滨北武交队队长、指导员（可能是刘凤川或杨秀山）以及武交队员20余人，1943年9月成立时，直归滨北区邮局领导。到1944年夏，归滨北一军分区与滨北区邮局双层领导。滨北行政专员公署是1943年7月在石场村成立的，专员是崔介。专署成立后见报，这篇报道是领导让我写的，登在大众日报第一版。

我到滨北后深深感到，地委领导我们学习是抓得很紧的，每星期学习一次。我们这一小组组长是地委书记李仲林，成员有滨北军分区政委刘兴元，司令员梁兴初，还有我。第二组是崔介同志及群众团体，第三组是万毅等。

我到滨北工作一年后，深感工作担子重，给赵局长写了数封信，请求能派胜任的区局长来，自己只担任党内交通科长就行了。到1944年约8月份，调马生山同志（即马瑛）任区邮局局长，我任副局长兼党内交通科科长。自马局长来到后，工作很有起色，召开县局长、站长会议，开展“飞信活动”等，又成立秘书室，任命李文轩同志为秘书。

## 一次特别的任务

1944年10月间，总局指示叫我去胶东战邮管理局研究如何加强滨北区与胶东的南海区交通畅通事宜。我在一个晚上与武交队出发了。武交队长带领一个班武装走在前面，防备一旦有情况冲锋或断后。指导员带领两个班，也是武装整齐，每人背报刊

邮件，保持距离，跟在后边，如有情况可绕路转移到安全地带。秘密文件由指导员亲自携带，到达目的地后单独办理交接手续。

在张云鹏同志秘站的山下西边一个村子里，专为武交队设了个联络站，也叫情报站，来往都要经过该站了解一下敌情，喝点水再往前走。但这次因天阴得黑，走迷了路，从站西穿过去了。当走到胶济铁路不到20里的地方，靠一座不太高的山前一个村子里，住着的伪军与我们相遇，战斗打响了。我们紧急商议，回头走是不可能的，出不去敌占区就天亮了，还是按原分工办法行事。指导员和我带领两个背邮件的班，往东绕过山头，再往北急行，队长断后完成任务后也赶上了。敌人光喊“捉活的，不要跑掉一个土八路”，但不敢离开据点。我们急行军过了铁路，天就快亮了，又走了十余里安全到达了胶县邮局。

我在胶县邮局与武交队分手后，路经南海专区邮局，又经西海区邮局东行，到达了胶东区邮政管理局（驻地在东海专区的一个村，离万第12华里），见到了胶东管理局局长戴开文同志。说明了来意后，戴局长说他们正在攻打赵保元的据点万第，支前任务很繁重，等战役结束后再详细研究。

一周过去了，万第解放了。赵承先秘书带我们参观了刚打下来的万第现场。在庆祝万第战役大捷的日子里，戴局长与我研究了两个地区的通邮问题。但戴局长又向我提出了一个使我很感意外的问题，就是南海区邮局李永海局长要去受训学习，让我暂代该局局长职务，这样对我们两个地区通邮任务的加强是个积极因素。如我同意，他就报告赵志刚局长。我考虑后就答应了。

我在去南海区邮局的途中，又经过西海区邮局，为了交通干线上的问题，也必须与该区商议。西海区邮局局长是王敏同志，交通科科长王武夫同志。我们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导机关通胶东区领导机关的交通干线，改为到南海区再到滨北区，决议以后配备干线人员解决邮件多的转运问题。原来分局通往胶东区邮件路线是经鲁中区、泰山区、渤海区，经西海区到胶东区的领导机关。这条干线邮路虽是马蹄形，但过去起的作用很大。由于形势发展，这条邮线应改为副干线，不能取消。

我继续南去，来到了南海区邮局（驻平度县东仁兆村），当时区邮局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是：局长李永海，会计负责人谭某某，交通主要干事李守范，邮务业务负责人是个女同志，是王一民的爱人。管辖的县邮局有莱西、即墨、胶县、平度县邮局。

该区的环境比较恶化，敌人时常出动骚扰我根据地，抢老百姓的财物。我军民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村连村条条道路都挖了交通壕。根据地的村庄房屋内多半都挖有地下室，如有敌情，部队出动打击敌人，机关人员与老百姓大部分进入地下室。我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工作的。

1945年5月，李永海局长从胶东学习结业后回到了南海区，我就返回了滨北区邮局。在回程途中，经过张云鹏同志的秘站，因初次来到这里，在此住了两天，了解一下情况。羊山顶只有六个小村子，东西两端也只有羊肠小道，可上下山，其余是悬崖陡壁，无路通行。各村户户有自卫枪支弹药，外地人很少到山上来。张云鹏同志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分局与青岛白登彩（到青岛后化名刘汉东）秘密联系工作。

## 返回滨海后的变化

我回到滨北区邮局后不久，奉调滨海区邮政管理局任交通科长，驻地在莒南县的文家山后。这时战邮总局、滨海区邮政管理局、莒南县邮局都在一起办公，滨海区邮政管理局局长是王冠杰同志，莒南县邮局副局长彭建三同志。这时干部生活待遇分了

级别，科长以上干部配通信员一人，享受吃小灶饭的待遇，每人每月发大鸡牌香烟三条，行政级别为县团级，生活待遇只要县长、团长能享受到的，我们都享受到了。

1945年的下半年，根据形势的发展，战邮总局、滨海区邮管局、莒南县局又分开办公。这时调杜宪章同志带领20名女同志到许口庄成立了一处工厂，归滨海区邮管局领导。还在十字路设立了一家照相馆。分开办公后，发行、邮政业务归滨海邮管局负责，总局是全省邮政行政领导机构。因此滨海邮管局人员及交通工具配备了许多，大飞轮自行车13辆，其中一辆是交通科长的，有时科长也出发送报刊邮件。干线骡驮班配四匹骡子，班长是葛春亭，交通干事赵建章、杨风玉二同志。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了。我军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部队整编为解放军，勇猛向各城市进军，后方所有的机关团体一切为了支前，战邮员工更是日日夜夜工作。

我军一支部队挺进北上，攻克胶县与胶济铁路沿线敌人各据点。又一支部队挺进滨南区，攻克赣榆及陇海铁路沿线，又沿海边北上攻克日照城及石臼所，随后又解放了临沂城。这时陈毅军长率领新四军某部北上来到了滨海区，至十月将残存在滨海区的敌人最后一个据点泊儿镇解放了。

战邮总局机关由赵志刚局长带领，随山东省政府等领导机关迁到临沂城办公了。滨海区邮管局也做了调整与加强，上级委派林恒非同志为邮管局副局长，调周子俊同志任秘书长，任兆祥同志为交通科长。在十字路成立了邮件运输队，我任交通科副科长兼运输队队长。这个新开办的单位，按当时条件来说，配备的比较齐全，设会计一人，业务员四人，运输班班长汤士志同志，运输员四人，配胶皮轮大车四辆，骡子四匹。其任务是除担任运输邮件报刊书籍外，还对外运输货物增加收入。这时邮管局驻在草沟，我们请示报告是很方便的。另外邮管局还调徐文三同志到临沂县旧邮局负责改造工作。

八月份的下旬，邮管局开办了一期邮政业务训练班，时间是三个月。培训班主任是刘荣林同志，所学业务都由各科室教。结业后又开办了一期县局长培训班，人员是由现任局长抽调，有的是经训练后准备将来作县局长工作的。竹庭县邮局局长赵绪同志就是现职抽调来培训的。参加训练的有20位同志，时间也是三个月。

1946年，报纸上常登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的胜利消息，有国、共、美三人小组谈判的消息，有党的中心工作土改的消息等等，因此大众日报发行数量倍增。这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困难就是邮运工具问题。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运输队于二月份结束了，主要原因是胶皮轮大车的零部件不易买到。邮管分局除了再配备些自行车外，动员战邮员工发扬吃苦耐劳，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精神，得到了滨海区党政的称赞，给滨海区邮政管理分局记了大功。

7月1日，在滨海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指示下，邮管分局召开了庆功大会，近半数的职工被评上了一、二、三等奖，颁发了奖章、奖状。我也荣获了两个一等奖，一个是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奖给的，一个是将生活费用节省下来献给公家奖给的。

1947年，形势又恶化了，蒋介石挑起内战，开始用飞机轰炸我根据地，后动用重兵并带领还乡团向我们进攻。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2月25日，我军、政等机关主动撤出临沂城，总局又回到了十字路一带办公了。

滨海区的群众团体，可能是因还乡团不断地骚扰我根据地，出现了些“左”的苗头，如“翻身大棍，打死无论，一切权利归农会，贫下中农坐天下”等。我党土改复查工作开始了，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指出中农不是打击对象，而是团结对象。以后根据地里一齐唱起了“贫下中农是一家”的歌曲。

后来，各机关开始了“三查三整”运动，邮政系统也不例外。在“三查三整”中



都经受了一次锻炼与考验，但小的偏差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查整中我的问题解决后，滨海分局派我到临沂前线做支前工作，于兴汉同志也去了。当时临沂县邮局局长是解兰芍同志，主要干事姜悦芳同志。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报纸信件及宣传品的传递。刚去县邮局时，还跟随县委领导机关一起行动，后因环境恶化，县的领导机关分河东河西两部分坚持工作。于兴汉同志去沂河西坚持工作，我还与邮管分局保持来往联系。

八月份，邮管分局又派我去兼莒南县邮局副局长工作，我是在环境特别恶化的情况下去的。国民党采用日寇扫荡我根据地的办法向我们进攻，总局和邮管分局转移到滨北区。九、十月间，大众日报停刊近一个月，我们是跟随大众日报社的工厂一起行动。十月间的一个夜晚，我到东良店去找邮管分局未能取上联系，在过公路时，发现公路上有队伍向十字路方向急行军。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窥视，发现是敌人。当时我只带了一支短枪和一根木棍，考虑敌人太多，没有开枪。敌人队伍尾部有匹骡子突然不肯向前走了，后面的敌人还未跟上来。我跑上公路，用木板狠打了骡子的屁股，并高喊：“八路军来了，快跑呀！”骡子被打惊了，后双蹄跳了几下，向前跑了。这时我看到从骡子背上掉下一卷东西，我赶忙拾起。带回住地一看，原来是十万分之一的苏、浙、皖三省军用地理详图，写有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调制，图上是中文、日文两种，该图共68张。做交通工作，比较喜欢地图，于是就存起来了。

1948年初，我调华东“建大”学习，地址在滨北区。这时赵志刚局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中央召开的交通会议还没回来，是秘书主任王剑鸣同志通知我去学习的，王俊峰同志也调去学习了。不久“建大”改为南下随军学校，由金明同志负责带队南下。

正在紧张地准备南下的时刻，我万万没有想到李林部长也在滨北，他派他的警卫员小郭同志叫我到他那里。正走在半路上，又巧遇上我原在滨北区邮局工作时的通信员崔亭义同志，他到处找我，说是也要跟我南下，这样我俩就一起到了李部长那里。

深冬的一场大雪，从我记事以来还没有经历过，雪还未融化完，我的鞋袜都是湿的。来到李部长处，李部长微笑着说：“咳啊！鞋子都湿透了，不要冻坏了脚，小郭，快拿出我的那双棉皮靴来，叫白同志换上！”我听到部长这么一句话，当时感动地流出了眼泪。我连忙说：“没关系，不要换了。”李部长又说：“最近总局找你，是决定南下呢，还是留在山东呢？”我说：“没有人找我，我们现在已整编好队伍准备南下了。”于淳同志带领的军邮局已随刘、邓大军南下到了豫东，解放了大片地区，深感交通邮政人员不足，派陈俊良同志回到战邮总局，要去了十几位同志等等情况，我都告知了李部长。这时崔亭义同志也插了话说：“李部长，我也跟随白局长一起南下，部长答应我吧！”李部长说：“南下的问题，没有最后定下来，你们暂先回去等几天再说吧。”我临走时，李部长还叫我把他的皮靴带走了。

不久，南下行军开始了。我到达了武汉市邮局……

# 孟良崮战役中的无线电对抗

斯 简

## 第一次无线电对抗——静默、电台群伴动

1947年4月初，华东野战军经过近一个月卓有成效的整训，从思想、组织、军事上，充分作好迎击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准备。大部队行动的通信保障，尤其是空中无线电讯斗争，也作出了一系列周密部署。陈士榘参谋长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纵队、各军区通信科长、野司机关通信主管参加的全军通信会议。他强调：“通信联络是作战指挥的重要部分，南下作战的通信联络，必须适应大兵团高度机动作战的客观需要，尤其要组织好空中无线电讯斗争，这是保障军队作战的另一个战场。”他说：“根据所得情报，国民党军从历次战败中，把无线电失泄密视为重要教训。此次对我山东的重点进攻，



突出地重视无线电对抗，动用数量众多的电讯器材，上自徐州剿总，下至各军各师共组织了200多部收讯电台，日夜侦听我野战军领导机关及各纵队指挥机关电台联络情况，窃收我电台电报，妄图破译电报内容，从空中窃取机密，掌控我军情。还在南京、上海、徐州、济南、青岛等大城市设置大功率无线电测向机，测判我各高级指挥机关方位后，派飞机轰炸。”陈士榘要求各级通信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对策，运用多种手段，应对国民党的无线电对抗，隐蔽自己，侦知敌人，确保作战指挥。

四月初，华野部队主力数十万人从淄川、博山地区分路隐蔽南下，陈参谋长决定立即实施第一次无线电对抗静默、佯动。为隐蔽部队行动，野指机关十部通报台及南下各纵队、各师电台一律实施无线电静默。所有电台中止发报，只允许打开收信机，保持对上级指挥电台的守候收听。各地方武装部队及党政系统电台照常联络，不得中止。

南下部队行动中的通信联络，远距离使用有线电长途干线电话，途中各纵队内部联络主要使用野战被复线路电话。陈士榘指出：“有线电话通信，准确、迅速，命令下传、下情上报，既保密又可靠，一定要有预见、有计划、有布置，不能间断。”早在部队出发前，就专门成立华东长途电话总局，对鲁南、鲁中、滨海三个受敌威胁严重地区的长途电话通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组织熟悉上述三个地区既设线路的电话分队，先期南下，对既设有有线电长途通信线路，进行整修、维护，提高线路质量。同时增建部分长途支线线路，沟通迂回电路。对通向敌方线路，一律作切断处理，终止连接，以防泄密。在主要交通枢纽与线路汇集地域，开设中继电话站，担任转接任务。还组织一个长途电话线路机动抢修分队，配备抢修线料器材、单总机及运输汽车，由野司通信科有线参谋陈顺焕率领，随时执行有线电线路抢修任务。各部队南下途中开设指挥所时，均可与就近干线中继电话站架通联络线，沟通各方的联络，确保部队行动中不间断指挥。

部队离开胶济线出动，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同时，野司组织的佯动电台群开始工作。

野司佯动电台群由无线电区队一名报务主任张寄凉，带领两部大功率机器，顶替野司机关十部通报电台，使用其呼号、频率、联络文件，模拟各通报台工作方式，以不规则的时间段，轮流伪装各电台，呼叫、应答、沟通、冒收冒发，“频繁紧张”工作，以假乱真，制造野司仍在原地履行指挥，华野各主力纵队仍在胶济线整训的假象，以迷惑敌人。

4月上旬，敌继打通津浦铁路徐州、济南段，占领鲁西南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后，顾祝同命汤恩伯第一兵团向蒙阴开进，欧震第二兵团向新泰开进。我各部队严密伪装，封锁行动消息，按时抵达鲁南地区，敌始终未察觉我行动，直至我军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等地时，敌飞机从空中侦察方发现我部队主力已经南下。由此说明我第一次无线电静默佯动，取得预期效果。敌一经发现我部队行踪，双方部队接触时，我野司机关及各纵队各师电台均开设工作，中止静默，同时又按预定方案启动两项无线电对抗措施。一是实施无线电快速变频，即对全军电台的呼号、频率、联络文件，采取日夜变频，每日更换、隔日更换，部队调动与任务改变时更换的方式，摆脱敌窃听与测向捕捉目标。野司曾集中无线电专长的土专家，经过反复摸索试验，研究出一种可以快速变换电台联络规定的转盘表格式文件，将全军电台所使用的呼号、频率、密钥、应急处置内容设置其中，每转动一格，即可获得新规定，只须通过打一个电话或电台发一个暗语，全军电台就能全面更换或局部更换，科学灵活，很是实用。二是在历次作战中，缴获不少国民党军美式无线电报话机，因技术体制与我军装备电台不同，以往未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次南下作战，陈士榘要求各部队发挥这批缴获品

作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缴获当面之敌的装备，开展对当面之敌的侦听，获取当面之敌的第一手情报并相互交换。

隐蔽自己、侦知敌人，这两项措施卓有成效，一直沿用到整个战役结束。

## 第二次无线电对抗——静默、主属台佯动

我军南下作战，依然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当我军出击汤恩伯集团时，敌立即调整部署，密集靠拢，加强防御。华野部队一时难以对其分割围歼，立即改变决心，北上另寻战机，野指机关移驻蒙阴坦埠。不久，从战略侦察中获得密息，敌人新近从美国购进50部无线电战术测向机，已分别配置在山东第一线部队，与各大城市大型测向机相互配合，正跟踪侦测我野指机关及各纵队指挥机关移动方向，判定具体位置，准备逐个实施空中打击，瘫痪我指挥中枢。

1947年4月2日，我无线电侦听得悉，敌无线电测向机已测知我华野指挥机关确实存在坦埠，决定于次日上午11时派出飞机轰炸。野指一面通过其他情报手段求证此一密息，一面组织紧急防空，军队机关、部队、地方单位、居民群众，就地疏散隐蔽。次日天气晴朗，直至中午，未见敌机临空。大家正议论间，下午1时过后，远处空中传来巨大轰鸣声，八架美制B25重型轰炸机飞临坦埠上空，来回盘旋，轮番投弹轰炸，顷刻间，大地震撼，火光冲天，烟尘弥漫，前后持续约两小时，坦埠村一片狼藉，片片废墟。野指一后勤军需仓库被炸燃烧，浓烟滚滚。陈毅司令员住处后面一居民柴房被炸，幸陈司令本人不在住所。无线电区队数部电台，未及撤收天线受到攻击，炸弹在一部电台报务房一侧炸出一个直径十米的大坑，气浪冲击报务房房顶，房顶的泥灰似倾盆大雨洒落在工作台上。我值班报务员忠于职守，沉着镇静坚持工作。其余人员，分散隐蔽在周围坡地上，二台台长毛西夫匍匐在河滩的一个凹地，目睹了敌机疯狂罪恶的一幕。

当晚，野指机关转移至坦埠以北20公里处一个山沟小村，加强防空力度，所有电台天线一律严密伪装，或将天线杆隐蔽在树林边或伪装成独立树木。次日，敌机两架，再度飞临坦埠上空，轰炸扫射，并在周围数十公里范围内盘旋侦察，未得目标悻悻而去。

野指从坦埠转移时，陈士榘又命令野司通信科李景瑞科长，立即启动第二次静默、佯动，防敌窃听，反敌测向。要求全军电台立即中止联络。到达新驻地，在距上级指挥机关40华里之内时，电台一律不准开设，不准沟通联络。并立即快速更换呼号、频率及联络规定，严禁新老混用。对电台机器、天线，尽可能作出技术处置，缩短天线长度，降低天线高度，减弱发信信号强度，改变信号音调特征，力求增加敌人测听难度。

与此同时，野司再次组织无线电讯佯动。这次佯动，分主属台两个部分进行，由野司通信科通信股长张翼，率领一部综合性电台作为主台佯动，既负责侦收敌台信息，又伪装我野指机关无线电台网络，实施冒收冒发，单方联络，频频收发电报。佯动电台随野司侦察科副科长刘志平率领的一个伪装侦察队，一个步兵连一起行动，隐蔽埋伏在坦埠以北一个小山谷中，收集情报，进行无线电佯动，向敌示形我野指仍在坦埠地区活动的假象。在野指佯动主台开设工作的同时，在临沂地区坚持防御的鲁南地方部队两个师的电台兼任佯动属台，他们既正常地与上级台沟通联络，收发电报，同时沿用我主力纵队呼号、频率、联络文件，冒充在原地活动。这种主属台同时佯动，更逼真更能欺骗迷惑敌人。我各部队得以从容休整，为尔后作战赢得了时间。

### 第三次无线电对抗——全面对敌侦听

从4月初至5月初，华野为寻求战机，充分利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忽东忽西，有进有退，似“耍龙灯”一样逗引调动敌人一个多月，敌人无线电窃听与测向再未得逞。

4月20日，敌整编七十二师从汶上、宁阳北进，占领泰安，位置较为孤立，我华野立即以三个纵队围攻，四个纵队打援。泰安守敌虽频频呼救，邻近各路敌军惧我打援，始终未敢救助，我军遂于4月20日攻克泰安，歼敌2.4万余人。

1947年5月4日，华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以最大耐心创造战机，命令各主力纵队移师蒙阴、新泰的东北地区待命，第六纵队隐伏平邑以南地区待命。

5月11日，我无线电技术侦察获得密息，蒋军汤恩伯兵团发出了具体作战命令，部署以七十四师为骨干，在左翼二十五师、右翼八十三师配合下，由垛庄直逼坦埠，并限令七十四师，务必于5月12日日落前占领坦埠，气势汹汹。此时，中央军委又通报了山东北线敌人正在出动配合，企图夹击我军于鲁中地区。敌我斗争形势突显严峻紧张。华野首长经过冷静思考，认为敌七十四师摆出中央突破之势，稍有前出，如此骄横跋扈正是我歼敌良机，乃迅速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命令第一、四、六、八、九纵队担任主攻围歼，以第二、三、七、十纵队担任阻援，特纵主力待命，鲁南地方武装加紧袭扰与破坏。野司命令立即实施第三次无线电对抗，我参战部队电台，统一快速变频隐蔽自己，保持不间断的电讯联络，同时，野战军各纵队、各师组织力量，或单独设台，或由通报台兼任，全面展开对敌侦听，截收当面之敌的无线电话、无线电报，获取其行动信息。

5月13日黄昏，战役发起，具体部署是：第九、四纵队全力由正面抗击七十四师，坚决制止其前进。第一纵队以小部队对敌二十五师发起进攻，制造该敌误以为该部是我围歼目标，逼其迅速回撤。一纵利用高山区地形，穿插迂回，猛烈突入敌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结合部，抢占各制高点，隔断该两敌间的联系。八纵以相同战术，从敌七十四师、八十三师结合部插入，夺取各制高点。动用隐伏于鲁南的第六纵队是这次战役关键的妙着。六纵同敌七十四师是老对头，多次交手均未获胜果，全纵指战员耿耿于怀，不消灭七十四师誓不罢休。正当一纵、八纵向敌分割猛进时，远在敌后百里之遥的第六纵队电台，一直坚持只收听信号不发信，此时突然听到野司第二台呼叫，惊异不已。双方沟通后，收到一份AAAA特急电报，命令六纵立即收拢分散的部队，“飞兵急渡”日夜急行，夺占敌退路通道口垛庄，合击敌七十四师。部队指战员听到围歼七十四师，个个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14日凌晨，第一纵队二师及独立师一部攻击前进，一夜间强行插入敌七十四师、二十五师之间，边战边进，抢占蛤蟆崮、天马山、界牌等制高点，前出20多公里，达成分隔该两敌目的。一纵技术侦听台长派报务员钱明德和郁菩伟，各带一部美式报话机，跟随第一线部队，实行抵近侦听。侦听电台获悉七十四师、二十五师对我突击行动，始料未及，深为惊恐。二十五师误以为对其围歼，慌忙收缩部队，固守已占高地，以求自保。七十四师对我意图不明，径自向孟良崮方向收缩。我六纵十七师电台队长胡新，既要担任内部电讯联络，又兼任对敌侦听，他在垛庄上佛寺村后山，迅速架起报话机侦听，很快搜索到当面之敌指挥台OPU信号，立即抓住不放。虽山地阻断，敌台信号微弱且机密混用，仍判断出敌将有一支队伍增援垛庄，他立即向三十七师梁金华师长报告，部队神速前进，当敌七十四师1000余人赶来增援时，六纵先敌一个小时占领垛庄，断敌退路成功。援敌见状，慌忙掉头逃跑，被六纵追歼。

正面我第九纵、第四纵经过激战，推进到黄鹿寨、佛山、马牧山、隋家店等地。我各路主力已形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四面包围。

野指首长清醒地意识到此一战役非同小可，能取胜则全盘皆活，如不能取胜，山东战局将严重受挫，对全国的解放战争，负面影响甚大。粟裕副司令立即率少数参谋人员，进抵坦埠以西的艾山脚下一个岩洞中，开设前线指挥所，实行靠前指挥；陈毅司令员也随后赶到，共同指挥此一影响整个山东战局乃至全国战局的大战役。

艾山脚下的岩洞，面积不过数十平方米，洞中曾供奉过号称神王之宗道教教祖太上老君，当地群众称之为老君洞。自从陈粟首长进驻为指挥所后，大家都称它为将军洞，此名留传至今，成为一个红色旅游景点，甚至张灵甫遗孀王玉龄、儿子张道宇也来参观访古，到此一游。此为后话。

将军洞在艾山半山腰，这里向南直到孟良崮主峰，是一片开阔丘壑起伏地，正是我华野部队进攻国民党军的主战场，在洞口用望远镜可以直接观察战场动态，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陈毅司令员命野司三科派出一部报话机，作为他的贴身电台，随他行动，进驻将军洞，开展对敌侦听。调频超短波电台，在岩洞中开设，无线电波易受岩壁吸收阻断，不得不把报话机架设在将军洞一侧的一个岩孔中，随时将所侦情报向陈、粟首长报告。

敌七十四师被围后，我各纵队冒着敌人猛烈的地面火力和敌机狂轰滥炸，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夺占有利地形，压缩包围圈。空中电讯斗争形势，也完全在我掌控之中。我军的作战指挥，主要由有线电话保障，在七十四师外围，架设成纵横交错野战被复线网络，野指可以直接面达各师，陈、粟首长与各纵队司令随时可以打电话，必要时，越级与各师一级指挥员通话。陈毅司令员于15日10时给一纵司令叶飞打去电话，简述了当前敌我态势之后，加重语气说：“蒋介石拼死和我们决战，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把七十四师消灭掉。”又给四、六、八、九纵队司令陶勇、王必成、王建安、许世友打电话，说道：“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你们部队被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充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充两千，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最高首长必歼七十四师的决心，各纵队司令员完全理解，他们在电话里异口同声保证：“请司令员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七十四师一兵一卒逃走。”随后，粟裕副司令员打电话要求各级领导靠前指挥，必要时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并说：“不下这个决心，是难以消灭七十四师的。”

我军电话人员，英勇机智、忠于职守。我第九纵二十五师攻击正面之敌，遭敌多次反扑，阵地反复争夺，战斗激烈。当九纵司令员许世友要与所属二十五师肖镜海师长通电话时，正逢肖与一个团长在通话。师部总机告诉纵队总机说，师长正在与下面打电话，线路不空。纵队总机数次呼叫均未接通，守机员心中非常着急，他按照战斗通话先上后下的保障原则，机敏果断地命令二十五师守机员，立即拆下肖师长正在对下的通话线路，转接给许司令，确保纵队与师的两位首长及时沟通，遂行指挥。

四纵部队攻击孟良崮540高地，敌人拼死顽抗，高地多次反复争夺。敌人对我的反冲击，曾直冲到四纵队指挥所前，电话总机守机员在弹雨中坚守工作，镇静接转电话，并请示上级，可否转移位置。长途电话总局接到电话，立即指示总机：“激烈战斗正在进行，电话不能中断，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坚决保障电话畅通。”此一情况恰被粟裕副司令员得悉，立即告诉四纵司令陶勇，组织火力把敌人压下去，还派一小分队保护总机。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敌人被打垮，部队冲击前进。电话总机及守机员一道向前转移，继续完成电话保障任务。

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自恃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临近又有强大增援力量，



凭借高地岩石为屏障，顽强抗击，等待四周援军来到。敌人的无线电通信使用密语通话通报，初时我各侦听报话机，均未获完整信息。至15日上午，第一纵队无线电技侦台获悉，敌整编二十五师、七十四师准备东西对进，合击我一纵部队，以求打通被我分割的态势。叶飞司令一面向野指报告，一面命令调动预备队，抢先占领各有利阵地，东顶西抗，顽强拒敌，战斗空前激烈。

15日下午1时，我军全线发起攻击，集中强大的炮兵火力，向敌军密集的山头、高地，猛烈轰击，山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人的血肉与岩石碎片横飞。华野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勇猛冲击，愈战愈勇，指战员们不待上级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锋。敌依托山上巨石，居高临下拼死顽抗，我军每攻克一点，往往经过数次，乃至十数次冲锋，反复争夺，其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见。空中的电讯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敌军电台开始人心惶恐，通话纷纷失去加密耐心，密语与明语混用，到最后，渐渐不用密语了。

孟良崮战场的残酷战斗，使蒋介石深感危机，将军洞的报话机里，也听到传达他的督战手令。他命孟良崮周围的十个整编师，从东、南、西、北急向孟良崮增援，并威逼说：“山东共军主力向我倾巢出犯，此为我歼灭共匪，完成革命之唯一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者，必定以纵匪害国、贻误战机论罪，严惩不贷！”

在我军各纵队强大打击下，敌七十四师乱作一团。我六纵队侦听台先是听到敌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铎在报话机上一再向隔山相望的黄伯韬苦苦哀求增援，他泣不成声地说：“黄先生，请看在党国的份上，看在钟麟（即张灵甫）先生的份上，拉我们一把，我们实在难以支持了！”接着又听到张灵甫亲自喊话：“黄先生，请速占领天马山、覆浮山，向我靠拢！”黄回答：“张先生，请你放心，我们之间只有四五华里距离，很快可以靠拢，你们一定要坚持住！”汤恩伯明知大势已去，仍在报话机强令所属急援，他说：“七十四师孤军苦战，处境艰危，各部务必同心同德，击破共军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之中，不得见危不救，违者严惩不贷。”不久，侦听台又听到张灵甫向南京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求援的声音，他大骂增援部队迟迟不来，空投物资又全部落在共军阵地上。他要求南京方面命令增援部队务必于16日17时前赶到。陈、粟首长

根据电台侦听的敌情报以及其他情报手段证实，立即决定抓住敌全线惶恐之机，提前发起总攻击。

16日上午，我军再次全线总攻击，战况空前激烈。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心急火燎，到处求救。他对黄伯韬央求道：“黄先生，我们已到最后关头，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向我靠拢！”接着又向敌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惊呼：“李将军，情况紧急！救救兄弟，赶快靠拢，赶快靠拢！”当日下午，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军炮火延伸，各纵队冲锋号此起彼伏，响彻山头。我进攻部队从四面八方冲向孟良崮600高地，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张灵甫仍藏匿于孟良崮蝙蝠洞（也称万福洞）中顽抗。蒋介石又亲自与张灵甫通话，鼓励说：“灵甫，只要你再坚持三个小时，援军一定可以赶到！”张说：“校长，已经来不及了。”骄横孤傲的张灵甫，被我六纵指战员击毙。我担任突击的五个纵队的英勇健儿，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震天动地。

此时，我电讯对抗电台，依然坚守岗位，毫不懈怠，竟然在收讯机里仍听到孟良崮地区有敌台在呼救。粟裕副司令员接到报告，立即命令清点战果，发现七十四师被歼人数与其编制人数相差甚远，证明孟良崮地区仍有敌军残部藏匿山中。即令继续进行战场严密搜索，竟发现在孟良崮主峰与雕窝之间山谷中，7000余敌隐藏其中。我各纵队不顾疲劳，继续投入作战，将残敌悉数肃清。至此，蒋介石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美械中的佼佼者，悉数就歼。

孟良崮战役敌我空中无线电对抗，是华东战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运用手段最多的一场斗争，敌人依靠先进的电子高科技器材，从战略外围全面围堵，在战役过程中密集出击，妄图从空中窃听我军情报信息，瘫痪我指挥中枢。我广大通信指战员，虽然手中只有劣势装备，但土法创新应对，置敌先进技术装备于无用武之地，最终取得了胜利。

# 铁军大帐追歌行 (十三)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 山东临沂——走向新征程

(1945年10月28日——1947年1月21日)

### 廉洁建军保本色，铁军十年千秋歌

公生明，廉生威，为政如此，治军亦然。廉洁建军、廉明治军，是新四军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新四军成立初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碍于大局，迫不得已，极不情愿地拨给新四军一点儿经费。国民党是铁公鸡拔毛，新四军只能聊补无米之炊。在很长时间内，国民党发给新四军的军饷，一直按初创时的1万余人的编制，每月只有8万余元，而且经常故意拖欠。后来，新四军队伍迅速扩大，原来的那点军饷更是入不敷出。1939年秋和1940年初，叶挺两度到重庆，先找蒋介石要求增加军费，遭到拒绝；后来通过他的努力、凭借个人关系，四处斡旋，再加上新四军抗战战果辉煌，国民党总算给新四军增加了数万经费，增加到每月13.5万，而这个数目，尚不及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丙级师的军饷（一般为每月18万元）。但仅仅到1940年9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夕，他们彻底撕破了伪装，彻底断绝了给新四军的经费。叶挺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新四军

军长形容当时新四军的状况是：“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前方部队每4个战士才能发到一套军装，东南部队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寒冬腊月，战士们仍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皖南事变后，特别是1942年到1943年间，日伪顽对新四军三面夹击封锁，华中各地水旱灾害频发，新四军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极为严重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军部更加强调全军发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艰难、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从军部首长到各级指挥员，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与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与广大人民群众和衷共济，保证了新四军强大凝聚力与坚强战斗力，保证了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保持和弘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传统。

新四军廉洁建军、廉明治军的核心内涵是：崇高坚定的信仰，守纪如铁的作风，严于律己的风范，惩治腐败的决心，亲民爱民的情怀，艰苦奋斗的精神。下面俯拾即是几则小故事，可谓是滴水见太阳，细微见精神：

——个人享乐，就是“寻死”。新四军十分重视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要求全体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下，树立正确的苦乐观。针对有些人存在的意志薄弱、贪图享乐、爱慕虚荣、追求名利等错误思想，粟裕、谭震林、郑位三等领导人，先后发表讲话或者撰文，阐明共产党人和党的军队应当具备的享乐观，鲜明指出：共产党人应当追求的是阶级与民族的解放与幸福，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受幸福生活；实现这一追求，正需要每一个党员、干部战士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思想与精神，这才是我们的最高思想境界与美德。剥削阶级的享乐观所追求的不过是“金钱、美酒、美女”这三样东西，再高一点的也不过是“名誉、权利、地位”这三要素，这种享乐观，恰恰是腐朽的“寻死观”。这些东西，都是使我们党和军队解体而使敌人胜利的危险物，必须坚决抵制与清除。正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导，使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做到了警钟长鸣，坚不可摧。

——没有薪俸，只发津贴。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军需民用，新四军军政各级一般不发薪俸，而是实行生活津贴制度。上至军首长，下至司机、伙夫，除伙食由公家供给外，每月津贴均在0.5至4元之间：军首长和支队长4元，各部长、处长、科长3.5元，一般干部1.5元，战士5角。为了照顾从城市中来到新四军的人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曾规定：凡从延安和八路军来的团员，每人每月津贴一律1元；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团员，每人每月一律10元。不料这一规定遭到了从大城市来的团员的集体“抗议”，他们纷纷表示，我们从大城市来新四军是抗日的，不是享受的。他们坚决要求不搞特殊，要求上级对他们与别的团员一视同仁，一样对待。最后，上级只得对他们也实行了每人每月1元的津贴。粟裕则明确规定，对他不准搞什么“实报实销”的特殊照顾，就是因公留客吃饭的费用，也都从自己的津贴中扣除。他对大家说：揩公家的油，沾公家的便宜，“实属做人的耻辱，是丧失人格的开始。”

——粟裕带兵，三个“得”。新四军和各根据地的伙食标准极低，以淮南区为例：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3钱盐、4钱油、5分菜金，每月1斤肉钱补贴。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或者在艰苦转战途中，伙食供应不上，常常朝不保夕，只得用时间过长发霉变质的食品或者树皮草根充饥，有时还不得不忍饥挨饿，靠喝生水撑肚子。要想改善生活，多靠打鬼子夺取战利品来打牙祭。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时曾经诙谐地“警告”大家：不论干部还是战士，都要能做到“三个得”，一个是“打”得，一个是“跑”得，还有一个是“饿”得，没有这“三得”，坚持不了抗日游击战争。多跑跑路，多挨挨饿，就跑得饿得了！

——天当军被，野地当床。绝大多数时间，新四军各部队的住宿与机关办公条件极差。行军途中，阵地之上，荒郊野外，树林草丛，走到哪里哪里是营房，歇在哪里哪里是床铺。驻扎一地时，机关与兵营多数是借用所到之地的民房、祠堂、庙宇、旧式学校、废弃仓库等稍加临时改造而成。留住时间较长时，则自己动手搭建简易草屋，以作为住宿或者办公、开会等，尽量不给群众增添麻烦。军部驻在云岭时，机关办公住宿都是借用的民房，军部大礼堂则是借用当地的陈家大祠堂，修械所则设在村里的关帝庙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在水西村时，人多住房少，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又节省开支，副司令员粟裕就带领警卫班，用竹子和稻草编织成一片片约3尺长、2尺宽的竹草片，再把这些竹草片搭挂在司令部办公室的走廊下，用作墙壁，中间开个小窗，挂上草编的“房门”，就成了一间间简易办公室和宿舍。住在里边的同志，个个乐在其中。

——一个信封，四次使用。为了战胜经济困难，从1939年开始，新四军在全军持续开展节约运动，逐步把勤俭节约培养成全军指战员的良好习惯。一天晚上，陈毅专门把管理后勤与财务的老季请到自己办公室，了解开支情况。话谈到半截，小小油灯断油熄灭了。老季忙擦着火柴欲再添上油点上灯，陈毅把火柴吹灭，说：“算了，不要点了。”老季说：“部队再困难，也不在乎您司令员点这盏小油灯啊！”陈毅和藹地说：“你是经济干部，应该算总帐。部队一个月要多少食油，多少灯油？如果每盏灯每天都少点一会，得省多少灯油？我们多节省一点灯油，群众和战士们就可以多吃一点食油呢！”1944年3月，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亲自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要求做到物尽其用，详细地指出：“破布破条可以做鞋底，麦麸可以做猪饲料，豆渣可以做菜……一个信封，可以先用铅笔正反面用两次，再用钢笔正反面用两次。办公纸张尽量不要用整张油光纸，而用印刷后裁下来的纸条子。墨水要用自己配的紫靛水。油灯捻子要用一根等……”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节约上要求如此细致入微，足见对勤俭建军的高度重视。

——流动学校，竹子医院。为了培养抗战干部，新四军军部及各部队先后创办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华中总分校和四、五、八、九、十分校。在频繁的战事、艰苦的条件下，学校多无固定住址，经常处于流徙之中，不论春夏秋冬，场院树下是课堂，背包石头做板凳，两膝一屈是课桌。但是，他们始终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先后培养了上万名优秀干部，成为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骨干。新四军医院初到云岭时，主力部队刚刚挺进敌后，一些重伤病员仍然需要送到后方军部医院治疗。当时，军部医院规模还很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挺与军医处长沈其震商量，利用云岭附近的一座破庙，扩建军部医院。没有金属、木材等原材物料，他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毛竹当主要原料。病房、病床、桌子、椅子等，都是用竹子做的，大家称之为“竹子医院”。在云岭三年中，军部医院共收治住院伤病员6000多名，手术近1500名，80%以上的治愈率。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采访，叶挺陪她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她上下左右地端详着这所虽然简陋、但是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竹子医院，既充满好奇，又赞不绝口。看到意志坚定高昂的新四军伤病员，看到络绎不绝、前来治病的老百姓，她更是充满了敬佩，说：新四军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为伤病员服务的。医院条件虽然差，但是富于创造性，比大后方的许多国民党医院要好得多。她由衷地赞叹：“新四军医院真了不起，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当时的国际性刊物《密勒氏



新四军种植的菜地

评论报》《中国人民之友》等，都刊登过史沫特莱介绍和赞扬军部医院的文章。

——军工模范，中国保尔。从1938年新四军在岩寺集中，军部的修械所就来了一位相貌平凡、恰似农民的修理战士，然而就是他，后来却成了新四军乃至我军赫赫有名的军工专家，他就是吴运铎。他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共产党。当时，新四军武器装备极差，就是这些破旧的武器，也要反复地修理再用；手榴弹、枪支子弹更是奇缺，除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很大部分要靠自己的修械所和军工厂制造。而吴运铎则以其强烈的责任感、顽强的学习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成了新四军军工事业的开拓者。在研制武器弹药时，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反复地试验实践，曾多次身负重伤，先后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做过20多次手术，身上还一直残留着几十片弹片没有取出，仍然战斗在军工生产第一线。他被广大指战员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官兵平等，同甘共苦。1938年6月，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地区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一路之上，他们宣传群众，秋毫无犯，让沿途百姓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崭新形象。月余时间，长途跋涉，风雨交加，饥馁时常，粟裕与指战员们并肩前进，同甘共苦，极大地鼓舞与调动着大家的积极性。部队在上峰附近村庄宿营时，群众闻讯赶来。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对战士们说：“我活了80岁，见过清兵，见过孙传芳和老蒋的兵，自古都是兵匪一家，可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好人！”兵是官带的，老人一定要亲眼看看部队的“大官”，言道：“从来当官的都是吃好的，穿好的，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你们当官的，不知啥样？”战士把老人领到正蹲在地上与大家一起吃午饭的粟司令员面前，老人怎么也不敢相信，司令竟然和当兵的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老人感慨地对粟裕说：“没见过、没见过呀，奇了奇了，这么大的官和当兵的一样，司令啊，将来天下一定是你们的！”粟裕对老人十分尊敬，立即起身请老人坐下，回答说：“老人家，您过奖了，我们实在不敢当。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我们有做得不到不好的地方，还请您多加批评！”

——尊重知识，保护人才。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都十分尊重知识，大力号召并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为抗战作贡献。当时，新四军生活

极为艰苦，军部和支队主要领导每人每月才4块大洋的津贴。但是，他们却对知识分子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如军医处吸收的一批受过正规教育的医师和护士，最高的每月津贴为140块大洋（每块大洋当时可买30斤鸡蛋）；医科大学毕业生每月70块，正规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生每月30块，即使是军医处自己培养的学员，毕业后每月也发8块。不仅如此，军部还给高级知识分子享受团以上干部待遇，为他们配勤务员、坐骑等。教导队教员的津贴为12块，薛暮桥的津贴则提高到15块，但是他们都要求与其他官兵平等待遇，不愿意接受特殊照顾。为此，军部还专门在军部礼堂召开动员会议，项英在讲话中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多给几块钱，就是为了让你们早晨可以吃几个鸡蛋。”朴实的语言，真诚的态度，让军中的知识分子倍感温暖，在新四军抗战到底的决心更坚定，工作更加积极。

——不越雷池，周公解禁。新四军建军初期，由于斗争环境严峻，物质生活困难，战斗任务很重，军部对部队干部谈恋爱、尤其是结婚问题限制十分严格。不论级别多高，没有结婚的，原则上不批准结婚，像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这些大龄“中年”，都十分自觉地按规定不考虑个人问题，当着单身汉。已经结婚的，为了工作回避，规定夫妇不能在同一单位工作，像曾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同志的夫人也都按规定不在同一单位工作，每周只有周六才能和丈夫团聚。直到周恩来视察云岭军部时，谭震林无意间向周恩来谈到了这一问题，反而引起了周恩来的关心和重视。他对军部领导说：不要搞这么绝对嘛！在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对此有个规定，就是“二八五团”（28岁、5年军龄、团级干部）可以批准结婚，新四军也可以参照这个规定解决婚姻问题。自此以后，从1939年到1940年，新四军才有一批团以上干部获得批准结婚，对谈恋爱的规定也有所松动。

——严格自律，秉公用权。新四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坚持做廉洁自律的榜样，特别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允许自己、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公共资源搞特殊化、享受特殊待遇。1941年9月的一天，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副军长张云逸的儿子急着去上学，老饲养员便利用空闲时间，从牲口棚中牵出马来送孩子。张云逸得知后，立即命令警卫员跑步把他们追了回来，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部队里有不少抗战小战士，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都得背着背包枪支翻山越岭，一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有的还要照顾伤员。他们的年龄和我儿子差不多，有的年纪更小。他们能这样做，我的儿子为什么做不到？上个学还要用马送？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搞特殊。在张云逸的严格管束下，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办公室，经常用自掏腰包购买的香烟、茶叶招待前来汇报工作、商量事情的同志们，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工作人员向他提出意见，说招待前来谈工作的客人也是为公，不是个人行为，应当去副官处领取招待烟茶。他批评工作人员觉悟太低，不仅不让去领招待烟茶，还与下属约法三章：定期向他汇报个人开支项目，零用钱不准超额，不准随便花钱。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夫人林颖一次丢了钢笔，一位领导就把公家库存的一支金星笔送给了她。彭雪枫知道后，立即用自己的钱按价付给了公家。还有一次，林颖要到区党委开会，时值天刚降大雨，道路泥泞，十分难行，警卫员要用战马送林颖，彭雪枫坚决不允许。林颖理解丈夫，毅然卷起裤腿，艰难跋涉到了区委。

——项英请客，借钱三元。率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副军长项英，在生活上一一直保持节俭朴素的优良传统，是位艰苦奋斗的典范。他平常毫无军长架子，一身灰军装打着补丁，一条皮腰带早已陈旧，一双旧皮鞋前头开了花，像是一位普通的老战士。他常常说：“一定要本着节约的精神花钱，一个钱要顶两个用，要让每一个钱不能有丝毫的浪费。”他一月只拿4元钱的津贴，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1938年

的一天，项英接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会见结束后他热情挽留并招待美国客人，但是一摸口袋，已经空空如也，只得向司务长借了3元钱，炒了几个好菜。第二月一发津贴，他立即还给了司务长。

——喜得贵子，陈毅还礼。1942年秋，在新四军军部驻地停翅港，乡农救会长朱志高等一行5人，拎着一只老母鸡、一条鲤鱼，提着一篮子面条，来到陈毅夫人张茜的住处，代表乡亲们来给陈毅的第一个孩子陈昊苏过百日。陈毅家中既无肉也无鱼，夫妇二人十分过意不去。于是，张茜遵照陈毅的嘱咐，用乡亲们带来的鸡鱼和自己家中的青菜，办了一桌饭菜来招待大家。席间，陈毅又歉意地对大家说：“承蒙乡亲们看得起我陈毅，送来的礼物我愧领了，请大家吃光！这叫陈毅请客——来人吃来物呀！”一句话，把所有人说得开怀大笑。

——手握重金，一尘不染。1939年至1941年春，新四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经常派人到上海等大城市采购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布匹等物资。他经手的钱、物一批又一批，但是桩桩件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有一次，他洗脸时怎么也找不到自己使用的毛巾，便问警卫员。警卫员说：“首长，您的毛巾太旧了，不能用了，那不是给您领了一条新毛巾，挂在那里的嘛！”张元寿有点儿生气，命令警卫员立即把自己的旧毛巾找回来，把新的退回去，并严肃地对警卫员说：“我们虽然经手着大批物资，但这些都是人民拿来支持我们抗战的，都要用到前方将士身上。我们自己能用旧的就不能换新的，要带头节约才行啊！”

——直面问题，绝不护短。针对新四军个别单位与人员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问题，新四军领导敢于直视，一针见血，严肃批评，及时教育，防微杜渐。一次，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亲自参加全师供给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到在浪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他更是毫不留情：“关于贪污叛变问题，可不须多说，我们同志都懂得是犯罪的。现在我只想把浪费问题多讲一下。我们有些同志只知道贪污是犯罪，浪费是小事，是不会犯罪的。但恰恰相反，浪费是极严重的事，它与贪污在实质上都是一样危害革命的行为……我们现在暗中浪费的数目真是惊人，被服、粮食、弹药、西药的浪费，在有些单位实在很严重。有些部门的粮食，为什么吃得那么多？他们的肚子难道特别大些吗？譬如打仗，有的单位以×千多颗子弹才打死了3个敌人，打死1个敌人就要用×千×百多颗子弹。这么多子弹要值多少钱？按最少××元1颗算，就需要×万元才打死1个敌人。我们的指挥员不教战士学会精准的射击，造成的这个浪费是惊人的。至于西药，现在买1颗奎宁要花××元，打1次摆子至少要花×百元，但有的同志却不懂得珍惜药品……总之，我们要知道，战争愈频繁，群众的损失愈大，民力愈艰，部队的需要更多。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要依靠我们全体同志克勤克俭，尤其是供给干部的切实负责！”

——严明法纪，以儆效尤。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新四军廉明治军的重要体现。仅在经济与财经方面，就制定了若干严格的制度。

“新四军经济制度”共有10条：1.统一收支，实行预算决算。2.建立各项审查制度。3.严格执行经济制度、规定及手续。4.一切经济归公，反对隐瞒不报。5.爱护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及浪费，执行私人财务登记、按期检查制度。6.建立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工作，改善部队给养，实行经济监督工作。7.无特殊情形不招待客菜，就是外客也不得超过四菜一汤。8.各级首长对经济应负保管与支配及检查督促责任。如发生有携款潜逃及遗失款事，应由该首长负责。9.保证战时供养，不间断的供养，打仗不饿肚子。10.经济纪律严格建立，不贪污浪费公家一文，贪污浪费不爱惜公物者，应受处罚，情节严重者处死。”



流动学校——  
新四军教导队

“新四军财经人员十项守则”则规定：“1.遵守并严格执行各种财经制度，在经济上决不私自违反规定手续，私自通融。2.不贪污，不腐化，工作认真，经济手续清楚，养成正确的财政经济观点，提高财政人员品格。3.随时随地注意财政上贪污及其他不良现象，一旦出现应立即予以纠正说明，必要时应立即呈报上级，不得有帮同隐瞒行为。4.不得有吸食毒品、鸦片及嫖赌等不良嗜好。5.不得接受商人任何礼物。6.不得将公物赠给私人。7.除各级负责干部因工作或统战的必要外，任何人均不得接受商人招待。8.不准私自经营商业。9.不得私自挪用公款或私自将公款借给别人。10.税收人员非奉上级命令，不得动支经手税款。”

对于违反各项军纪、特别是违法犯罪的，新四军一概严惩不贷，决不姑息。1939年，根据战士揭发并查实，江南指挥部直属队一个司务长贪污伙食尾子10元。军需处长认为他事出有因，家庭生活特别困难，这点钱是寄给了江西老家为老婆孩子糊口度日，而且这个司务长是个老红军，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陈毅说，“贪污伙食尾子，侵害了战士的利益，不论多少，都是犯罪。老红军犯了罪也要惩罚。”他叹了一口气，又说，“老红军能从山上活着走下来也不容易啊。这么办吧，撤职，罚他做苦工。”这年冬，为了合作抗战，陈毅命令四团三营营长范连辉把第三战区发给李明扬的10万发子弹护送到泰州的吴家桥。子弹送到后，李部查收时发现每箱都少了一些，便将此事汇报了陈毅。陈毅即命查明原因，原来是范连辉私自决定给新四军扣留了一部分。陈毅很是生气，决定处分范连辉。范营长作战勇敢，很多人为其讲情。但陈毅不为所动，在水西村召开了大会，宣布撤销范连辉的营长职务，送到教导队学习。1942年，新四军苏中军区交通站长陈新，因私卖公家棉裤1条得钱300元，被开除党籍。据统计，仅1942年，只在苏中根据地党内军内，因贪污、违反军纪等被处以极刑的人员就有：新四军1师特务营营长贪污1000元；新四军一支队一名老红军炊事员因奸污妇女；大丰县北区委书记、抗日英雄马坚因贩卖私盐；苏中税务局第四分局主任邢爱身因贪污公款4000元；苏中三分区4名干部因贪污等。

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新四军番号取消。番号虽然取消了，但是新四军在8年抗战中创造的赫赫战绩，却永远地铭刻在了中国革命纪念碑上。 **（全文完）**

# 王远知年谱

蓬莱外史



## 前言

王远知（公元528年—635年），又名远智，字广德，祖籍琅琊人（今山东临沂），师从陶弘景祖师。南北朝至隋唐时高道，茅山宗第十代宗师，谥曰升真先生，后改升玄先生。陈国符先生考证以下史料有载：《茅山志》卷二十二有贞观十六年王旻撰《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又见《旧唐书》一百九十二隐逸列传，《新唐书》卷二百零四方技列传，《太平广记》卷二十三引谈宝录，《茅山志》卷十，《云笈七签》卷五（仙铎卷二十五同），《玄品录》卷四，《三洞群仙录》卷十一引旧唐书隐逸列传，又卷二十引异人录，康熙《镇江府志》卷四十兹录王旻碑刻更以他书增补。关于《茅山志》所收《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日本学者吉川忠夫认为作者为“江旻”，得到后来学者认可，下文简称《王远知碑》。本文综合以上史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与今人研究成果，梳理王远知生平，为其撰写年谱。年谱是用编年体记载个人生平事迹，按年月顺序叙述某个人的生平和著作的一种文体，它由传记体发展而来，成熟于宋元时期，被写的人物通常为著名的学者或官员，称为谱主。有学者考证隋唐时期有两个高道均名王远知，常为后世混淆，本文以茅山宗王远知为谱主，区分天台道人《易总》作者之王远知。通过王远知年谱，可以理清这一早期道教重要人物的活动线索，了解其历史功绩。

528年，梁·大通二年，生，一岁

王远知出身士族家庭，家族源出六朝名门琅琊王氏，祖父王景贤是梁朝征北将军、江州刺史。父亲王县选是陈国时期的扬州刺史，曾任散骑常



侍、太子右卫率、轻车将军、车骑将军、建安郡公等职，外祖济阳丁超为梁朝驾部郎中。和很多高道大德一样，王远知出生之时也有祥瑞之兆出现。其母丁氏某天晚上突然梦见凤凰围绕自己，之后就有了身孕，又听见腹中有婴孩啼哭的声音。《王远知碑》载：“母氏济阳丁夫人，阴祇柔德垂美，夙有神朋之契，先察祲祥之符。尝因昼寝，梦身为飞凤所集，既寤，见赤光贯乳，遂感而娠。七日便啼，声闻于外，才经少选而载口焉。”当时的僧人宝志因而对王昙选说：“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母昼寝，梦凤集其身，因有娠”一事为后人写入《梦凤集肩》一文，为后人反复引用。

**535年，梁·大同元年，七岁**

《云笈七签》卷五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五称王远知年七岁，日览万言，博览群书，心冥至道。《旧唐书》和《玄品录》说“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新唐书》则说“远知少警敏，多通书传。”大意相同。

**543年，梁·大同九年，十五岁**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录王远知十五岁时即前往茅山拜陶弘景为师，“事陶贞白先生”，陶弘景传授其三洞法。后来他又从宗道先生藏矜，学习各种秘诀。“先师从陶弘景，再师从藏矜”这一说法为各种材料普遍接受，但是《玄品录》卷四《道品》称其“初师宗道先生臧矜，后入茅山嗣修陶隐居经法”。另外《茅山志》卷十中认为王远知二十岁弱冠之时才开始拜师学习，“弱冠，师宗道先生，臧矜进而宗修隐居经法。”从此王远知隐居茅山，潜心修炼。《云笈七签》卷五及卷一零七中的陶弘景传记中都提到了王远知：“弟子数十人唯王远知、陆逸冲称上足焉”。《太平广记》亦说“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远知、陆逸冲。”

**582年，陈·太建十四年、陈·至德元年、隋·开皇二年，五十四岁**

南朝陈宣帝（公元569—582年）听闻王远知大名，召他到重阳殿讲论，王远知辩论超诣，陈宣帝大为赞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五载，陈宣帝大建末年，王远知修炼的靖室中忽然出现一个神人酒醉呕吐，王远知见状燃香礼候，神人说：“吾将游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就跟随着神人出去，上束岭，到了半山腰，忽然想到没有嘱咐弟子读经书，便往回走了十几步，再回头看仙人，仙人已经变成仙鹤飞走了。

**592年，隋·开皇十二年，六十四岁**

隋炀帝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镇守扬州，派王子相、柳顾言二人先后去请王远知相见，王远知在杨广面前显现奇异，头发颜色改变。《旧唐书》称“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顷又复其旧”。《新唐书》称“少选发白俄复鬓，帝惧，遣之。”杨广看到之后大为惊叹。《王远知碑》则描述了对谈时的情况“咨议顾言，每申谈对，法主豪墨所至，必罄今古，辞义所该，始无遗逸。”并且说明王远知内心对归隐山林修行的渴望，杨广难以违背王远知的意愿，因而遣使将其送归山林。

**593年，隋·开皇十三年，六十五岁**

开皇十三年正月初七夜，王远知端坐精思，仿佛朱衣羽人握节进入房间，对王远知说：“岫隐川藏，事由独善，寓形寰宇，宜弘利益。重官品藻，以卿开教一方，可宣扬法味，开度后学。既受兹灵诰，始有应物之心焉。”王远知受到仙人点化，由此开办讲学，招收三千余人。

**599年，隋·开皇十九年，七十一岁**

晋王杨广敕使郑子腾送书询问，钦尚殷勤，诚深下攀。

**611年，隋·大业七年，八十三岁**

隋炀帝登基为帝之后，再次请王远知出山，派遣崔凤迎请，在涿郡的临朔宫会

面，隋炀帝亲执弟子礼，向王远知请教神仙之事。隋炀帝回顾之前王远知头发的异象，感慨：“朕昔在扬州，师已素发。今兹重睹，更有童颜。岂非道固存焉，养之得理者。”后来又在京师洛阳设立玉清玄坛请王远知前去居住。后来隋炀帝离开京城前往扬州，王远知进谏不宜远去京国，隋炀帝没有听从。

**621年，唐·武德四年，九十三岁**

唐高祖未称帝之时，王远知就秘密送符命给他。符命在早期的帝王观念中非常重要，是王朝正统性的象征。在道教的传统中，也有九天玄女向黄帝传授天命的说法。太宗进驻洛阳期间，与房玄龄穿着平民衣服专程拜访时为玉清观住持的王远知。王远知先前并不认识这二人，迎接他们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大吃一惊，这位高人果然名不虚传，于是以实相告。王远知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告诉李世民即将成为太平天子，一定要好自珍重。

**627年，唐·贞观元年，九十九岁**

《旧唐书》：“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唐太宗登基之后，便想请王远知出山担任高官，但是王远知坚决请求回山。

**635年，唐·贞观九年，一百零六岁，解化**

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茅山为王远知建造太平观，度道士二十七人（《旧唐书》称二十七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称七人，《王远知碑》和《茅山志》称七十七人）。唐太宗降玺书曰：“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笈者，其孰能与此乎！朕昔在籀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并许置观，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营栋宇，何当就功？伫闻委曲，副兹引领。近已令太史薛颺等往诣，令宣朕意。”

贞观九年四月至山，敕文遣太史令薛颺、校书郎张道本、太子左内率长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镇彩金龙玉璧于观所，为国祈恩。复遣朝散郎萧文远赍玺书慰问，并赐衲帔几杖等。各种文本都描述的王远知解化的过程，略有差别，但都声称王远知去世的年龄为一百二十六岁。

《旧唐书》：其年，远知谓弟子潘师正曰：“吾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见署少室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寝。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这段文字中已经记录了王远知预见到自己因为年少时的过失，不能够白日升天，只能成为少室伯。《新唐书》记载类似。潘师正（公元587—684年）是王远知的弟子，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

《王远知碑》详细记录了他在解化之前三日内的情况，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潘师正：“皇太子以其年六月，又遣将仕郎张万迪送香油、龙璧供山中法事。敕又遣桓法嗣送香，八月十三日至观。法主沉吟久之，方遣恭受，谓弟子曰：此香何能烧尽？可分四近诸观，广供斋讲，冀能感彻。十四日午时，适因睡寤，喜形于色。侍者在旁谘问所以，答曰：吾向暂游洞宫，仙官见报，欲以疲朽，补为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五日，沐浴冠带，焚香正坐，集诸弟子，述圣朝立观之由，励学人策勤之志。十六日旦，忽闻异香入室，鸟兽哀啼，顾谓侍者曰：日时早晚？曰：辰时。乃应曰：好，即转身平卧，自正衣冠，九易之形一朝解束，春秋一百二十有六岁。肢体柔软，颜色不变。停殡旬余，倍胜常日。”此事在《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三也有同样记载，当为引用。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五则重新诠释了王远知的死亡时间，解释了一百二十六岁的由来：当时有一个叫做窦德玄的人，路过扬州遇到司命使者，使者

说：“真人王法主王远知是少室仙伯，将担任检录人鬼的任务，关奏天曹，无不即应。” 窦德玄知道王远知将要飞升，便恳请他多留一些时日，王远知无奈之下便答应了。使者回来禀报太宗，说先生可以多留十三年。到了唐高宗即位，窦德玄担任左丞相，王远知救济疾苦，世人都称他为法主。

#### 635年以后

《新唐书》所载，王远知临终前除了向弟子潘师正交代之外，还遗命给儿子绍业。王远知预言：“尔年六十五见天子，七十见女君。”这两件事情后来果然都发生了。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临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谥曰升玄先生。天宝年间，唐玄宗下诏让王远知再传弟子李含光于茅山太平观建造影堂，绘出王远知遗像，用来旌表王远知的永久纪念。

《全唐文》收唐高宗所做《赠王远知太中大夫诏》：“故玉清观道士王远知，性含几贖，迹徇幽元，体兹县解，见称先觉。自締构之初，迄光华之旦，绸繆恩遇，事昭纶綍。仙化不追，英灵寢远，眷言留舄，宜有褒崇。可赠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主者施行”。

武则天《赠王远知金紫光禄大夫诏》：“门下：子乔羽化，或留连于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伫于旧邑。矧夫迹膺仙策，名偶圣朝，追想遗尘，载殷远念。故玉清观道士赠太中大夫升真先生王远知，性与道合，神从化游，初穷帝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时历三代，韞秘术以韬光；年逾十纪，属睿图之启运。藏往知来，察幽鉴远，亟符先渥，缅惟赠恤之恩；聿申后命，宜峻褒崇之礼。可赠金紫光禄大夫升元先生，餘如故。主者施行。”

另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记录王远知解化之后显灵之事：“先生化后，有人过海，为风飘荡，忽见叶舟自天未来，乃先生也。且曰：君涉险，何至如此？此洋海之束十万里也。借子迅风，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飞羽，但觉风飘。而过明日，果至登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帮助过海的人。

#### 结语：

王远知作为早期上清派茅山宗的宗师在道教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出生于梁朝，历经陈、隋、唐四朝，其宗教地位不受政权变更而动摇，与王朝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入世与出世之中寻求平衡，为后世茅山上清宗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程照轩：岁月峥嵘 功绩卓著 (下)

方继礼



程照轩与夫人在淮海战役之后于安徽蚌埠

## 徂徕山起义立大功

程照轩出狱后，与山东省委和泰安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随即回到家乡山阳村开展抗日活动，召集会议，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筹措枪支，组织武装。

1937年10月中旬，泰安临时县委在篦子店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人民抗敌自卫团”，推选程照轩为主席，崔子明为副主席。不久，省委由济南转移到泰安，于23日在泰安城文庙开会决定，派程照轩、赵正贵（赵杰，红军干部）、侯得才（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三人，到程照轩的家乡成立第六区委，分别任书记、军事委员和组织委员。24日，他们三人见面，互相作了介绍，并与刚成立的泰安县委接头，了解情况，准备上任。按照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指示，定于第二天黎明启程，向程照轩家乡开进。程照

轩向赵、侯二人介绍了行动路线和可能遇到意外情况的对策。出发前，程照轩从他的包袱里拿出一支匣枪交给了赵正贵，说：“这支匣子枪是通过关系从韩复榘部队搞来的，我们两人都不会用枪，交给你，多消灭敌人！我们拉起队伍时，你还要教我们用枪呢。”（后来，这支匣子枪随赵正贵转战十几年）路上，程照轩对这两个上级派来的人关怀备至，休息、吃饭，都由程照轩“下令”。赵正贵是南方人，见到路边休息的推车人吃卷着的“树皮”，很好奇地问程照轩是怎么回事，程照轩兴致勃勃地说：“他们吃的是泰安名产——煎饼……”他们边观察周围的情况，边说说笑笑，傍晚，安全到了六区山阳村。程照轩把赵正贵和侯德才介绍给全家，全家非常热情，为远方来的客人洗尘。饭后，程照轩把他们二人安排在较隐蔽的西屋，对赵、侯二人说：“你们好好睡上一觉，这里安全，我和父亲、大哥、二哥轮流站岗，请放心。”就这样，赵正贵和侯德才在程照轩的家住了近两个月，程照轩的全家，始终如一地关照着这外来的客人。从而保证了六区委领导的正常工作。他们在山阳、东西良庄、茅茨和七区的楼德、封家庄、柴城一带开展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全省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并且决定省委直接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地区的徂徕山起义。徂徕山地处山东腹心，西面是公路和铁路的交通命脉，徂徕山群山环绕，成为天然的屏障，泰安六区正处在这一要地。所以，程照轩等人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徂徕山起义的前途。10月底，程照轩主持召开了关键的三人区委会（赵正贵、侯德才参加）。在会上，他提出了做三件事：第一，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第三，筹备武器和粮款，联络各方人员，组织人民武装，同时做争取程子源（当时的国民党六区区长）的工作。并强调工作的重点是抓武装，搞枪支。以上三条做好了，实际上就是为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做好了准备。赵正贵和侯德才对程照轩的意见表示赞同。程照轩很谦虚，对上级派来的干部很尊敬，在工作分工时，他没有说他负责全面工作，而是强调共同负责，互相帮助，这给赵正贵、侯德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三人按照会议决定，积极开展了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山阳、封家庄、楼德一带很快组织起了100余人的抗日武装，程子源给了供给方面的支持。

12月，日军逼近济南，24日，省委机关从泰城转移到篦子店村，27日，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确定了徂徕山武装起义的具体部署，决定日军占领泰安城时举行起义。程照轩参加了这次会议。30日，省委机关撤离篦子店村，一部分由洪涛等同志带领，另一部分由黎玉等同志带领。黎玉带领的同志到了山阳村程照轩家，研究了拉部队上山和召开起义誓师大会的议程问题。吃过晚饭，程照轩等人随黎玉上了徂徕山大寺。31日晚上，日军侵占了泰安城。

1938年1月1日清晨，朝霞映红了徂徕山，各地赶来参加起义的160余人红心似火，黎玉代表省委庄严正式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副司令员赵杰，政治委员黎玉。参加誓师大会的起义人员编为两个中队，由程照轩等人发动的队伍编为二中队，封振武为中队长，程照轩为指导员。

徂徕山起义成功了，人们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这支星火武装，有如燎原之势，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贡献。然而在起义的初创阶段又是何等的不容易啊！程照轩是在起义的前前后后操尽了心的。他除了做好本区委的工作以外，还得筹备武装起义，迎接上级和从新泰、莱芜、宁阳、泗水等地的来人，他的家成了起义的联络点，食宿的“军营”。

程照轩任四支队二中队指导员后，主动向赵杰请教，他说：“我从老百姓变成了军人，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工作怎么做，你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干部，我要向你学习了。”他非常虚心地听赵杰讲怎样做巩固部队、扩大部队、做新战士的工作、党支部的工作、群众工作等。他如获至宝。程照轩在四支队领导的直接帮助下，大力开展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部队刚刚拉起来，思想情况非常复杂，对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又赶上快过春节了，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都是不利的。鉴于这种情况，程照轩每天召开一次政治战士（支队党组织分配到班排里的党员）会议，研究当天的部队政治思想情况，布置第二天的工作。他组织干部战士控诉日军侵略罪行。向战士宣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人民军队性质的教育，等等。他严于律己，为人师表。通过这些工作，部队思想情绪稳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使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

日军侵占泰安城后，对铁路两侧的群众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奸淫。群众弃家逃命，成群结队逃向山里，向起义部队诉说日军暴行。部队干部战士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下山杀敌。1938年1月中旬，部队下山，移驻东良庄。一天，群众报告，国民党新泰县县长朱奎声和几个人，躲在离东良庄十来里地的保安庄万小鬼家，准备投奔济南去当汉奸。支队领导立即决定逮捕他。赵杰副司令员带程照轩等几人去保安庄，一枪未放，干净利落地捉拿了朱奎声和几个同伙。1月25日，经群众报告和侦察得知：26日，日军要从大汶口开向新泰县城。支队领导决定：赵杰副司令员率三中队（当时部队已发展到了3个中队400余人）和二中队一个排，于26日早4点进入徂徕山南的寺岭（庄），选择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这时，程照轩主动提出上战场，说：“从监狱出来，我就想上战场打仗，现在机会来了，我不去，那叫我多扫兴啊！这次去听听枪声，也是我学习军事的好机会”。为了打好这一仗，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在黎玉作了政治动员以后，程照轩也作了政治鼓动，他说：“第一仗要打好，打赢！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部队要执行命令，听从指挥，节约弹药，多打敌人……”程照轩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不断地作战斗鼓动工作。26日下午，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我军从大路两侧一齐射击，激战两小时，达到预期目的：打击了日军，长了自己的志气。

起义部队下山取得了初步胜利后不久，转移到刘杜，第二天召开了起义后的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程照轩参加了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后，部队扩编为两个大队，二中队和五中队（后又扩大的）编为二大队，大队长赵杰兼，大队政委程照轩。按省委决定，一大队北上，二大队南下后北上会师。二大队从刘杜启程，路经新泰、泗水、于3月上旬进入费县蒙山万寿宫、大平一带，部队进行休整和军训。并组成若干宣传队到群众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进而密切与群众的联系。3月底，原国民党六区区长程子源（当时改名为程鹏）带民团中队百余人，枪70余支，赶到万寿宫找程照轩，加入二大队，并担任了副大队长兼八中队（民团中队改编）队长。程鹏的突然来到，并非偶然。

当程照轩任中共六区委书记时，就向赵杰、侯德才介绍了程子源的情况，他说：“程子源是我的堂兄，原在冯玉祥部当兵，后升为副连长，因对国民党不满，脱离军界返乡。因他在六区有些名声，被推为国民党泰安县委六区区长兼民团队长。子源这个人比较进步，知道一些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我俩的个人关系较好，我在狱中时，他曾花钱设法营救。他手下有百余团队，百余枪支。只要我们对他的政策对头，争取他抗战是没有问题的。”赵杰、侯德才听后，认为程照轩分析问题透彻，办事有策略，有头脑。他们三人商量后，把做程子源的工作交给了程照轩。他一个人多次登门，利用个人关系，运用党的政策，赢得了一颗信任的心。程子源对

程照轩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照轩弟，咱们一起干。”当徂徕山起义部队远离六区时，程照轩对程予源的呼唤显得更加亲切，使他越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抗战胜利的前途。于是，程子源毅然找到四支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改编。

到了4月上旬，赵杰、程照轩领导的二大队，经泗水、新泰进至莱芜城以南圣井一带休整。并做攻打莱芜城的准备工作。

部队在南下和北上的行程中，程照轩的模范行动，影响、教育了全体指战员，战士们说：“我们有个好政委，保证了部队的团结、战斗和胜利。”在行军中，他脚上打了几个大泡，走路困难，这时大队有一匹驮东西的马，大家让他骑马走，他说：“我骑马就加重了大家的负担。”坚持和大家一样行军。在通过敌据点和交通要道时，他总是在危险处向大家作动员，“沉着、勇敢！”部队在行军途中休息时，他总是走前走后的，看同志们休息的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无掉队的和病号。部队到宿营地时，他就召开政治干部会议，布置做群众工作和部队本身的工作。他的工作，赢得了全体指战员的赞誉。

4月下旬攻打莱芜城。当时国民党莱芜县长谭远村在秦启荣指使下，一再制造磨擦，扣押四支队留守人员。在战前的干部会议上，程照轩提出了攻城用兵的意见。他提出。①突击的方向应放在城西门，一部插到东门，一小部迂回到北门，以防敌人突围；②在兵力的使用上，用二、五、八中队作为主攻部队；③他与团的其他领导一起在前，共同指挥攻城的部队。28日晨，赵杰、程照轩率二、五、八中队，首先攻破莱城西门，部队迅速入城，一枪未放，生擒了反动顽固县长谭远村、县大队长景肇令，尽收其武装300余人。当天，北路部队也赶到莱芜城。南北两路部队在城里会师。攻克莱城后，程照轩召开了政工干部紧急会议，布置部队进城后的工作，强调部队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去做，并组织宣传队向城里市民进行宣传。他亲自向俘虏兵讲我军对俘虏的政策，他召开了士绅名流的座谈会，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紧接着，他又布置与北路军（除四支队外，还有三支队一部和刚从张里元部拉出来的部队）的会师，为搞好团结，他要求本大队的人员移到城外驻防，把城里的房子让给北路军住。

攻克莱城后，四支队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洪涛，政委林浩，副师长赵杰。该师下辖3个团，二团团长赵杰（兼），政委程照轩，副团长程鹏，政治处主任刘其人。六月初，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撤销“独立师”番号，恢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团的编制未变。这时，二团奉命南下鲁南，7月中旬，二团在滕县的冯卯、高庄、万庄、西集镇等围寨对国民党土顽势力进行了20多次战斗，痛击顽军申从周部，共毙敌200余名，俘敌150余名，缴获长、短枪100余支，拔除了部分地主山寨。随即北上沂水岸堤，四支队各路部队在岸堤会师休整。四支队从成立的七个月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战泰沂山区，为坚持山东抗战屡立战功，在山东抗战史上写下了璀璨的一页。

### 不负重托立新功

1938年7月，省委调程照轩任民运部长，不久任组织部长。1938年12月省委改称山东分局，程照轩仍任组织部长。1939年4月，为了使党中央全面了解山东的情况，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根据中央的通知，山东分局组成了有山东党、政、军各组织成员代表60余人参加的工作报告团，由程照轩带队，于4月24日从沂水王庄出发。途中屡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程照轩领导着大家，一次次化险

为夷，保全了革命同志。10月到达延安，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当月，山东分局党组织选举程照轩为“七大”代表。因大会延期召开。程照轩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直至1945年。学习期间，他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目睹了延安的革命精神，坚定了革命信心。

1945年7月，鲁中行政公署成立，10月，马馥塘任主任，程照轩任副主任。1946年，鲁中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时，程照轩在鲁中区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九一”指示，深入下层和农村，组织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土改，首先是大地主、大恶霸、大汉奸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后，有150万亩土地回到了贫雇农手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积极投入“反蒋保田”运动，后方支援前方，自愿参军形成高潮。1947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鲁中解放区。2月，鲁中成立支前委员会，马馥塘任主任，程照轩任副主任。为加强前后方联系，统一前方民力物力的供应，保证支前任务的及时完成，决定成立前方办事处，程照轩兼任主任，下设民力动员、粮食、交通、总务等科及工作队等。6月，泰沂山区一度被30多万国民党军队占领，斗争形势恶化。这时，程照轩等领导干部，领导广大群众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别是组织民工，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的作战。如在陈毅等同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进行的鲁南战役和莱芜、孟良崮战役中，程照轩等出色地完成了支前工作。1947年7月4日的《鲁中大众》报道：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鲁中有100多万人支前，4.1万余人参加主力军，11万男民兵、4万女民兵坚持斗争，组织了20个子弟兵团，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鲁中为支前共动员出民工约160万人次，出粮近8000万斤，从渤海区运粮5000万斤，出鞋约50万双。到1948年初，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除被歼以外，大部被迫撤出了鲁中山区。

1948年6月，鲁中、鲁南、滨海行政公署合并为鲁中南行政公署，李乐平任主任，张劲夫任第一副主任，程照轩任第二副主任。9月，鲁中南支前委员会成立，程照轩任委员。10月，华东支前委员会成立，程照轩任委员兼财政部长。为了支援淮



海战役，在华东军区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华东军区支前司令部，傅秋涛任司令员，张劲夫、程照轩任财粮部正副部长。程照轩在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9月的济南战役中，鲁中南投入民工50多万及大量财力物力。在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动员190余万名民工、民兵，38万辆小推车，6万副担架，4万多副挑子，向前方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弹药和吃的穿的用的等，整个后方忙个不停，一幕幕后方为前方的激动人心的画面，保证了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同志曾赞扬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1949年4月，程照轩任支前司令部财粮部部长。这时，我百万雄师过江，捣毁了南京蒋家王朝，随即解放了上海。程照轩在支前工作中，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程照轩主要是在国务院的部、局工作。1966年7月，程照轩在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早逝，终年58岁。197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程照轩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评价“程照轩同志几十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是他逝世十多年后，历史对他的评价和结论。人民不会忘记这位功臣。正如张劲夫同志在《对程照轩同志的怀念》一文中形象地写道：“古人说，往事如烟。我的经历似乎与古人所说有点不同，有些无关紧要的往事，似是如烟，逐渐淡忘；而有些重要的往事，印象深刻，一直刻在心的深处，不是过眼云烟，而是浓墨重彩的画，是往事如画，一幅幅战斗悲壮的画，很难忘记，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对程照轩同志的战斗友情，一直怀念在我心中。一个人能活在友人的心中，说明他并没有死去，而是常在的。”

# 转变中的山东教育

孙陶林

1945年，是山东教育大转变的一年。

1944年底的山东全省行政会议，检讨了过去几年山东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明确规定了新方针：一、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二、在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三、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又重于儿童教育；四、战争和生产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重于一般的文化教育。我们1945年的山东教育工作，就是在贯彻执行这一新方针，也就是实现从旧教育到新教育的转变。为了贯彻上述新方针，实现教育工作这一历史的转变，干部教育是被重视了，首先成立了以提高在职干部为主的山东省抗战建国学院，一部分长期埋头于实际工作的县级以上现任干部，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在自学为主指导为辅、自由思想民主学习的新的学习方法指导之下，整理了自己的思想，清算了抗日民主的立场，检查研究了各种政策，长期在工作中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与工作问题一般的得到了解决。各行政公署也都以原有普通中学转变其性质，或新成立了自己的以提高现任干部为主的干部学校，如鲁中有鲁中公学，滨海有滨海中学，渤海有耀南中学，鲁南有鲁南中学，胶东有建国学校；各专署的普通中学（如胶东的四海中学）也都一律转变了性质，将原有的普通中学班次，经过短期政治教育，动员参加实际工作。仅胶东一地就有四千多青年参加了根据地建设的军事、政权、民运、经济等各项工作，还有一部分当了教员。原来没有中学的（如鲁中、滨海）各专署，也都抽调干部，建立了干部训练的机构。一年以来，在这些学校里，就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政权与群众工作在职干部受到了训练。由于教育内容以整风为主，辅之以业务，都是他们的工作问题与思想问题，又采用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所以，一般的干部都树立了比较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步地转变了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不管

作者简介：

孙陶林（1911—2001），原名传文，江苏铜山人。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本文原载1946年1月1日《大众日报》。



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都提高了一步。大多数县份又都普遍建立了县学或举办了不经常的训练班，进行了定期与不定期的不脱离生产的村干训练班。一年来这种村干的训练虽无确实统计，但其数目是相当大的，仅据一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就训练了一千来个，这为培养群众骨干、提拔干部做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群众教育方面，旧型正规化的形式主义，基本上是打破了，群众教育开始由官办转入民办，儿童教育被放到次要的地位，成人教育被重视起来，并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小学大部分根据群众需要而缩短了在校时间，改成午学晚学，取消了正规化，大量的成立了儿童识字班，把学校搬到山坡、河崖、田野、树林里去，把教育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组织儿童变工组，推行了小先生制，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小学教员则以较多的时间放在成人教育上，不仅在教育内容上实行了与战争生产相结合，群众学什么就教什么，而且强调教育结合中心工作。今年沂南参军运动，教育的作用是极大的。不少的教员都直接参加群众运动，进行翻身教育，组织群众的翻身斗争，深入群众组织变工组，参加变工组（沂东的变工组大部分是通过夜校识字班进行教育以后由教员组织起来的），和群众一起劳动生产，在生产中教育群众。由于教育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的翻身生产结合，使群众又普遍认识到文化翻身的重要，教育不是与自己无关的额外负担了。因而涌现出大批学习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仅懂得一般的抗战道理，而且能写信、看报和给大众日报写稿了。由于群众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我们实行了教学中的群众路线，培养了大批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教师和小先生（老区一县就有一两千），这使群众教育的普及大大推进了一步。在组织形式上，也开始注意了照顾群众的自觉自愿，发展了黑板报、读报组、通讯组、集市宣传等多样的方式，在村学里还建立了干部学习组，部分区还建立了区学，加强了村级干部及群众骨干的教育，创造了不少的新形式。打通教育干部思想，是贯彻教育改革的首要一环。在一年来的实际工作中，一般教育行政干部脱离现实的孤立主义思想受到了冲击，群众观念大大地增强了。在实际行动中也开始摸索出为群众服务，与实际结合，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初步经验。小学教员普遍地进行了整风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逐渐确立起来，老一套的旧型正规化，脱离群众与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也在逐渐克服着，他们的政治质量

大大地提高了。不仅在教育工作上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与教育英雄（如滨海的张建华），创造了各方面的不少典型，而且在各方面工作上都起了一定的积极带头作用（如鲁中今年就有几十个教员带领大批青年参军），因此获得了社会上的尊重，这将给今后山东教育建设与发展打下基础与开阔道路。

日本投降以后，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与解放区的扩展，也展开了文化战线上的大进军。为了团结与改造新解放区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服务，普遍开办了中小学教员文化人知识分子训练班。在这些训练班中，不管在教学内容或教学方法上，都打破了过去老一套的教条主义与注入式恶习，实行了发动学员控诉敌伪罪行，展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新方法，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大量开办了普通中学，一部分是新开办的，一部分是就新收复城市原有中学改造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干部学校为了适应新形势而转化的，现在全省已有将近三十处，一万多青年学生解除了失学的痛苦。在这些中学校里，已经一扫敌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余毒，正在进行着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民主自由的学习生活，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劳动生产的行动锻炼，正在引导他们向着人民的勤务员，新中国的建设者来铸造自己。新解放的中小城市里，大半部已建立了民众教育馆，进行城市社会的一般宣传工作。在广大新解放的城市与乡村中，小学也迅速而普遍地成立起来。莱芜城关收复还不过二十天，就开办了十三处小学（内一个完小），而这些小学一开始就是在群众需要的基础上，贯彻民办公助的精神，就与群众的经济生活、生产劳动相结合，向着新型小学前进，不再走旧型正规化的老路。成人教育也正在和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基础上蓬勃地开展着。临沂南关清真街的妇女识字班，就是在妇纺小组的基础上，通过群众路线——启发群众的自觉自愿与经过积极分子酝酿启发成立，内容与方式又能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发展起来的，且已提供了在新地区开展群众教育贯彻新方针以不少实例，使今后可以避免再走弯路。

正在开展着的今年的冬学运动，是在教育改革的已有基础上进行，而又贯彻教育大改革的方针的，形式主义，被进一步的克服，群众路线也得到更具体的发展，教育改革运动，正在大踏步地前进。

然而由于犯了贯彻新方针的急性病，执行政策的片面性，领导上的一般化，忘了“掌握方针，照顾实际，确定步骤”，因而干部教育，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未能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重视了成人教育，放松了（部分地区简直是取消了）儿童教育，机械地强调了政治教育，强调结合实际，忽视了群众的文化需要与系统的思想教育。对小学教员的团结使用和改造，也要求过高，强调群众教师，排斥不合于主观要求的知识分子为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尽力。这些都使我们山东的教育改革工作遭受了不少损失。克服上述缺点，将使我们的山东教育，在一九四六年做到健全而顺利的转变。

# 王嘉麟重赴鹿鸣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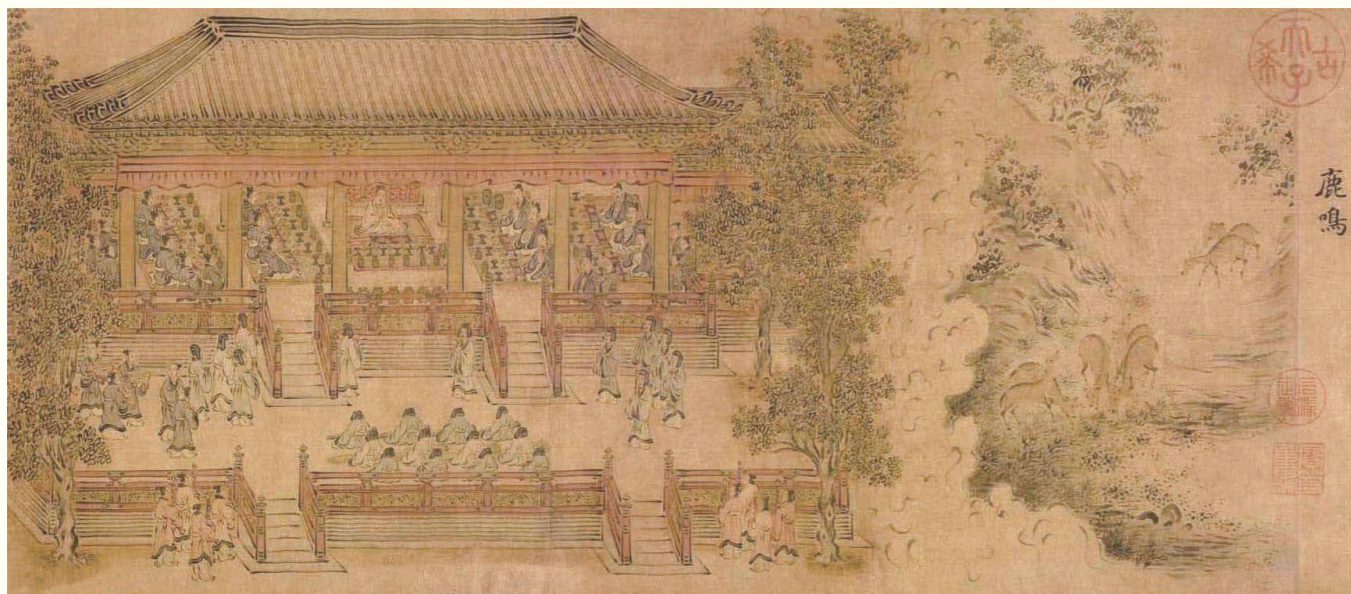
平凡

王嘉麟，字孚吉，号金泽，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生于费县东埠村（今属临沂市兰山区）。自幼聪慧，胸怀大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参加乡试，以经魁（第3至第5名）考中举人，选授峯县训导。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进士，选授江西新淦县知县。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广东发起虎门之战，道光皇帝下令对英宣战。由于军需供应任务繁重，王嘉麟被调往福建德化，筹办军差，他克服各种困难，确保军需供应充足。因为政绩卓著，王嘉麟被调往江西临川。他捐出养廉银，带头募款，修筑城垣。不久，王嘉麟被加授知州衔，后来调到南昌府的“二府衙”吴城镇，升任同知之职。

咸丰二年（1852年），王嘉麟被派往浙江龙泉，抵御太平天国起义军。他实行团练法，组织民众自卫，抗击太平军。因其守城有功，升职为瑞州知府。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部攻破瑞州城，王嘉麟身上多处受伤，投河自尽时被部下救起。朝廷将他革职，让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直到咸丰七年（1867年）七月，瑞州城收复之后，王嘉麟才官复原职。

咸丰九年（1859年）春，王嘉麟获准回籍奉养老人。他原打算在费县老家安享晚年，怎奈，咸丰十年（1860年）当地农民起义军幅军势力强盛，山



东团练大臣杜翻奏请朝廷，委派王嘉麟督办团练。王嘉麟临危受命，让弟弟王殿麟当助手，修筑圩寨，训练兵勇。每次与幅军作战，他都让自己的亲属冲在最前面。同治二年（1863年），总兵黄国瑞彻底剿灭了幅军，亲手书写“全忠孝”匾额，褒奖王嘉麟。

王嘉麟还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崇文兴学，教化一方，办事公道，造福桑梓，是德行高尚的乡贤。

光绪五年（1879年），87岁的王嘉麟重遇鹿鸣。

所谓“鹿鸣”，即鹿鸣筵，是古代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袭。乡试放榜次日，官方备下筵席，宴请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因为筵席上要诵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而取名为“鹿鸣筵”，有祝贺之意。至于“重宴鹿鸣”，则是士子乡试中举满60年后，皇帝御赐庆典大宴。

王嘉麟27岁中举，如今已经87岁，是德高望重的耆绅。时任山东巡抚周恒祺闻知此事，专门题奏朝廷，请求光绪皇帝让王嘉麟参加御赐庆典大宴。光绪皇帝下了一道谕旨：

周恒祺奏“耆绅重遇鹿鸣恩与筵宴”一摺，道衔、前署瑞州府知府王嘉麟，早年登第，由知县荐保知府，旋因养亲回籍，现在年逾八秩，乡举再逢，洵属艺林盛事。著加恩赏给按察使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以惠耆年。欽此。

士子参加一次“鹿鸣筵”没有什么稀罕，凡是中了举的士子都可以参加。然而，“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得多，乡试中举的士子，60年后还能健在，实为罕见。所以，一生中能够参加两次“鹿鸣筵”的士子，则是非常罕见的。朝廷再次邀请他们参加“鹿鸣筵”，叫作“重宴鹿鸣”，是朝廷对他们最高褒奖。于是，王嘉麟奉旨前往京城，重赴鹿鸣筵席。激动之余，他写了4首七律诗，来记录这一殊荣：

（一）

数行旦诏下承明，又向霓裳队里行。  
乍可追陪唐九老，居然领袖鲁诸生。  
花开甲子蟾宫树，曲奏笙簧鹿野苹。  
圣代崇儒兼尚齿，小臣何以答升平？

（二）

玉笋新班尽少年，惊看鹤发到华筵。  
问名齐诵灵光赋，把袂群疑阆苑仙。  
投刺漫劳称后辈，登场却幸著先鞭。  
倩人代写泥金帖，为报阿婆又偶然。

（三）

红绶饼馅记曾尝，逐逐风尘鬓易霜。  
共道是翁犹矍铄，敢云报国有文章。  
鱼符旧馆惭无状，豸绣重叨兴欲狂。  
六十年来争一瞬，且将好梦说黄梁。

（四）

登龙不碍杖扶鸠，喜有阿咸共此游。  
九度频看丛桂发，六朝难得老身留。  
科名无愧思青史，簪绂多情恋白头。  
更拟琼林寻后约，诸天还许假年不？

# 爆破英雄刘厥兰

高雷

爆破英雄刘厥兰参加八路军前是有着19年工龄的煤矿工人，11岁那年，为了生计他就跟着爸爸后面，到淄博大荒地煤矿下井，给日本人拉炭，幼小的心灵中烙印出日本人的残暴和无情。18岁时，他的父亲在炭井中被水淹死了，这更加重了他的仇恨。在反抗和憧憬中，他学会了爆破技术。

抗战爆发，日本人逼近山东，国民政府倡导焦土抗战，刘厥兰的爆破技术发挥了作用。

他炸毁了日本人的洋房，炸塌了矿井，1938年春天他寻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八路军。

参加八路军后，刘厥兰被安排到工兵训练班学习，第一次执行任务，是炸毁泰莱公路大桥，连续三次摸索，终将大桥炸毁。不久，团里成立了工兵排，刘厥兰调任班长。

他回忆：“在鲁中地区，敌人是屯屯有碉堡，寨寨有围墙。一打起仗来，不管战斗大小，总要和堡垒、寨墙打交道。1940年夏天，我们鲁中军区第二团，把敌人一个营包围在蒙阴县的小张庄。那时候，我们全团不但没有一门炮，就连机枪也很少。因此，敌人依靠坚固的围墙顽抗，我们一连攻了四五天，都没有突破。最后，敌人竟突围逃跑了。”

刘厥兰想：“炸药能够炸断钢轨，为什么不能炸塌围墙呢？”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王凤麟副团长。王凤麟高兴地说：“你想得很对，我们也研究过了，决定进行爆破。”

1940年鲁中部队攻打马石沟伪军据点，这是鲁中军区第一次运用爆破进攻敌人的堡垒。那时候没有火力掩护，刘厥兰顶着弹雨，抱着炸药卧倒，翻滚、匍匐、小跑，接近了碉堡，点燃了导火索。爆炸声中，碉堡纹丝不动，提前冲锋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中，有人开骂了，刘厥兰明白，是火药装填少

了。

刘厥兰回忆：“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军用炸药，仅有的一点工业上的黄色炸药，还是靠淄（川）博（山）区的工人弟兄，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鬼子那里弄来的。炸药来之不易，为了又节省又能使它发挥更大的威力，王副团长决定采用‘内炸’的办法。‘内炸’就是在敌人的围墙和碉堡上挖个洞，把炸药下在里面，让炸药从里面往外炸。为了掩护爆破员在敌火力下挖洞，团参谋长于淞江又设计了一个屋脊式的‘柜子’，‘柜子’上盖着三四层浸湿了的棉被，下面又装了三个轮子，经过试验，可以挡住手榴弹碎片。同志们看了都很高兴，就给‘柜子’起了个名字叫‘土坦克’。”

1941年1月9日，鲁中军区二团向新泰县张家栏子伪军陈三坎据点发起了攻击。上级将打通路、炸围墙的任务交给了工兵排。

据点一周有着坚固的围墙，四个角上高耸着碉堡，密集的火力交叉封锁着围墙外面的开阔地。部队刚接近攻击出发地，敌人就发觉了，枪声像爆豆一样响起来。指战员迅速隐蔽好，单等工兵排爆破成功后冲锋。一班副班长老孟推着“土坦克”就向敌人的围墙移动。敌人的枪弹一齐向“土坦克”砸来。“土坦克”走出不远，老王就牺牲了。排长李鸾举，站起来窜了上去。还没接近“土坦克”，也负伤了。刘厥兰和萧副排长跑上去背排长，李鸾举却坚决地命令说：“别管我，快去爆破！部队在等着我们！”萧副排长命令刘厥兰把后面的“土坦克”推上来，继续前进。等刘厥兰把第二辆“土坦克”推过来，敌人暴雨般地火力射向副排长推的第一辆“土坦克”。走着走着，副排长的“土坦克”在距离围墙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一个矮个子，敏捷地钻进火花迸溅的枪林弹雨，闪烁在烟雾之中，把牺牲的萧副排长和受伤的老杨背了下来，他就是刘厥兰。这时候，副团长王凤麟也上来了。刘厥兰刚准备继续去爆破，副团长却严肃地命令说：“带上炸药，跟我来！”

刘厥兰回忆：“他把我领到一个小沟坡上，指着敌人的一个碉堡叫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一个碉堡下边有两个射击孔。上面那个，正疯狂地向外喷着





火；下面那个黑洞洞的，鸦雀无声。副团长轻声地对我说，看到了吗？我注意它老半天了，敌人一直没有从这里射击。我把上面那个封锁住，你把炸药下到下面那个孔里。说着，便把他那支带瞄准镜的法国造步枪，伸在土坡上。我点燃了导火索，抱起炸药，在副团长的掩护下，一口气跑了上去。仔细一看，原来下面那个射击孔在里面堵死了，有半截洞子正好放炸药。我把炸药狠狠地塞了进去，又用两块石头堵住了外口。刚跑到副团长身边，便听到‘轰隆’一声，碉堡垮了大半。也就在这个时候，团长命令撤出战斗。原来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了。”

从此以后，刘厥兰开始潜心研究爆破技术。1941年4月14日为了迎接一一五师老大哥，鲁中军区部队决定攻下泰安的茅茨据点，作为见面礼。

茅茨据点位于泰安大汶口东部，凭借着一座大庙修成，有一个三层高的大碉堡，墙壁有一米四五厚，碉堡外面是一道用砖和石灰修成的围墙，有18个鬼子和60多个伪军盘踞在里面，蹂躏着方圆三四十个村子的群众。

上级把爆破任务交给了刘厥兰和两个新来的战友。夜色苍茫中，刘厥兰三人接近了围墙，炸毁日军碉堡必须打通围墙，上来几名战友刨墙，刘厥兰抱着炸药在旁边等着，叮当的声音惊醒了围墙里面的敌人，所有的伪军都吓得钻进了碉堡，撒豆般的子弹从刘厥兰他们头上飞过。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之后，围墙打通了，刘厥兰抱着炸药钻进去，因为伏在地上太久，火柴受了潮，他用了将近半盒火柴才将炸药点着，药太少，墙太厚，只把碉堡炸了一个洞。

搜集了所有的炸药后，刘厥兰又进行了第二次爆破。

他担心火柴出问题，先在自己的阵地里把炸药点着了，然后抱起来就往里跑，燃烧着的导火索冒着火花，哧哧作响，大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他跑到碉堡跟前，把炸药塞进已炸开的洞里，填满碎砖，才钻出围墙，还没回到阵地，在他的身后，天塌一般，碉堡粉碎了。

这次战斗，是他们开展爆破运动以来最顺利的一次，没有伤亡便攻克了敌人盘踞的一座坚固的大庙，除了活捉了两个鬼子，其他鬼子和伪军全部葬身于他们的这个堡垒之中。在这次战斗中，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爆破员姜长荣去爆破时，先点火怕路上暴露目标，又怕炸药在半路上爆炸了，因此到了爆破点才点火。到了爆破点以后，敌人一打枪，他心里一慌，竟把导火索和包炸药的布一起点着了，三十多斤炸药，全熬了膏药。

战斗结束以后，大家纷纷谈论着“点火”这个问题。有的甚至说，很多同志的牺牲与“点火”有关。刘厥兰认为，“点火”这办法确实不够科学。先点火再送，人到哪里，火星也跟到哪里，容易暴露目标，遭敌杀伤；到了爆破点再点火，又增长了在敌火下的活动时间，也不安全。怎样才能把“点火”改进改进呢？

一天，刘厥兰去向王凤麟副团长请教，看见副团长正在屋里边看边画地研究什么。地上放着一块半尺来宽、一尺多长的木板，木板上绑着一个迫击炮弹，弹头已经卸掉了，插上了一个手榴弹的木把。刘厥兰很好奇，问他在干什么，王凤麟回答：“人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迎接红五月，我也想给鬼子准备点新‘干粮’。”原来他在用炮弹改造“手拉雷”。刘厥兰看着“手拉雷”上的手榴弹把，对王凤麟说：“副团长，爆破的‘点火’，要能像手榴弹拉火那样就好啦。啥时用，啥时候一拉……”

副团长忽然打断了他的话，兴奋地说：“快说说你的办法！”刘厥兰完全被他弄懵了，急忙说：“我?我还没有想出办法来呀！”

“怎么？你还没想出办法来？你刚才不是已经把办法告诉我了吗？”便指着手

榴弹的木把说：“把拉火和雷管之间的导火索换成长的，包在炸药里，那不就像手榴弹的拉火一样了吗？”

刘厥兰回忆：“他这一说，我心里立刻亮堂起来。高兴得连向副团长告别都忘了，撒腿就跑回排里，立刻和排长动手卸起手榴弹来。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同志们心里的疙瘩也解除了，爆破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各连都成立了爆破小组。爆破成了一门必学的科目，王副团长和我们工兵排也更加忙碌起来。就这样，我们打一仗，进一步，逐渐掌握了爆破这门技术。”

刘厥兰颇有有心计，每次爆炸，他都把成功和失败进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多么厚的墙要用多少炸药，怎么使炸药少而效力大，圆炮楼和方炮楼应该怎么炸等等。以此改进了爆炸装置，还创造了火力掩护工兵爆炸的战术。刘厥兰不但丰富自己还言传身教，他培养的爆破手就有20多名，他们犹如一门门小钢炮，在每次攻坚战斗中，不断摧毁着敌人的碉堡工事。

1941年8月下旬，顽军五十一军又向我鲁中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山东境内的日、伪军及其他顽军，也一齐从三面向我夹击过来。于是，山东八路军开始了反顽斗争。

10月9日的晚饭后，八路军山纵一旅二团通信员忽然来叫刘厥兰到团部去。刘厥兰以为是王凤麟回来了。刘厥兰回忆说：“他在张店打伏击时负了伤，从此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到了团部一看，王副团长仍没有回来。吴瑞林团长对我说，蒙山的天桥崮驻有顽五十一军的六八〇团，上级决定消灭它。接着，吴团长又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地形和敌人的工事情况。要打下天桥崮，第一关就要炸开敌人的围墙。你在爆破方面有了些经验，因此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们决定用三挺机枪掩护你。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你看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尽量解决。首长的关怀、信任和鼓励，使我充满力量和信心。我毫不犹豫地就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回到班里，刘厥兰和副班长赵洪昌研究，决定两个人一同去完成这个任务。刘厥兰先上，万一发生意外，赵洪昌打接替。

天桥崮山势险峻，除了光滑的岩石以外，到处长满了黑乎乎的酸枣丛。天桥崮上顽军配备机枪7挺和步枪130余支，从群众中抢来10余口大缸的储存粮食，足够吃一个月；崮东边作为防守正面，修筑有16个地堡；崮西边因为山势较高，筑有4个地堡，堡与堡之间由于岩石坚硬都没有打通，只能单独固守，缺乏联络。为了防止我军进攻，在斜坡小道30米处炸开了约宽10米左右的一个大缺口，顽军上下采用绳子软梯通过。刘厥兰左臂抱着炸药，右手紧扣住石棱，开始了艰难的攀登。离围墙只有丈把远了。就在这个时候，刘厥兰登掉了一块石头，脚腾空了。他急忙用牙咬住炸药包，两手狠命扣住石棱，这才没有摔下去。可是，滚动的石头却给敌人报了信，机枪、手榴弹立刻飞了过来。

刘厥兰回忆：“好在子弹全从头顶上飞了过去。我喘了喘气，又继续向栅栏门旁的碉堡爬去。快接近碉堡时，敌人的侧射火力，打得我头前的一块岩石碎末乱飞，很难通过。这时候，山下的同志们正在一齐喊着冲杀吸引敌人。我心里正着急，忽然敌人封锁我的机枪停止了。接着又听到‘呱哒’一声，又是一声。就在这一瞬间，王副团长讲课时的教导，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子：‘一个好爆破员，越在敌人封锁很紧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机动。敌人的子弹总有打完的时候，我们就要利用他换梭子、压子弹的短暂时间，果敢、迅速地冲上去。敌人的枪不可能从射击孔里伸出来向碉堡根射击，子弹又不会拐弯，因此越接近碉堡越安全。’我想到这里，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敌人的机枪卡壳了。心里一阵高兴，翻过岩石，我便猛

扑向敌人碉堡。我把炸药靠在碉堡和栅栏门的接合部上，拉了火翻身向山坡跳去。不一会儿，忽然整个天桥崮都颤抖了一下。抬头一看，山顶上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烟火冲起多高，碉堡、栅栏门，全随着烟火腾空了。与此同时，满山响起了急促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同志们一股脑儿冲进了围寨。”

总攻开始了。东西两面发出两发白色信号弹，10多个石头外裹棉花的火球同时射上山头地堡周围，崮上杂草顷刻间熊熊燃烧起来，将地堡照得如同白昼。独木梯组用了不到5分钟搭好梯子，突击队、爆破组如离弦之箭，迅猛出击，仅用了3分钟纷纷登上山头。在我军轻重机枪火力网的掩护下，爆破组连续炸毁10多个地堡，突击队乘胜攻至崮顶展开围歼战。枪声、爆炸声、“缴枪不杀”的怒吼声交织成片。战斗历时25分钟，共毙伤顽军30多人，俘虏顽军连长以下1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另炸毁2挺）、步枪130多支、子弹2万多发和电台1部，守顽全部就歼。被我军一、二营各围在火连平、大山顶两个小崮各一个排的顽军，也举手缴械投降。我方仅牺牲7人、伤19人，胜利完成了强攻天险收复天桥崮的战斗任务。

马鞍山位于今淄博市淄川区淄河镇大口头村南，海拔616米，是淄河上游的一个马鞍形山峰。顶端双峰突兀，四围悬崖如削，惟有山前一条石凿小道可以通往峰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1941年，鲁中八路军占领了马鞍山。此山就成了安置伤病员和抗战家属的“小后方”。1942年11月9日，千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马鞍山疯狂进犯。在山上养伤的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麟拄着双拐组织起30余名伤病员，同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此时，正在山上的刘厥兰也投身于其中，被王凤麟分配守卫后山。激烈地战斗进行了两天，王凤麟多处负伤，自戕殉国，刘厥兰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万幸的是，由于树枝的托挂，他幸免于难。

1944年7月1日，山东军区召开了战斗英雄大会，刘厥兰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大会上，记者询问刘厥兰：“你为什么这样勇敢？”刘厥兰回答：“我是个工人，我牺牲是为了党，为了自己！”

抗战胜利后，刘厥兰随鲁中军区“老二团”进军黑土地，成为解放军“旋风部队”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三团的一名爆破专家、基层指挥员，经历了解放东北的历次战役，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椰子飘香的海南岛。后来，刘厥兰随四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据说，刘厥兰留在了辽宁抚顺。

## 曹嵩之死系列考据（下）

臭咸鱼

### 曹嵩死亡时间考

而关于曹嵩死亡时间，争论的就两种情况：

- 1.在曹操一伐徐州之前【最晚不过初平四年（193年）夏】；
- 2.在曹操一伐徐州之后，二伐徐州之前【兴平元年（194年）春】。

可供参考的史料，共五条（注：从此节开始，史料重新编号）。

- A.陈寿《三国志·武帝纪》：阙宣之乱，一伐，（初+曹嵩之死），二伐。
- B.陈寿《三国志·陶谦传》：阙宣之乱，一伐，二伐（未提及曹嵩之死）。
- C.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及《陶谦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曹嵩之死，一伐。
- D.范晔《后汉书·陶谦传》：阙宣之乱，（初+曹嵩之死），一伐，二伐。
- E.范晔《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曹嵩之死，应劭逃亡。

#### 分析——前人的意见

卢弼在集解《三国志·武帝纪》中的注文：

- 1.曹嵩之死，在初平四年，陈志盖追言之，故曰“初”。《陶谦传》亦在初平四年，《通鉴》同。——卢弼认为“曹嵩之死”在“一伐”之前。
- 2.酈道元《水经·泗水注》：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虑、睢陵、夏丘等县。以其父避难，被害于此，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自是数县无人行迹，亦为暴矣。——酈道元认为“曹嵩之死”在“一伐”之前，并引发屠城事件。
- 3.《三国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所云亦同。（陈寿《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只载“一伐”战况，并未标注时间，也未说明“一伐”与“曹嵩之死”有何关联。
- 4.《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云：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谦不奉诏，曹公得谦上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韦昭认为“曹嵩之死”在“一伐”之前。

由此可见：卢弼、酈道元和韦昭是支持“曹嵩之死在一伐之前”这个观点的。

按照前文所列史料，“曹嵩之死”引发“一伐”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先是以韦昭的《吴书》记载，范晔在《后汉书》中继承，再者，酈道元在《水经注》中二次继承，到近代卢弼也表示认可。可见此说的地位稳固。

而裴松之以他做注的风格，引用《吴书》仅仅是对“曹操下诏书给陶谦罢兵”

这种说法进行了否定，而未对“曹嵩之死”引发“一伐”做任何见解，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裴松之对这个时间顺序也是没有疑问的。

回到之前的话题上来，陈寿写《武帝纪》这个“初”字用的莫名其妙，依我之见，很可能是笔误。

陈寿写完“一伐”后，发现忘了补充“曹嵩之死”了，古时纸张（写作材料）昂贵，陈寿又是私人修史，从节约的角度，他就没重新删改，而是加个“初”字接着写“曹嵩之死”和“二伐”。陈寿自认为也能读得通顺，殊不知为后世留下这么大一个坑。而后世范晔在撰写《陶谦传》时发现这个问题，就把“初+曹嵩之死”挪到“一伐”之前，还原了陈寿的本意。

所以说既然陈寿写了这个“初”字，就是表明：原文涉及事件的时间顺序不是按照文字先后排列的。

#### 其他佐证

1. 范晔《后汉书·献帝纪》：（初平四年）是岁，（徐州）琅邪王（刘）容薨。

2. 陈寿《三国志·臧霸传》：黄巾起，（臧）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

可以脑补：本年（初平四年），琅邪王刘容逝世后，国绝，陶谦派臧霸接管开阳，而失去靠山的曹嵩为了自身安全，于是举家投奔儿子曹操。

至于《后汉书·应劭传》的“兴平元年”，我是从曹操二伐徐州的路线上分析的。

因为曹操在初平四年“一伐徐州”时走的是彭城国路线，所以与应劭无涉；兴平元年“二伐徐州”时，曹操从泰山郡进入徐州，因为“一伐”复仇未果，应劭担心曹操会拿自己问罪，故而此时方才逃亡。

于此，范晔才在《应劭传》中写出“兴平元年”，因为曹嵩遇害于泰山郡，太守应劭畏惧曹操而逃亡。

不明就里的人才会把此话当成“曹嵩遇害”的时间为兴平元年的证据。

#### 小结

1. “曹嵩之死”在“一伐”之前（即初平四年秋之前）是前辈史家均认同的观点。

2. 陈寿的“初”字用的有问题，但不影响这个结论。而现在有人仅从《武帝纪》字面上去理解，以为发现“历史新大陆”，标新立异，这是不可取的。

### 阙宣事件考

史料中关于阙宣的记载有四条：

1. 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四年夏）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兖州）泰山华、费，略任城。——初平四年夏，阙宣叛乱，陶谦与阙宣共同攻打泰山郡。

2. 范晔《后汉书·献帝纪》：（初平四年六月），下邳贼阙宣自称“天子”。——初平四年六月阙宣叛乱（《三国志》为夏天，即4-6月，《后汉书》明确为6月）。

3. 陈寿《三国志·陶谦传》：下邳阙宣自称天子，（陶）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阙）宣，并其众。

4. 范晔《后汉书·陶谦传》：下邳阙宣自称天子，（陶）谦始与合从，后遂杀

之而并其众。——范书照抄陈志：阙宣起事后，陶谦先与其共同攻打泰山郡等地，后杀之。

围绕阙宣的话题有三个：

1. 陶谦究竟有没有与阙宣联合？

2. 阙宣是什么时候被陶谦杀的？

3. 阙宣有没有参与劫杀曹嵩的行动？

以下为集解中，《陶谦传》和《武帝纪》中，卢弼辑录的前辈意见：

1. 周寿昌曰：陶谦此传恐多过甚之辞，非实录。谦性刚直，谓过傲则有之，未必至于疏名士而任小人。且既举赵昱茂才、迁广陵太守，何云疏之？其任曹宏，究未闻有显擢。阙宣作乱，谦自应讨而杀，何得云与合寇钞，而复杀宣？后降其军，何得云并其众？魏武不尝降黄巾数十万为青州军邪？盖谦士卒杀曹嵩全家，为所深恨，时载记者多魏臣，不惜诬谦以媚操，故肆诋之如此。观注引《吴书》张昭等哀辞末有云“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时谦已死，昭尚何用谄谀？乃其哀且如是，可以考其实矣。——周寿昌认为：陶谦与阙宣联合是曹操诬陷的。

2. 《资治通鉴》：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杀之。

《资治通鉴·考异》云：《魏志·武帝纪》言陶谦“与宣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陶谦传》亦云“谦始与合从，后遂杀之，并其众”，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借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盖谦别将与宣共袭曹嵩，故曹操以此为谦罪而伐之耳。——司马光认为：陶谦不需要联合阙宣，可能是陶谦的将领与阙宣一同劫杀曹嵩。

3. 牛运震《读史纠谬》卷四曰：谦亦州牧，安有与贼党举兵略城之理？据范晔《后汉书·本传》，乃知谦因贼势盛，以计取之，初与连和，而后遂并之也。——牛运震认为：陶谦与阙宣联合，是陶谦的计谋。

4. 是操虽报私讎，亦假借王命，遂诬谦与阙宣合谋，庶师出有名耳。然以所过残戮，故郡县皆叛应吕布、孟卓、公台反颜为敌，非有文若、仲德三城之固守，操几于不免矣。——卢弼观点与周寿昌一致。

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可以结合前面六节的考据观点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1. 既然陈志提到“陶谦与阙宣联合”，而范书依然继承此观点，看来此事并非空穴来风。范晔都继承了为陶谦开脱责任的“劫财说”，而在这个问题为何继承“抹黑陶谦”的记载？显然，周寿昌只是以“否定史料”的单一方式在辩论，缺乏说服力，还不如牛运震提出的“计谋说”。——陶谦与阙宣联合应该是真实的，司马光说陶谦别将与阙宣联合，只是变通的推测。

2. 史料上并未给出阙宣的死亡时间，按照《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陶谦传》记载顺序：阙宣都应该是死在“一伐”之前。

3. “阙宣之死”很可能牵涉到“曹嵩之死”这件历史悬案中。司马光的推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似乎暗示着：阙宣成了“替罪羊”（或者是承担一半责任者）？

### 最终“真相”

初平四年春，琅邪王刘容逝世，由于皇帝刘协远在长安，无法册立继承人，国绝。徐州牧陶谦指派骑都尉臧霸前往开阳接管琅邪国（琅邪相臧宣可能为此时上任）。在琅邪国避难的曹嵩知道其子曹操与陶谦为敌，于是计划举家西迁鄆城，写信给曹操。曹操得信后，指派泰山郡太守应劭前往郡界接应曹嵩。



夏六月，闾宣在下邳起事。陶谦又得知曹嵩前往泰山郡，于是想出借刀杀人的计谋：一方面派人联系闾宣，宣布为同盟，并承诺借道闾宣北上兖州泰山郡，至任城国劫掠；另一方面授意阴平守将（张闳）率骑兵追杀曹嵩，以栽赃给闾宣。张闳领计而行。

张闳等人在泰山郡费、华县附近追上曹嵩，大开杀戒。事后，张闳获得众多财物，超出之前自己所预料，又舍不得放弃，同时考虑到自己返回徐州后也有可能背黑锅，凶多吉少，于是张闳带着财物率军改投袁术。

陶谦得知张闳得手后叛逃袁术，虽属无奈，但仍依计而行，向曹操宣告：“下邳乱党渠帅闾宣北上泰山、任城劫掠，于费、华之间遭遇曹嵩，将其杀害并夺走财物”，为表“诚意”，陶谦趁势剿灭从任城劫掠返回下邳的闾宣，杀人灭口以安抚曹操。

同时，泰山郡太守应劭迎接曹嵩失败，抵达杀人现场勘查，随后派人向曹操反馈情报：根据现场勘查及证人证言，发现有徐州士兵参与此次行动。曹操自然相信应劭的情报，面对陶谦的“谎言”怒不可遏，于是向陶谦发难。

在证据面前，陶谦无奈承认：“有下属张闳等部分叛变的徐州士兵参与劫杀曹嵩”，而曹操认为陶谦在这件事情上有所隐瞒，加上旧怨，必然是幕后策划者，于是兴兵讨伐陶谦。

陶谦的下属士兵参与劫杀曹嵩这是铁定的事实，面对曹操责难，于是陶谦只能装作一副冤大头的样子，甚至提出是“派张闳等人护送曹嵩，本意并非加害曹嵩”，意图推脱责任给张闳，而曹操自然不信。

后世孙吴韦昭做《吴书》，为了丑化敌国太祖曹操，自然采信陶谦这条牵强的解释。

陈寿《三国志·魏志》，为陶谦避讳，其本传不提“曹嵩之死”，而在《武帝纪》“互文见义”，直接认定陶谦就是“曹嵩之死”的直接责任人。

范曄《后汉书》为陶谦做传时，由于《三国志·陶谦传》未提此事，便去翻看《吴书》中的《陶谦传》，虽未采用荒诞的“护送说”，但改写成“阴平守将劫财说”。另外，这也可能是为传主避讳。

等到范曄写《应劭传》和《宦者列传》时，却忘了《吴书》的那茬，又直接认定陶谦就是“曹嵩之死”的直接责任人。

至此，“曹嵩之死”形成千古谜案，一场众说纷纭的罗生门。

# 和尚与龙头

李存修

平邑县旅游局的车把我送到了地处深山的地方镇九间棚村。在这里陪同我的是已退休的中学校长武京礼。他身边的人开口闭口都喊他武京礼，而我却听成了武经理。没想到还听对了，他其实正是九间棚旅游开发公司的经理。

我一直喊他武校长，他身上知识分子味很浓，身为经理，从来没与我谈及商业和经营之类的事。他几天未露过笑容，但你总觉得他可靠、实在、可以信赖。他做事规范，一板一眼，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只是在爬山时，他不时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他留了一脸胡子，像是故意把自己打扮的年长一些。要不，无人会相信他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

在九间棚的第二天上午，武校长领着我爬和尚崮。我问为什么叫和尚崮，是因为崮上住着和尚吗？

校长给我讲了一个意义深远、发人深省的故事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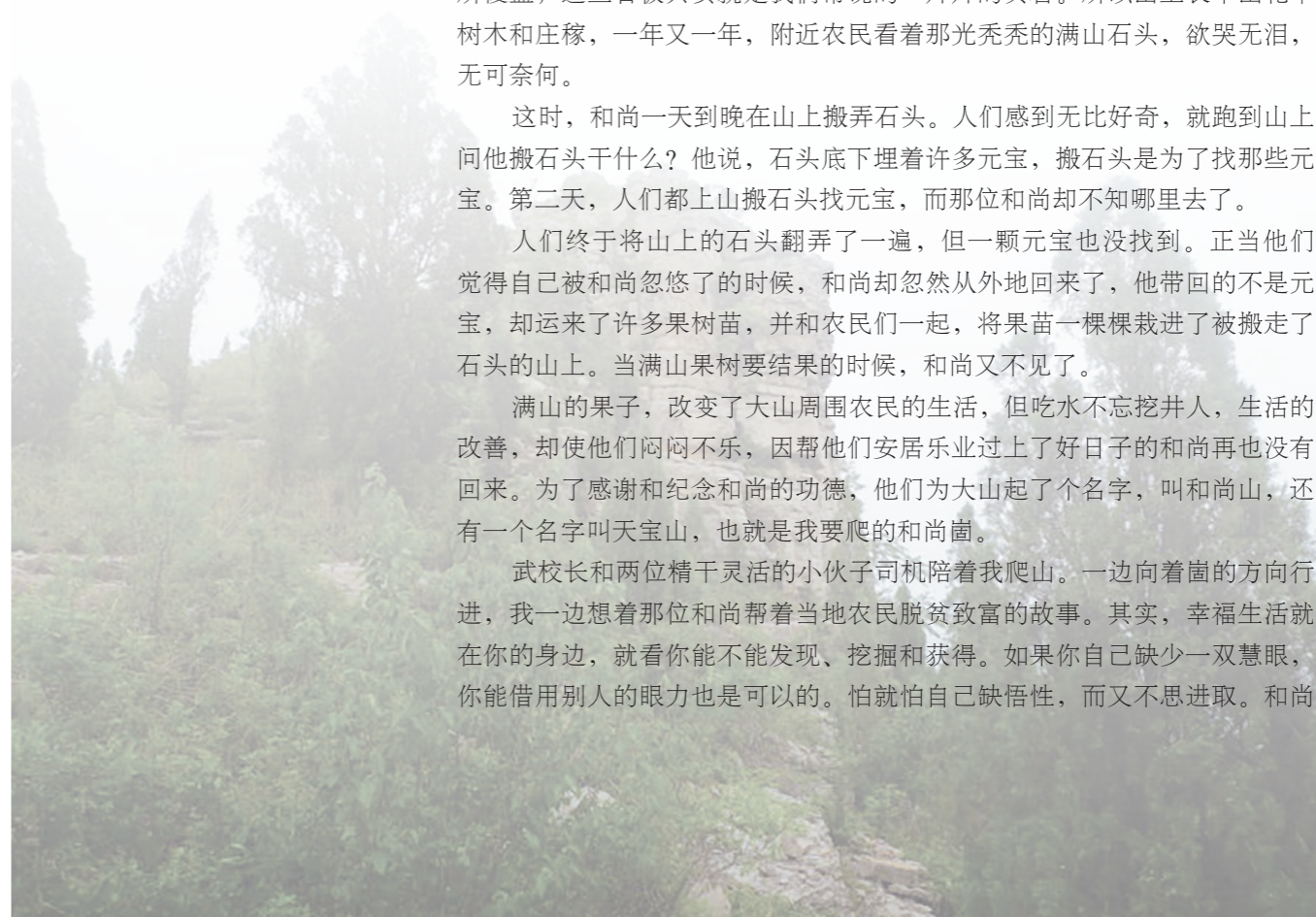
有一年，这座山上来了位从远方云游过来的和尚。和尚见到全山为石板所覆盖，这些石板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片片的页岩。所以山上长不出花草树木和庄稼，一年又一年，附近农民看着那光秃秃的满山石头，欲哭无泪，无可奈何。

这时，和尚一天到晚在山上搬弄石头。人们感到无比好奇，就跑到山上问他搬石头干什么？他说，石头底下埋着许多元宝，搬石头是为了找那些元宝。第二天，人们都上山搬石头找元宝，而那位和尚却不知哪里去了。

人们终于将山上的石头翻弄了一遍，但一颗元宝也没找到。正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和尚忽悠了的时候，和尚却忽然从外地回来了，他带回的不是元宝，却运来了许多果树苗，并和农民们一起，将果苗一棵棵栽进了被搬走了石头的山上。当满山果树要结果的时候，和尚又不见了。

满山的果子，改变了大山周围农民的生活，但吃水不忘挖井人，生活的改善，却使他们闷闷不乐，因帮他们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的和尚再也没有回来。为了感谢和纪念和尚的功德，他们为大山起了个名字，叫和尚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天宝山，也就是我要爬的和尚崮。

武校长和两位精干灵活的小伙子司机陪着我爬山。一边向着崮的方向行进，我一边想着那位和尚帮着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其实，幸福生活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挖掘和获得。如果你自己缺少一双慧眼，你能借用别人的眼力也是可以的。怕就怕自己缺悟性，而又不思进取。和尚



崮周围的人们正因为听了和尚的话，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和尚崮离九间棚不远，满山由一种高高的被当地人叫做滑草的青草覆盖。青草上面，有松树、刺槐，但更多的是花椒树，因我特别注意和害怕它们身上那些比酸枣刺还厉害的硬刺，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我衣服上留下无数小洞的，并不是酸枣刺，而是花椒针。

校长选这条登山的路并不陡峭，爬起来并不难，它的垂直高度大约只有两百米。

同时上山来的那位青年司机，却不与我们为伍。他一手拿着一个空矿泉水瓶，一手拿着根木棒，一路挖山蝎，逮着就往瓶子里装。我问他若是碰到蛇怎么办，他说，要么让蛇跑掉，要么就打死，当地没有捕蛇的人，也没有吃蛇的人。我说蛇汤极鲜。他说再鲜也不会有人喝。

中国南北方的人对这种爬行动物的态度竟是如此不同！

武校长途中挖出了一个圆溜溜的何首乌，如一个大的鸡蛋，沉甸甸的，他把它送给了我。这属贵重的中药材。因我一直在旅行途中，不便食用，几日后转赠给另一位朋友。

或许是和尚影响了农民，他们搬走了崮顶的石头，所以现在崮顶泥土厚沃，草木茂盛，生态良好，走在上面松松软软，舒适享受。但是，明明知道自己站在崮顶，由于浓密的树木遮掩了双眼，崮下和崮外的世界什么也看不清，只好靠着一棵树，心里这样想着：我在和尚崮的崮顶上……

## 二

从和尚崮下来，行不远，又见龙头崮，这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名的一座崮，我们向北一拐，开始攀登。按说，一日二崮还可以，半天二崮则会体力超支。但因山体并非十分巨大，而且心情也好，接着上龙头，也在体力之内。

上到中途，稍有饿感，我随手摘了几个桃子吃下，这在山里被认为是正常之事。桃并未成熟，皮是青的，肉也有点青，核还未形成，只是有点不是木质的白心。吃起来，不苦不甜不酸，纯纯脆脆，万味皆无，但完全可以起到充饥的作用。中间那点白色的桃心，入到嘴里有种淡淡的苦。

刚吃完桃子，武校长又接连给了我两把桑葚，一粒一粒的，粒粒可爱，吃下之后，感觉与青皮桃子大不一样，桑葚已成熟，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美味可口。这无公害的山中鲜果，干干净净的，摘下来就入口，痛快，美极！

龙头崮满山遍野尽是桃树，如果把这里叫做和尚崮，那会更恰当。我们一路从桃林里向上钻。我突然发现，在地边两棵树上，凭空吊着两个袋子，里面好像装着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时心头不禁有些紧张：是不是这龙头崮上出现了毛贼？我试试探探趋向前，细看，原来，一个袋子里装有十几个苹果，另一个袋里装着三四斤干花生。我向四周大喊了几声，无人应对，一定是桃林的主人放在这里，每日来劳作时食用打打尖。这是一种新发现，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现象。

龙头崮属长方型，但又不长，长约有百米多。最宽处有十米，窄处不足五米，像是那种小蛮腰。

龙头崮三面悬崖，只有我们上的这条道可达崮顶。因树密林深，有时几米外谁也见不到谁，我们上去的四个人，喊声此起彼伏，错错落落，给大山带来了无限生机。我们记住了大山，大山同时也记住了我们。但我们只是过客，是探访者，还没有取得长住大山的资格。

## 大美新临沂之——

# 沭河

本 编

沭河发源于沂山南麓沂水县沙沟镇沂山林场，与沂河并行南流，全长约440公里，其中我市境内长178.05公里（其中老沭河长56.7公里），流经我市沂水县、莒南县、河东区、经开区、临沭县、郯城县六个县区。1949年春至1953年底，国家在临沭县大官庄村北向东开挖新沭河，修建了沭河拦河大坝、穿沭涵洞、人民胜利堰等大型水利工程。经过整治的沭河分两路流入黄海，一路沿人工开凿的新沭河入江苏连云港市石梁河水库，循大沙河故道至临洪口入海；另一路循老河道经江苏宿迁市骆马湖、新沂河入海，这一段被称为“沭河古道”。

沭河古道段生态优美，犹如一幅江南水乡画卷，有“中国北方漓江”之称。“河输漓江半山秀，江逊沭河七分幽；无边烟柳水天碧，春在琅琊沂州东”，是对沭河古道风光的真实写照。沭河古道还是一条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之河。古道两岸有齐魏马陵之战古战场遗址、炭山恐龙遗迹、地质构造遗迹、常林钻石发现地、岱涧丹霞地貌、荞麦涧大汶口文化遗址等。



# 沂南“曹嵩冢”画像石考辨

吕宜乐



汉墓中往往有画像石出土，一般说来，汉画像石承载了很多汉代信息，是汉代社会图景的折射、反映和展示，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早已形成了独具文化特色的汉画像石学。有一些汉画像石甚至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状况的表现，是解读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密码。不幸遭盗的汉墓中，若留有汉画像石遗存，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沂南县博物馆有一块被当地群众传称“曹嵩冢”出土的汉画像石就引起了文物专家的关注。

“曹嵩冢”画像石相传为曹嵩冢墓室的组成部分，1947年出土于沂南县砖埠镇大汪庄村西南2公里的高岭上。冢前原立一块中间带穿孔的画像石。墓室3间，皆为石砌。墓室四壁刻有画像，百多年前曾被盗掘，解放前又被群众破除迷信时拆除。该画像石起初被村民当做桥板一直踩踏于脚下，后被镇村干部搬移至大汪庄村大院保护。2009年10月，沂南县文物部门协调镇、村两级，将“曹嵩冢”画像石从砖埠镇大汪庄运至沂南博物馆收藏。



这块采用高浮雕技法精细雕琢的画像石，石灰石质，高90厘米，宽160厘米，厚20厘米。画像内容分为3层：上层是仙树、楼阁、青龙、白虎和手持弓箭的人物等；中间是男女主人凭几端坐于楼阁内，两侧是抚琴、执便面的侍者及排队等候前来拜谒的官员；下层左侧是抛长袖跳鼓舞的艺人，右侧为10人组成的庞大乐队，既有吹笙、埙、排箫者，也有弹琴、击打小鼓的女子。

曹嵩，字巨高，东汉末年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的父亲。沂南汉为“阳都”，与亳州相距几百里，它们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史料记载，曹嵩的养父曹腾，在东汉历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曹腾是汉相曹参之后，东汉安帝时，入宫为宦。邓太后认为他年轻、温顺、忠厚，选他陪伴太子（顺帝刘保）在东宫读书。他为人恭谨，很受太子的喜爱。后与女子吴氏结为“对食”（夫妻），并收养了曹嵩。曹腾侍奉过东汉4位皇帝——顺帝、冲帝、质帝和桓帝，而桓帝的即位更是多亏了中常侍曹腾，曹腾也因此被封为费亭侯，官拜大长秋。俸禄两千石，仅在丞相、太尉之下。

曹嵩在曹腾的庇护下，仕途一帆风顺。在桓帝末年就已官拜司隶校尉；到了灵帝即位，又升任大司农、大鸿胪，先后掌管国家的财政、礼仪，位列九卿，位高权重。东汉末年，朝中有花钱捐官的制度，曹嵩并没有满足于大鸿胪的职位，花去万金为自己捐了太尉一职。太尉居“三公”之首，曹嵩由此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曹腾死后，曹嵩世袭了费亭侯的爵位。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注引《世说新语》和《吴书》所记，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十常侍乱政时，曹嵩辞官居于洛阳。因为董卓入袭汉宫、王允吕布诛董卓、李傕郭汜大交兵等事件的发生，洛阳已成是非之地。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曹嵩被罢免太尉，六年（公元189年），外戚何进要求宦官“就国”，于是曹嵩不得已选择了回老家谯县。

按汉制，封王侯者，皆需“就国”，即归于封地、食邑，死后葬于封地。曹嵩辞官后，为何会先居洛阳，后赴老家谯县，之后避难琅琊。《三国志》没有交代，其他史籍也未见明确记载。《后汉书·曹腾传》记载：“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琊。”

《三国志·武帝纪》：“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琊，为陶谦所害。”《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琊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后汉书·曹腾传》：“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琊，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故可认定，曹嵩在琅琊境内被杀。

千百年间，“曹嵩冢”之名在民间流传，并散见于史志中。《太平御览》“沂州沂水条”云：“魏曹嵩冢在县南一百二十五里。”民间传说中的“曹嵩冢”位于阳都故城西部，此地虽和志书记载相符，但因墓室早期已被破坏，曹嵩是否葬此还有待进一步考据。尽管不能确认，但从画像石中所展现的奢华生活场景来看，墓主人绝非寻常人物，结合志书记载和民间传说，曹嵩死后葬于此地的可能性确实较大。

沂南“曹嵩冢”画像石承载着极具价值的文物考古信息，它的发现为历史文化和汉画像石研究提供了新的题材。

# 起航新时代 唱响“好地方”

——关于歌曲《沂蒙山区好地方》的一段往事

王滨

20世纪60年代由李堂全作词、任世成作曲的《沂蒙山区好地方》，曾经唱响一时，深受喜爱。40年后，此曲又有了新歌词。《临沂日报》2002年8月22日发表，并附说明：时值改革开放20年来，沂蒙山区的发展变化亟需反映出来，在征求词作者书面认可，重新推出这首歌。歌词填写人为大型音乐电视《沂蒙之歌》制片人王滨，由前卫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杨晓燕演唱。作为由临沂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市广播电视台、市旅游局等联合摄制的《沂蒙之歌》（迟浩田题写片名）的主打歌曲之一。

近日，笔者与临沂市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曲作家邢宝俊，说起歌曲《沂蒙山区好地方》时，邢宝俊讲述了当年《沂蒙山区好地方》的创作情况：当时的临沂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雷，看了演唱后觉得开头曲调太低沉，建议修改。行署文教局有关领导将修改任务交给金伟生、邢宝俊同志。他们将原曲谱开头的两小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高昂欢快的开头，使整个曲谱浑然一体、热烈明快、积极向上的临沂民间音乐风格，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现。此歌修改完成后，由民歌演唱家韦有琴带着参加了山东省音乐、舞蹈会演和华东“上海音乐之春”，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和当年在沂蒙老区战斗和生活过的陈沂同志的赞扬。从此，这首歌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广泛的传唱。

今逢跨入新时代暨改革开放40年，此歌当与时俱进，把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欢呼跨入新时代的情景写进歌词里，把改革开放40年沂蒙老区的巨大变化写进歌词里，把沂蒙人民爱党爱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沂蒙精神写进歌词里。笔者著《荠菜花》文艺作品集时，对《沂蒙山区好地方》歌词又做了认真修改，此歌曲既保留了原创歌词的特点，又加入了新的艺术处理，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亲和力。

渴望在家乡和在外地的沂蒙父老乡亲，唱响“好地方”，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启航新时代，唱响“好地方”，实现中国梦。

## 沂蒙山区好地方

李堂全 毛 迅 词

1 = <sup>b</sup>E  $\frac{2}{4}$  (女声独唱)

王 滨 邢玉军 改词

中速 优美 喜悦地

任世成 曲

( 5 1 6 1 5 1 6 1 | 3 · 5 | 2 3 1 2 5 2 3 2 | 1 - ) |

1 · 6 5 1 | 6 1 6 5  $\overset{5}{\underset{4}{\text{t}}}$  3 3 2 | 5 · 1 2 1 6 1 | 5 3 5 · |  
沂 蒙 山 区 好 地 方，

5 · 1 2 1 | 5 1 6 5  $\overset{5}{\underset{4}{\text{t}}}$  3 3 2 | 1 · 6 5 6 5 3 | 2 1 2 · |

{	改 革 带 米 好 时 光。
	商 贸 市 场 多 兴 旺。
	沂 河 两 岸 稻 花 香。
	革 命 传 统 美 名 扬。

3 · 2 1  $\overset{5}{\underset{4}{\text{t}}}$  3 | 2 3 2 1 6 5 | 1 · 2 1 2 5 6 5 3 | 5 0 2 3 2 3 2 1 |

开 拓 创 新 永 向 前，  
经 济 建 设 大 发 展，  
山 清 水 秀 人 也 美，  
蒙 山 沂 水 齐 欢 唱，

1 5 6 1 · 2 | 3 5 2 3 5 | 6 · 2 1 2 6 1 | 5 3 5 5 3 |

沂 蒙 老 区 换 新 装。  
国 富 民 强 有 力 量。  
一 年 四 季 好 风 光。  
永 远 跟 着 共 产 党。

|| 1-3 ||  $\overset{1 6}{\underset{4}{\text{t}}}$  || 4. || 2 3 1 2 5 2 3 2 | 1 - :|| 6 · 1 5 3 5 6 |  $\overset{1 2}{\underset{4}{\text{t}}}$  1 - ||

换 新 装。  
有 力 量。  
好 风 光。

# 由石邦杰其人谈现代史料的去伪存真问题

刘 开

据《洛阳伽蓝记》载，晋时隐士赵逸云说：“永嘉以来——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与人，引善自向——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史书不能如实记述历史真实的情况。然而，现今一些史料是否就不存在类似现象了呢？

据我多年从事党史、文史工作的体会，如今的史料虽然写作者主观上力求真实，但仍不免有失真之处。

### 一、现代人不了解历史背景，回忆难免有出入

现代人不了解历史背景，而去追写多年前的历史情况，除有当时资料可查者外，只能访问知情的老人。而老人多忘事，叫他谈多年前的历史情况，难免与事实有出入。如《沂蒙大观》中说东埝头（现属兰陵县）的王占牛，1938年干了汉奸大队长，在东埝头安了据点。这个时间就不对。实际上，1938年日军只是点线占领。莫说东埝头，就是全鲁南也没有日伪据点。当时我到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去学习，从鲁南吴家沟出发，经车辋四县边联办事处到鲁中，除经过国民党的防区要小心外，没有一处有日伪据点（关于1938年王占牛在东埝头安据点，我是从电话听干校老同学郑书箴的夫人贾梅榕说的，我并未看到《沂蒙大观》这部书）。

最近见到老同事左某之子（执业律师），谈及《沂蒙大观》。他说在叙述沂蒙红嫂方兰亭的事迹中，也发现了与事实有出入之处。主要是说方兰亭争取土匪、汉奸石邦杰弃暗投明，干了八路军后任五团某队队长，在对日作战中牺牲。小左听当地老人说，石邦杰干八路时间不长就“反了水”（笔



者注：反水，指归降一方后，又反悔投回原部）。为弄清事实真相，他认真做了调查，并写了文字材料问我，可不可以向史料部门反映。我认为他的这一发现，恰好证明了我“现代人追写历史，仅凭访问老人而记述，难免与事实有出入”的观点。

由于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多，故先将小左调查的情况简述于后：

首先，石邦杰投八路军时只有30余人，并非300余人。石邦杰带领的仅仅是一个小队，不可能到“300余人”。

其次，石邦杰投八路时间很短，接着又投靠了土顽王洪九，后因其准备再干汉奸，被同伙打死，并非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否则，他就应当是烈士。而且，遍查原苍山县民政局《革命烈士名录》，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名。

为了澄清事实，小左说他先后走访了十余名知情人。如左洪溪（83岁，军队副师职离休干部，东埝头村人）、张廷贵（87岁，卞庄镇磐石沟村人，老党员，与方兰亭同村，其父张凤文系在方兰亭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德功（87岁，卞庄镇东埝头村人，原为埝头伪军大队长王占牛的跟班，后参加解放军）、马永庆（85岁，卞庄镇周庄村人，曾在伪卞庄区公所当兵，但实际上为共产党办事）、王德胜（92岁，卞庄镇东埝头村人，曾与石邦杰一同干伪军，曾去过石邦杰的家）等。

据查，石邦杰约生于1910年，死于1941年底，是原临沂市西南乡长城附近人。出身贫苦，但自幼不务正业，曾在洗澡堂内干剃头和搓澡等活。因做坏事过多，在家乡呆不下去，大约于1936年逃到卞庄集（现兰陵县城）“混闲”，后来拉起一帮十余人的土匪，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抢掠而自肥。日军入侵后，伪军在东埝头设据点，当地地痞王占牛组织起伪军大队，下设三个连（亦称中队），每个连下辖三个排（亦称小队），每小队约20—30人。二中队住土楼（现向城镇西），中队长胡付云。石邦杰先是在褚墩干班长，后调到土楼二中队干小队长。1941年初，在方大娘动员下，带领手下约30人，一度投向八路军，住磐石沟村一带。由于其匪性难改，受不了八路军的艰苦和纪律约束，私下里仍纵容部下抢掠百姓、奸淫妇女等。八路军发现后，1941年秋，将其部下分散改编，而将他调到磨山油坊工作。石邦杰因此心生不满而“反水”，携带一支长枪投奔了土顽王洪九。未几，又想去当汉奸，被王洪九部手枪队长姜开燕（现兰陵县卞庄镇林西村人，解放后寄居香港，上世纪80年代去世）打死。

石邦杰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涉及史实的真伪，不得不说。因为一旦这些知情人离了世，就要成为一笔糊涂账。

## 二、我在做党史、文史工作期间也曾出现过不少失实的错误

1.如我写的《苍山暴动的前前后后》一文，由于不了解历史情况，又未作充分调查，关于暴动牺牲的人数，根据郭大娘（暴动领导人郭云舫的夫人）和参加暴动者王士一、杨冠五等反映，都是52人，我也人云亦云地写牺牲52人。后经党史办魏景山调查落实，只有三十几人。我还把一个小名（乳讳）赵淘气的人与他的大号（名字）当作了两个人。我听杨冠五说刘文漪字淇园，信以为真（实际淇园是另一个人），竟把两个人当作一个人。

2.受浮夸风的影响，对某些正面人物的事迹往往有夸大和人为拔高情况。

3.引用资料未作考证，以讹传讹。如，1986年我离休后回原籍枣庄，继续义务整理《苍山党史大事记》。其中有一段我是引用《山东解放区大事记》上的：“1940年10月25日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决定成立鲁南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

邝任农任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彭嘉庆任政治部主任，梁兴初、杨涤生、萧鸣、许言、石世良、李乐平分别任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韩去非看到后来信问我是采用哪里的资料，并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去信询问他错在哪里，他回信作了大篇幅的具体说明。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漏了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副司令员万春圃，政委邝任农、赵搏，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继为曾明桃。其他限于篇幅就不详述了。总之，这就是原资料有误，以讹传讹的结果。

4.中国历史上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导致回忆录等文章出现与历史真实存在部分出入的地方。但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反映和书写历史。

5.去年夏天，我在《齐鲁晚报》上看到苗得雨的一篇文章，介绍他收藏的一本46年的《山东文化》，他说《山东文化》创刊于1943年1月。而我记得很清楚，1942年7月曾看到《山东文化抗战五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朱瑞（山东分局书记）纪念他夫人陈若克的文章。因此，我认为《山东文化》能在1942年7月出特刊，其创刊应当早于1942年7月。我写了对创刊日期质疑的文章，报刊转给了苗得雨。他给我回信说：“《山东文化》是1943年1月创刊，是没有疑问的。你看到的特刊，可能是临时出的。”我还想进一步取证，给抗日时期做文化工作的王庆祥同志去信询问。他回信说：“对《山东文化》创刊时间问题，对不起，一无实物，二无记忆，没资格作证。”接着他说：“党史、文史仅凭个人记忆出入很大。例如1945年7月打梁麻子，罗华生是正指挥，王六生是副指挥，参战部队有滨海二军分区四团、鲁南三军分区五团。其他部队很多（限于篇幅从略）。分工四团打王海子东南面，五团打北西面。五团九连首先爆破成功，突进一个排。恰巧敌方鲍参谋长带一个特务连巡逻至此，将我一个排全歼于圩内，只排长一人逃回（当即宣布撤职）。但梁麻子害怕，带小老婆化妆夜间逃跑，正闯入五团三连设伏地带而被俘。因天下大雨，王海子地势低洼，平地水深二尺，我方弹药多为土造，受潮哑火，被迫撤出战斗。四团干战认为打了窝囊仗，不愿回临沭。这时，四团团团长贺健正在党校学习，罗荣桓闻讯派贺健骑马星夜兼程赶来前线，指挥四团打码头。歼码头日伪，又攻郯城，守敌惧歼，弃城逃向新安镇，王海子敌也弃圩南逃。我当时奉鲁南三军分区之命，组织火线转运站，转送伤员、掩埋烈士。因此对战斗前后情况非常清楚。后来罗华生的回忆录没写清楚。郯城党史、文史写成四团首先爆破成功，一举攻克王海子。我和参战健在人员看到这样文章，都很不是味。”

再如，《苍山文史资料刊》用我写的《六九突围》文章。我笔误把横沟崖还乡团分子孙成杰写为村干，我马上给苍山政协文史委去信，让他们更正。后来国务委员张劲夫写回忆录，引用该文，也把孙成杰写为村干，影响就更大了。还有，我写《农抗团始末》，文中把伍云甫（伍绍祖之父）误写成吴芝圃。我发现后也马上去信请其纠正。后来在《苍山文史精粹》中仍印成“吴芝圃”。足见写史料马虎不得，以免以讹传讹。

以上所举文章，不知是否收入了《沂蒙大观》，所举其中错误是否已经纠正。如尚未改，请认真更正，以便去伪存真。正如本文开头所举的石邦杰问题，你们更正后，既不影响方兰亭的红嫂形象，也不影响洋洋《大观》一书的功绩，而且避免了文中所涉人物的后人据此要求甄别的麻烦。因此，我认为史料的作者们看到本文可能不会不高兴的。

**注：**本文写于2009年。作者为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离休前为苍山县党史资料办公室主任，著有《鲁南革命史》等多部党史著作及论述。

# 琅琊诸葛氏由来及谱系概说 (下)

葛成民 葛厚竹

## 《全裔堂》《大公堂》为宗支谱

浙江省兰溪诸葛村有《大公堂》诸葛氏谱，以诸葛珪为始祖，诸葛亮为二世祖。十四世诸葛仲方，袭父《诸葛爽》为河南节度使，生二子曰洌、曰深，为十五世。诸葛洌在五代时期自成都来浙宦游，卒于官任，葬于昌锡山。十六世诸葛青有六子，故十七世称“六大支”系，形成浙江以诸葛洌为始祖的诸葛亮后裔。诸葛洌有弟诸葛深，十九世后裔迁居福建晋江，到二十九世于诸葛琦止已无考。诸葛洌是长子，故谱称《大公堂》，故视为《大公堂》宗支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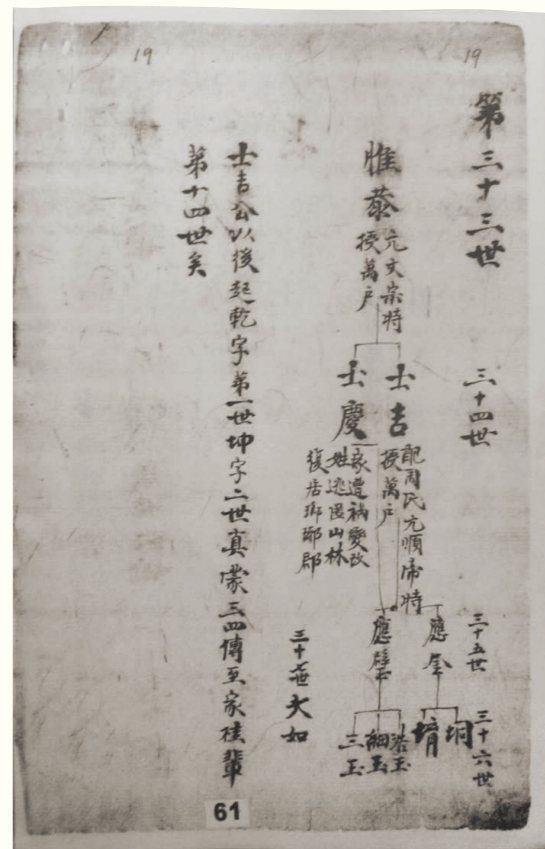
浙江建德寿昌镇里诸村发现标明“南阳”诸葛氏宗谱，尚不知初修谱年代。又称诸葛亮后裔在浙江“七大支”中“里诸派”。开篇为“传家至宝”，记述历代修谱经过、序言、家训、迁徙演变等。谱系两卷，例传分章，回目清晰，这里称“七大支”而《大公堂》称“六大支”此是异处，必有其由，也许有总谱与分支谱相关，这要从谱中分析，方可知晓。

笔者以为《全裔堂》《大公堂》《里诸南阳》谱，如能汇聚一起，用世系宗派分析，或许能解开历史疑点，或许相互印证，使诸葛后裔的谱系更详尽，展现诸葛氏家族在历史过程中的文化脉络。

琅琊是诸葛氏祖居地，也是其发祥地。诸城、阳都，中丘、南阳，成都、江东，浙江兰溪，江南海东。自汉晋五代，宋元明清历代数朝，诸葛氏后裔漂泊四乡。其宗而谱多因兵燹战乱、地震灾难，人为不善而毁失。故各地支谱有一共同特点，修谱时代较近，且本居地始祖以下，支脉清晰，迁出记载详明。而始祖以前多简略，单传或互有舛别。

如《全裔堂》1962年续修，《大公堂》1948年修，《里诸南阳》谱止于1928年。《大公堂》谱始祖六世之间不细有遗处。六世除诸葛铨有记外，诸葛玟及诸葛冲之女（婉）均无载。而《莒州志》却记有婉。即是《全裔堂》与《大公堂》无载。

《全裔堂》自三世京至三十六代大如，近三十代单传，似不合常理。《大公堂》自五世冲至十四世诸葛仲方，也是十代单传、似也不太合常理。这又是疑处。《大公堂》自十五世洌后为支谱，十五世前是沿直系单录至冲



公，余无记。故说《全裔堂》今谱自大如支谱；《大公堂》仅包括诸葛氏在浙“六大支”。其中间谱系也许是宋版《全裔堂》的一部分，均为支谱。

就此似乎是人们续修支谱的一种传统做法和体例。是嫡传之思维，不指“生子”，当是录其家系一脉。诸葛氏族谱中，诸葛亮到诸葛京一脉相承，与史志基本一致。从诸葛京携眷回归琅琊后，其记文有异处。铨是冲子在《大公堂》谱系明确。

一族一姓迁出一地立门户，繁衍生息，开宗立脉者为一世，立谱述由来，则注始祖嫡传一脉而下，余分支不赘及，似乃支谱之惯例。

## 阳都人与阳都故城的关联

琅琊，作为郡名，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设三十六郡，琅琊为其一郡，郡治所琅琊县。至西汉郡治东武（今诸城），作为国名是汉武帝改郡为国，刘秀封爱子刘京为琅琊王，都于莒（今莒县城阳莒国故都）；建安五年迁开阳（今临沂城），成为琅琊王国都。后又改琅琊郡。琅琊自此成为临沂专称，而临沂县治中丘城（今诸葛城）。

《三国志·诸葛亮传》开篇首句“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这阳都古地名，早为历史所淹千余年，阳都故城已无存迹，亦难考证。后虽有其故城遗址发掘，作为史学研究，无法证明诸葛亮是阳都“故城人”。阳都是一古代区域，非一处故城遗址，只说“诸葛亮，阳都人也”，非是阳都故城人。乃史家记人物籍贯的常用语，这样表述似模糊而实为准确。故“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非阳都故城（遗址）人也。

《重修莒志》对此有如是描述“古昔名贤，每欲藉增光宠，如诸葛武侯，兰山

沂水诸城皆以入志，旧志亦载之，按武侯本传，为琅琊阳都人，今阳都不能确指何地，考古谓当近葛沟，是则或在州境，亦未可定。”

阳都因“世迹远灭”史籍记载较少，清道光七年《沂水县志》载“文帝元年，置城阳国。城阳统县四：曰莒、曰东安、曰阳都、曰虑。”故而《续修莒志》有诸葛氏记载。“阳都城在沂水南境十里，南即兰山境，兰山临沂故城北有槎枒山（今茶芽山），山后诸村落皆阳都县地。”就是今兰山区李官镇与白沙埠镇交界处茶芽山。此山东麓有“诸葛武侯先茔”墓。此地距“诸葛城”相邻，古为临沂县治中丘城。

《水经注·序》载“郡县并省以后，阳都一县，兰山、沂水互有之，武侯故里，二县《古迹志》并书，《人物志》亦当并载，不得执一而废也。”

对于“诸葛亮，琅琊阳都人”的定论无疑，如说是“沂南县砖埠乡孙家黄疃人。”则不恰当。与史记记载不相符。沂南砖埠虽然有所谓阳都故城遗址在孙家黄疃处云云，但未有诸葛亮在此出生或生活过的任何古迹或文物证据。倒是中丘城（诸葛城）槎枒山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古迹，如武侯先茔墓，诸葛书院等历史遗迹。故讲诸葛亮琅琊人，或琅琊阳都人是准确的。他说皆非史家之笔。

### 中丘城与“诸葛武侯先茔”墓

前已知现诸葛城，即是原临沂县治中丘城，因诸葛亮居于中丘，故后改为诸葛城，古有人称“卧龙城”。城东临沂河，岸有洪福寺。乃城内旧有“武侯祠”“诸葛书院”“诸葛氏古墓群”。清道光年间《沂水县志·古迹考》》载：“阳都城南五十里有临沂故城。”“诸书讹为中丘城。城亦在沂河西岸，为兰山县（今临沂兰山区）东北境。土人呼曰诸葛城，一曰卧龙城。相传诸葛氏移居于此”。槎枒山一界两地，居中丘无疑。

清康熙十三年《沂州志》载：“诸葛城，州北三十里，隐公七年夏，城中丘。注云，中丘古城，琅琊临沂县即此城也。后诸葛亮来居于此，故名。”诸葛亮移居诸葛城（原中丘），互见志载，这就印证了诸葛亮不是在阳都故城的说法，故《水经注》曰“不得执一而废也”。

诸葛亮之先祖诸葛丰被罢官成庶民，已无食邑，故举家自诸县西迁至阳都与临沂交界的槎枒山北村落，终老葬于槎枒山之东麓，即“诸葛武侯先茔墓”。山前即中丘城，山后即阳都。槎枒山一山两界，祖茔依山傍沂，枕阳都而面中丘。“二县《古迹志》並书《人物志》，亦当並载，不得执一而废也”。诸葛瑾“弃坟墓，携老幼，披草莱，归圣化，避乱江东。”之说“弃坟墓”，亦当是以此墓为祖墓的诸葛家族墓群。

东晋元帝建武时（317—322年），诸葛族人诸葛恢“为即丘长转临沂县令，政尚和平，名亚王导、庾亮，谓曰明府当作黑头三公。”这是明万历《沂州志》所载。清嘉庆《莒州志》载：“诸葛恢……试守即丘长转临沂令。”这期间诸葛亮第三代孙诸葛京携眷归琅琊故里，居中丘，这也是中丘城有诸葛氏而成为诸葛城的原因。这归故里，守祖墓，耕读琅琊。后世才有了银杏树、武侯祠、洪福寺、诸葛书院等历史遗迹。就有了诸葛亮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祭祀祖先，守故土的经历，皆为确凿的历史史实。

《重修莒志》：“见于传者，应尚有之，今时代之遥，名称亦改或属隶境类，难确指第，山水之秀，千古不易，以山川定疆。”莒州府志载有槎枒山，沂州府志载也有槎枒山。诸葛城北槎枒山（茶山、茶芽山），曾被谓“临沂镇山”。山阳即

临沂故城（中丘）。有“桃花岭”，也是古人传下来的地名，王祥“卧冰求鲤”之孝河源于此。茶芽山阳依石壁悬岩下，后建有白云寺，山巅有文昌阁（已毁坏），今重建文昌塔。山之东麓白石一片，西有青石一片，再向西为一条白石岗（高岭土矿），过去人们称卧龙岗，该山是泰山余脉，逶迤东南，连绵数百里结聚为槎枒山（古写嵯岬山），山石如牙交错竖立，至沂河而止。山上有名胜遗迹如澄金涌、神仙洞、皇母泉（黄土泉）、双石门、八间屋、王敖洞等。

茶芽山东麓有古墓为“诸葛武侯先茔”墓，以碎石铁汁封土。《临沂县志》有载，《续修临沂县志》附有照片，碑书“诸葛武侯先茔”，落款为大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清明节合族立石”。居住在临沂范围诸葛氏家族，一直代代相传是他们的家族先茔，每逢清明都有人前来祭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该墓进行过调查，当时此墓保护完好。“文革”期间，该墓地上封土，据墓式及文物，初步认为是西汉墓，墓主人应是身份较高级别人物，或是诸葛丰，但缺乏直接证据，却也无证据排除此不是。但“诸葛武侯先茔”墓在此，这是毫无疑问的。故家族属地应离此较近。

参以民国五年《临沂县志·诸葛亮》篇记载“诸葛氏阳都人，而城、墓在县境，盖县有阳都地也。”明确证明诸葛祖茔墓地是在临沂县境。《沂水县志》“阳都城在沂水南境十里，南即兰山境。兰山临沂故城（诸葛城）北有槎枒山，山后诸村落皆阳都县地。”又《沂水县志·古迹考》“诸葛城……相传诸葛氏移居于此。”又《沂州志》“诸葛城……为诸葛亮来居于此。”墓地与志载两相参照，恰证诸葛一族生活栖息之地应是以槎枒山为界的阳都、临沂两地，且后期应在山南麓的诸葛城为确说。

### 诸葛宗亲文化研究及探讨

诸葛氏的由来、始祖及后裔迁栖情况，以及对诸葛亮的研究学术界成果不计其数。但就诸葛氏宗亲以谱系方式来研究的较少，或不深入。作为诸葛氏族人直接组织宗亲文化研究的也所知不多，作为琅琊望族诸葛氏后人正在开始。今应“琅琊望族文化研究会”所邀，写出本篇文章，深感力不从心，责任难承。就此提出今后研究趋向与课题，以便有目的进行研究探讨。

下一步将收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并实地考察，去做大量基础性工作，以便使“诸葛氏宗亲文化研究”更深入，以此来弘扬其传统与精神。

- 一、诸葛氏谱的收集、整理、分析及续修。
- 二、诸葛氏族祖茔、祠堂、碑文、家族史研究。
- 三、诸葛氏族祖居及后人迁栖路线及住处。
- 四、诸葛氏族历史文化遗存、史料、典籍的收集归档。
- 五、诸葛氏族人的习俗及祭祀文化传承。
- 六、诸葛氏与其他望族、氏族交往、亲缘关系。
- 七、有关诸葛氏古今实物、书籍、刊物、照片收集记录。
- 八、有关诸葛氏族人的故事、传说整理汇编。
- 九、历代咏诸葛武侯的诗词、歌赋收集整理。
- 十、诸葛家族的著述家训、家教、家族精神的挖掘和发扬。

# 邱峰：从“师傅”到“师父”

叶婧



一身工作服，一双劳保鞋，说话时常会紧张得搓手，谈起专业话题时又滔滔不绝……在全国劳模、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邱峰看来，自己和一般的电工没什么两样。

从高中学历的“电工师傅”，成长为能给电路板“做手术”、带动3万余条技术革新的“专家师父”，邱峰凭借着自主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功完成了身份转换。

## “无人车”点燃“创新火”

走进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承载着自身重量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零部件、在厂区路边“唱着歌”穿行的“小黄车”。“这就是邱峰自主研发的、利用磁导航实现自动导引的AGV（无人搬运车）。”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兴庆说。

在传统的工程机械生产中，笨重的机械零部件需借助燃油叉车实现从运输车辆到生产工位的配送。为了代替成本高、效率低的燃油叉车，临工集团曾在2013年花费20多万元购买了一台AGV，此事点燃了邱峰自主创新的“星星之火”。

“买回来的车不仅价格贵、老出故障，核心技术还保密，想要维修还得厂商派人来，特别麻烦。我当时可能也是有点赌气吧，就自己研究怎么设计、怎么制作了。”邱峰说。

经过无数次失败与调整，由邱峰团队自主设计的“小黄车”如今已升级到第四代，扩展到4个系列、20多种车型，不仅能完全替代燃油叉车，还解决了复杂路况下重型物料的跨车间转运问题。目前，仅临工集团就已推广使用各类“小黄车”52台，国内多家知名制造企业也慕名而来并达成合作。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部长吴安德说，通过“小黄车”调度系统与物料自动装卸机构的同步设计优化，临工集团每年节约成本近千万元，生产线边物料同步减少50%。

“小黄车”只是邱峰近40年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作品”，类似的项目还有行车无线智能控制系统的实践运用、加工中心安装监控系统和对刀自检系统的实践运用、三维测量划线机智能化改制改进、装配线加油机触屏式一键操作自主工艺控制、“电、气、液”远程实时监控系统的研发等。

凭借着“累累战功”，邱峰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山东省首席技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2017年，邱峰的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 求知若渴追求完美

邱峰的工作室内，各类计算机、电子电路维修检测仪、示波器、工控产品等实验器材及仪器一应俱全。工作台的墙上也挂满了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扳手、螺丝刀等工具，书架上还摆着自动化控制机床等工作相关的理论书籍。其中，几本英语、德语技术词典格外显眼。“这是当年邱师傅为了学习进口设备修理，专门买的。”团队成员秦立山说。

当时，对仅有高中学历的邱峰来说，别说是修理，想要看懂只有英文、德文的说明书，都不容易。他却憋着一股劲，不断扩大研究范围，一有空就查资料，翻阅各种技术词典，拿设备反复拆解，从零部件到设备结构，里里外外研究了个遍。如今，邱峰能独自修理临工集团的许多进口设备。

“我们团队16个人，我学历最低、年龄最大。现在高新技术发展迅速，不时时学习、及时实践的话，就要被年轻人抛在后头啦！”邱峰说。

邱峰给《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第一台“小黄车”：“有点简陋，里面布线有点乱。现在的‘小黄车’内部走线都经过了专人设计，操作合理、美观整齐，和第一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咸龙滨是团队里的“新兵”，他说，邱峰眼中的“天壤之别”，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小节”。“刚到团队时，我就常常因为走线不够美观，被邱师傅要求重新做。”

从最初的维修普通设备，到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安装调试和维修；从简单的更换零部件，到为高精尖设备的“大脑”——电路板做“手术”……邱峰的技术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 不能满足于当装配线上的“螺丝钉”

2012年，依托临工集团，“邱峰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了，“邱峰师傅”变成



了“师父邱峰”。

秦立山就是邱峰的徒弟之一。如今，38岁的秦立山已成为山东省机械行业首席技师，被评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技师、山东省国防机械电子系统技术创新能手、临沂市首席技师、临沂市优秀电工，创新成果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

自成立以来，“邱峰劳模创新工作室”及其下设车工站、铣工站、焊工站、维修工站组等22个专业技术师工作站，已累计带徒127名，开展培训达5300人次，累计完成自主攻关课题300项。

其中，“邱峰劳模创新工作室”重点培养了20余名具有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专才的年轻技师和高级技师，40余名学员成长为班组长和一线生产骨干，多人荣获“全国技术能手”“机械工业有突出贡献技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技师”等荣誉称号。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崔元乐说，在临工集团，已经形成“邱峰效应”。几年来，每年由一线员工实施的技术革新多达3万余条，创新项目达5000个以上。大量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使临工集团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达到260万元的高水平，大大领先于同行业，使企业获得了创新驱动的新动能。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劳动者在制造业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变。”邱峰说，“在新时代，我们既需要把扎根岗位、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等劳动者的优秀品质持续发扬，更需要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不满足于当装配线上的‘螺丝钉’，要用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来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贡献力量。”

## 当今之“送子观音”

——记张凌翔

刘凤才



《黄帝内经》载：“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代代繁衍方生生不息；当孕不孕，应育不育，小至家庭，大到民族，及至人类，都是不堪悲剧。我们充满智慧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对人类的繁殖生育就有了科学明确的认识，对不孕不育也有过许多探究与方略。由于解此困惑太过困难，于是，人们又寄期望于凡界之上，以为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送子观音”能助人生育。神话中的“送子观音”，谁也没见过其“庐山真面目”。时至当今，却有一位凡人承担起了人们对送子观音的寄托——临沂市中医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凌翔。

### 高考志愿——填报的全是医科

张凌翔是临沂市河东区相公镇人，1969年出生。父亲是农行的职员，母亲是农村妇女，姊妹5人，她行四。尽管父亲有一些微薄的工资收入，但在人民

公社年代，主要还是靠挣“工分”分配口粮。父亲自然不可能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母亲顾里顾不得外，加之从年轻时就体弱多病，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只好靠在家养猪攒粪换“工分”。一对夫妇拉着5个孩子也实属不易，家境仍然十分困难。张凌翔听母亲说，出生时，由于营养不良，先天不足，活像一只又瘦又弱的小猫，哭起来都少气无力，让父母既心疼又心酸。直到上学，她的体格也没能像一家人期待的那样“茁壮成长”起来，依然是孱弱单薄。由于体力过于不足，小学时期，她有时只能坚持上半年课，所有孩子们热衷的玩耍游戏、跑跑跳跳的活动，她都少有参加，只能眼巴巴当旁观者。

体格不足不等于天赋不灵，身体无力不等于心无毅力。相反，张凌翔从小倒有很强的个性，身上有股不服弱的心气。不能玩耍游戏，正好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她刻苦努力，十分用功，成绩一直很好。有一天晚上，直到10点了，其他人家的孩子早已进入梦乡，她还在家灯下学习。一位亲戚有事来到他家，既关心又惊讶地问：“这么晚了还在学习，你们的作业到底还有完没完？”张凌翔也十分惊讶不解地反问：“学习怎么还能有完的时候？”后来，亲戚把她的这句话传给了四邻八舍，最后传到了学校老师的耳朵中。老师对她小小年纪、便有这种学无止境的态度与精神大加赞赏，要同学们好好向她学习，这反而让她有点不好意思，学习更加自觉努力了。

父母对子女们尤其是张凌翔这个弱小的丫头疼爱有加。父亲在临沂城工作，本来那时交通就十分不便，他又舍不得花钱坐车，常常步行数十里去上班，孩子们多少天也难得见到父亲一面。张凌翔只记得父亲有一次亲手给孩子们做过一次馄饨，他全给孩子们盛到碗里，自己连口汤都舍不得喝，在一旁啃干煎饼。后来父亲不幸早逝，数十年过去，对那碗充满了浓浓父爱的馄饨的滋味，她至今难以忘怀。

对母亲，张凌翔更是既爱又敬。母亲善良慈祥，最善持家，尽管入不敷出，但是她从来不会让家里的粮缸罄空，不会让孩子们断顿。她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是却通情达理，心胸豁达，眼光很远。她常常对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个有出息的人。”为了供应几个孩子上学，母亲想尽了千方百计，付出了所有的心血。

小时候，张凌翔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儿时的心灵最可塑，她被主人翁那种魅力所深深吸引，暗想自己将来一定要当一名好老师。但是，每当望到母亲拖着病体、不辞辛劳、疲惫不堪地劳作的身影，又想到自己从小因体格羸弱带来的种种窘迫，她又改变了念头：为了母亲，还是学医，当一名医生，至少能保证自己的健康，将来好孝敬伺候母亲。

她最终坚定了当医生的志向，还受外祖父的重要影响。外祖父叫刘登迎，家里是几代世医。外祖父从十几岁起，就跟着曾外公学医，天天手不释卷，日日随父出诊，解放前就是河东一带四邻八乡有名的医生，尤其擅长诊治儿科、妇科等病患。他敦厚实在，心怀仁爱，医德高尚，有口皆碑。旧时代上流传着一句话：“家开药铺，胜过劫路。”他却经常说：“当医生饿不死，但是绝不能指望这行发财。”他对穷苦人家的病人充满了同情，常常分文不取，说就应当“富人拿钱，穷人看病。”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八湖乡医院的骨干，救治了无数病人。退休后，仍然为百姓看病。由于名声在外，加上他看病不要诊费，来找外祖父看病的络绎不绝，你来我往，不分昼夜，家里总是门庭若市。有人问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费力劳神，为什么不收一点诊费？老人回答：“公家给我发着退休金，就是让我给百姓看病的，我怎么能再多收一份？”

小时候，张凌翔见外祖父常常只用几棵花花草草、树根树叶放在一起熬成汤，就能把愁眉苦脸的病人治好，甚至转眼间就能让她们破涕为笑，对外祖父都是满脸真诚的感激，她对那些小草小针小药丸充满了无比好奇，对外祖父充满了无比的崇敬。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像外祖父这样的好医生的念头，也像一颗倔强的种子，在她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初中毕业后，为了尽量早一点减轻母亲的负担，张凌翔决定报考中专、早一点参加工作。那时，每个学校被录取的学生还实行名额分配，学校实行预选制。她虽然成绩不错，但却因不明原因没拿到中专考试资格。想想再上3年高中，对穷困的家会是怎样一件沉重的负担！她对是否继续上学产生了很大犹豫。胸怀大度的母亲却在这时坚定地站到她面前：“妮儿，这个学咱还得接着上，正好，咱还不考中专了，以后直接考大学！我就是出去要饭，也

要供闺女上大学！”一番话，说得张凌翔热泪盈眶。

张凌翔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1988年，她顺利通过高考。在这以前，全村还没有一个女孩子考上过大学本科。全家人甚至全村人都为之振奋与自豪。而在填报志愿时，她心无旁骛，填报的全是医学院，后被山东中医学院录取，攻读中医系。

莘莘学子苦，漫漫学涯路。大学期间，她心中时常浮现出母亲辛劳的身影，眼前不断闪现着外祖父期望的目光，成为她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重要动力。她极为珍视点滴时间，上课自不待言，也从不放过任何一节自习课。每天晚上，经常是最后一个从教室里走出，最后一个回到宿舍。女生宿舍与教学楼中间有一道隔墙，院门晚10点准关。晚自习归来，她经常要吃力地翻越过一人多高的围墙，一不留意一脚踩空，就得挨摔，她满不在乎，脑子里还在想着课本的内容。对所学过的知识，她都能牢记在心，有些甚至可以默背到在课本的第几页第几行。她潜心读书，但是从不读死书、死读书，而是总喜欢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她一定要打破沙锅问（鏊）到底；有时对老师照本宣科传授的理论与观点，如果不理解，她会坚持“与自己过不去”，开动脑筋、举一反三，直到找出圆满的答案……

1993年，张凌翔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临沂市中医医院妇产科，自此正式走上了从医之路。

## 学无止境——一身学成“三师”

张凌翔在市中医院妇产科一干就是10年多。她中医基本功底扎实，又面临着众多临床机会，理论联系实际，使她不断积累着医疗经验，业务水平不断提升。然而，越是接触实际，她又越是觉得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能适应为患者服务的需要。因此，她成长的过程，又成了一个孜孜以求、持之以恒的学习过程。

妇产科作为医疗领域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专业，对医生的能力与水平有着特殊的要求。在治疗妇科病患上，针对不同的情况如治标与治本、救急与治缓等等，中、西医又各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在治疗妇科病患上更有着重要作用。为了加深自己在西医妇科基本理论与实践上的修养，2003年7月，她抛下只有3岁的孩子，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进修班学习西医妇科。整整一年时间，她除了上课与实习，就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里，她深深地被那片浓厚的学习研究、不断上进的学术氛围所感染，不用说年轻人，就是许多造诣很深、满头华发的老专家学者，也都依然默默地勤奋地秉书苦读，使她深受教益与鞭策。她以自己强烈进取、谦虚勤勉、吃苦耐劳的精神与行动，博得了中国西医领域最高权威机构专家学者的青睐和喜欢。北京是名人荟萃之地，有一次，一位很有社会知名度的女士因病住进了医院。院领导和专家们很看重医院口碑，对由谁来担任这位女士的管床医生也颇为重视。比来选去，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进修生张凌翔。她当然欣然接受，但是也没觉得名人在治病上有什么特别。她只是一如既往、像对待所有病人一样，落落大度，满腔热情，尽心竭力，无微不至，结果这位女士病愈出院时，对张凌翔却相当满意，赞许有加，还特意向她赠送了数张自己的写真照以作纪念。院领导和专家们说：“沂蒙老区来的进修生，就是棒！”

在工作中，细心敏感的张凌翔发现，前来就诊的妇女除了在身体与生理上有着疾病外，大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与精神抑郁的表现，比如过于敏感多虑、紧张胆怯、爱“钻牛角尖”等。这些心理与精神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又与生理疾病和身体健康形成一种相互不利的影响，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不能洞察她们的内心之事，不帮助她们打开各种心结，将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如果让病人去进行专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很多病人又不能接受。西方一位医哲曾经说过：医疗的本质是“很少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心理疏导恰恰是最重要的“安慰剂”。受此启发，她决定干脆由自己对她们进行身、心同治。于是，她从2005年起，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涉足心理专业知识，自费参加学习，并于2009年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她并不是想做一名专职心理咨询师，而是借鉴教育界提倡的“无痕教

育法”，对病人进行“无痕心理疏导”，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有一次，张凌翔为一位患者做了卵巢黄体破裂手术，手术顺利，质量很高，只在其腹部做了一个不足5厘米长的横切口，而且愈合良好。但是，术后4天，患者却叫嚷依然腹部疼痛，而且愈演愈烈，甚至一直疼到了整个腿部，问题似乎很严重。张凌翔心中有数：手术与护理毫无差池，只是病人过于胆小敏感，对于伤口感觉高度关注与在意，实际上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对确有问题的患者，必须仔细反复地检查；而对这种患者，医生越当回事、她越是紧张，医生越是觉得有问题、她越是觉得问题很严重。于是，张凌翔又简单诊视了一下患者的刀口与腿部，很坚定、很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对患者说：“没问题，啥事也没有，尽管放心，该干嘛干嘛！”患者吃了“定心丸”，肚疼腿痛立消，第二天就忙活着考驾驶执照去了。还有不少病人，在做治疗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情绪，心跳加快手心出汗。每当此时，张凌翔就幽默地对她们说：“我都这么慈祥了，你怎么还紧张呀？你这一弄，我反而也紧张！”病人听到此话，崩紧的神经立即放松下来，紧张情绪烟消云散。许多患者也亲切而尊敬地对她说：“张医生，只要一看见你，俺的病就好了一半！”也有的说：“只要你坐在这里，俺心里就觉得踏实！”

多年来，张凌翔在用中医治疗痛经、月经不调、“月子病”、更年期综合症以及女性心理疏导、亚健康状态的调理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医术上日臻完善，加上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她深得领导、同事和广大患者的认可与信赖，她一步一个台阶，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市中医医院的妇科中坚力量之一。

2011年，张凌翔担任了妇二科的主任，挑起了更重的担子，业余时间越来越少，但她仍然没停止学习的步伐。她看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富贵病也随之而生，许多妇女也在所难免。中医特别强调“上工治未病”，因此，在妇科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中，健康管理也相当重要。于是，她于2015年又开始学习健康管理专业，并考取了国家三级健康管理师资格证。

## 面对难题——勇作当今“送子观音”

妇产科经常面临的病患，就是不孕不育。每当面对那些不孕不育者望眼欲穿、企求渴盼的目光和蹙眉愁容，张凌翔心中既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又深感作为一个妇科医生的责任与压力。因此，多少年来，她一直把治疗和攻克女性不孕不育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课题。她想，既然人们渴求于想象中的“送子观音”，自己何不做一个现实中的“送子观音”，为她们排忧解难？

恰巧，本院当时的妇科主任袁悦明——张凌翔的同校学姐，正是全市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先驱者和德高望重的专家，袁主任也十分欣赏与看好张凌翔这个有志有心的小师妹。“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凌翔便主动地拜袁主任为治疗不孕不育的启蒙老师，一学就是若干年，深得袁老师真传，逐渐深入研究分析出导致不孕不育的各种原因，探索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综合治疗不孕不育症的路子与方法。

张凌翔根据传统中医理论结合现代中医观点认为：女性生殖与肝肾功能最为密切，引起不孕最重要的问题是卵泡发育不良与排卵障碍，导致这两个问题的重要病机本质，是肾虚血瘀和肝郁气滞。而不孕症一般又病程较长，常以年计，久之则涉及多个脏腑气血阴阳失调，表现出兼夹发病。然而其最根本的病机，仍在肾肝。因此，本着辨证论治、标本兼治的原则，她总结出了排卵障碍性不孕症的治疗大法为：“补肾活血，疏肝理气”，坚持“以法统方”，对症下药，并辅以疗效确切、安全可靠、适量适度的西药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临床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她主持的科研课题《补肾活血疏肝理气法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的临床研究》，在业内大受重视与欢迎，并获得临沂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时至2014年，慕名前来中医医院治疗不孕不育症的患者日益增多，张凌翔见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为了有一处集中研究、专门治疗此症的平台，张凌翔主动找到院领导，建议医院成立生殖医学科，并主动提出放弃妇二科主任的职务，到生殖医学科负责。院领导不解：张

凌翔在妇产科干得举重若轻，轻车熟路，而要新成立生殖医学科，就要重新开创局面，更何况治疗不孕症毕竟是一种保险系数较低、风险系数较高的专业，这个张凌翔究竟图什么？张凌翔的回答很简单：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适应患者需要，为了医院今后的发展！医院领导被她的执着所感动，经过研究，同意了她的建议，成立了中医医院生殖医学科。

更有利的是，医院又专门返聘回了临沂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先驱袁悦明到生殖医学科工作。张凌翔与自己崇敬的师姐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开始把中医医院的生殖医学专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实践证明了她们的实力与能力。2015年，张凌翔接诊了一位不孕患者，已经43岁，且患有糖尿病。患者年轻时曾经生育过一个孩子，后来因病不幸夭折。此后，她再也没有怀孕。她四处诊治，还领养了一个孩子作“压子”，希望能给自己再带出一个亲生子，但都没有结果。她是听到中医院有了专治不孕症的生殖医学科后特意来看病的。张凌翔见患者生育间隔时间已久，生育功能已开始退化，身体总体健康状况又十分不佳，能否再孕再育确实没有把握，又不想让患者绝望，便实事求是地告之：需要首先帮助她调养整个身体，此后如能怀孕生育不必过喜，达不到目的也请不要埋怨。病人欣然接受。于是，张凌翔遂以“补肾活血疏肝理气法”为其治疗。两个月后，病人不但身体状况大为改善，更可喜的是如愿怀上了身孕。张凌翔仍不放心，又以保胎法为之巩固。后来，患者如愿生下一个健康的胖小子，全家大喜过望，对张凌翔及同事们感激不尽，并随即介绍本村另一位不孕患者前来诊疗，结果这位患者也再传喜讯。“张凌翔大夫——当今‘送子观音’”的美名不胫而走。

生殖医学科，不仅是治疗不孕不育，更大量的任务是推动促进优生优育，这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的幸福，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未来。正所谓天下大事，“政随时出”，随着二胎新政的出炉，社会上一片强烈反响，却又不乏“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些年过40、只有一子的“不惑”女性，却反而使她们心生困惑，纠结不已：不生吧，心中不甘；生吧，年龄已大，实在不易，能否保证母子健康，是她们最为关心的事情。这不是杞人忧天。中医认为：女子“五七而肾气渐虚”，现代医学则把35岁以上怀孕的妇女称为“高龄孕妇”，二者正相吻合。针对这一情况，张凌翔及生殖医学科又把如何为大龄备孕和产后母亲服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与任务，而且把向众多大龄备孕和产后妇女进行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作为首要环节。张凌翔不但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而且语言表达能力强。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专业表述言简意赅，她就用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作宣传。她把大龄妇女如何备孕概括为三个“起来”，可谓独具匠心：

一是要想有个健康新宝，母亲的体质首先要“壮起来”。父母的健康是新生儿健康的保证。大龄备孕妇女在多年的辛勤劳作、艰苦工作后，体力精力多有所下降，身体多患有那样那样的疾病，中医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肾气衰退，而肾又主生殖。因此，欲求优生，必须补肾，调养身体，使肾精冲盛。正所谓“沃土良种才能出好苗长好苗”。

二是要想有个健康新宝，母亲的情绪必须“好起来”。很多大龄备孕妇女，身体尤其是精神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多有精力不足、焦虑忧郁、易惹易激、失眠烦恼等症状，中医多将其归于肝郁气滞，血脉不畅。血淤气滞，就如同你在银行里虽然有很多的存款但被冻结了，又如水库中虽然有很多的水，渠道河流却堵塞了，怎么能保证未来宝宝“消费”与“灌溉”的需要？再者，母亲是胎儿的整个“宇宙”，如果你整天情绪不佳，动辄“地震海啸”，这个可怜的胎儿能得到安宁吗？好心情才能好孕。

三是要想有个健康新宝，母亲的身体还要“暖起来”。人体有寒有热、有淤有湿，多数大龄备孕妇女都有宫寒体湿，正如把一颗种子撒在冰天雪地里其根本不能生长一样，对备孕妇女必须先温补肾阳、化淤去湿，才能给未来宝宝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让大龄备孕妇女体质壮起来、精神好起来、身体暖起来，相对于其他医疗保健措施，中医药更有着独到的特色与优势，张凌翔她们更有着成功的实践与丰富的经验。她们取得的成效让广大大龄备孕妇女心悦诚服，让她们对自己即将的优生优育充满了期待与信心。

由于职业女性是这次备孕二宝大龄母亲的“主力军”，多处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不能撻，时间受限制，在张凌翔带动下，本科的同事们都主动放弃了个人休息时间，即



使周末与节假日，也多坚守在门诊，随时为求助者服务，受到大龄备孕者的热烈欢迎。她们都盼望着张凌翔这些当今的“送子观音”给她们带来新的福音。

现在，张凌翔担任着临沂市生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医妇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和山东中医药学会生殖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生殖专业委员会委员。除获奖生殖医学专著外，还在省级医学刊物发表论文4篇，为促进生殖医学的发展不断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实践经验。

### 恪守医德——从骨子里深深地喜欢着从医

热衷事业、矢志不移，关爱生命、诚心尽力，是一名医生具有良好医德的根本表现。

张凌翔认为，医德的立德之本与基本要求，是医生首先要真正热爱这个职业，真正抱“悬壶济世”之心，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就如同她崇敬的外祖父当年所言：不能指望当医生发财。而为了病人，又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这不是她空喊的“豪言壮语”，而是切实的行动。“当患者最需要的时候，你会随时出现在她的面前”，是她的行动写照。她是一个严守国法的优秀公民，但是对执行落实国家关于“劳动者要休息”的法律，却是一个“严重违法者”。对工薪一层，“8小时外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她在工作日上从来没有“8小时”法定概念。行内说：“累死累活妇产科”。一个产妇从进产房到孩子降生、孩子降生后保证母子平安，这个过程怎么着也得两三天时间，她很多时候都是工作三四十小时才能回家休息。由于现在的不孕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些城市白领、工薪一族，加上不孕不育症不像其他急性病，非得争分夺秒地诊治，所以这些人在工作日很少能专门请假来看病，而是多半利用周末或者节假日。为了让这些患者能得到医治，张凌翔的脑子中也极少有“周末”的概念，除了预约的病人，她基本上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而个个周末，她比平时工作时更紧张繁忙更劳累。国家每年法定的数个节假日，对她来讲更是毫无“法律约束力”。不要说元旦、“三八”、清明、端午、中秋、国庆等，就是连春节这样对国人最重要的大长假，在其他合家团聚、尽享欢乐的时候，张凌翔基本上从大年初一到初七，都坚守在门诊或者病房中，她把热情、亲情、快乐、幸福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患者。每年她只过一个节日——“五一”劳动节，当然不是休息，而是仍然在劳动中度过。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为此而失落而遗憾，反而觉得人生更加充实丰富更有价值，她甚至为此很有点儿自豪与骄傲。

张凌翔认为，对一位医生来讲，最为宝贵也是最难得到的，是患者对自己的信赖，这是对医生最大的肯定与最高的褒奖，也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保证和有利于治疗的前提。而做到这一点，医生对工作只有热情、对患者只有爱心，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诊疗上精益求

精，并把热情与关爱具体体现在对工作、对患者细心、耐心、贴心、尽心上；细心才能抓住症结，贴心才能与患者沟通交流，耐心才能看到希望走向圆满，尽心才能最终赢得患者的理解与信任。比如从一个中医诊断病情角度看，“切诊”把脉固然重要，但是绝不能忽略了“望、闻、问”其他三法。细心负责与经验丰富、医道成熟的中医，应当从患者一进门，你一打眼，就能对这位患者身体与精神状态有个大致了解与掌握。有一次，有一位陌生妇女患者三脚两步刚跨进门诊室，朝张凌翔面前一站，没等来者张口，张凌翔就从她的步态、表情上看出了端倪，随即微笑着问：“这位姊妹，你脾气与个性咋样？是不是性子有点急，脾气有点燥呀？”患者先是一愣，随即信服地回答：“张大夫，您真是火眼金睛呀，怎么一眼把俺的毛病就看得这么准？神医呀！”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自此这位患者对张凌翔建立了高度依赖，言听计从，积极配合治疗，不久便得以痊愈。

还曾经有一位宫外孕患者，张凌翔为其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术后护理也相当仔细，当天患者一切正常。但是，第二天护士急匆匆跑来向她报告，患者突然发作剧烈腹痛，情况很严重，又查不出原因，弄得当班医生与护士们手足无措。张凌翔急忙赶到病房，只见患者双手抱头，哭哭泣泣，痛苦不堪；精神恍恍惚惚，说话语无伦次，让人莫名其妙。张凌翔详细地询问了护士和陪护，了解了各个细节，才知道昨天晚上患者与丈夫吵了一次嘴，丈夫对她不但没有安慰和温暖，还发了一通埋怨。此后患者就开始闷闷不乐，再到腹痛突然发作，又发展到精神恍惚。张凌翔恍然大悟：患者本来就有很大精神压力，心情郁闷，与丈夫一吵，更加受了刺激，“瘧症”发作。于是，她坐在床边，温情地拉着患者的手，从对患者的理解与深深同情出发，和风细雨，娓娓道来。患者越听，越觉得遇到了最贴心的知己，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情绪也随之由“狂风暴雨”渐渐转化为“波澜不惊”，腹痛也很快缓解，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同事们都羡慕地说：“张姐，你也教教我们催眠术吧！”

许多患者也亲切而尊敬地对张凌翔说：“张医生，只要一看见你，俺的病就好了一半！”也有的说：“只要俺坐在你这里，心里就觉得踏实！”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从正式走上学医、从医的道路至今，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20多个春秋，张凌翔把几乎所有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了事业中。按一般要求与标准，她所取得的成就，也可谓之“功成名就”。闲暇时间，工作之余，同年代的姊妹们也时不时会聊上几句：“该干的工作都干了，家中的孩子快上大学了，美好的青春年华也过了，再过几年年纪也更大了，要是有了空闲时间，也该歇歇了，出去旅旅游观光，或者学学棋琴书画，放松下紧张了几十年的神经吧！凌翔姐，你什么打算呀？”每当此时，张凌翔心中不但没有轻松感，却更增加了紧迫感。她原以为这些年已经学习了不少的知识，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是面对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却越来越觉得自己脑子中反而越加空虚；原以为这些年治好了数不清的患者，也算尽了力尽了心，可是一想起还有无数患者对她充满着期待与信任的目光，又觉得肩膀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她原来还认为从医只是为自己谋一份职业，现在却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是从骨子里喜欢和离不开这个职业，当一个更好更优秀的医生，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已经成为她心中要为之奋斗一辈子的目标！

于是，她用发自心底的口吻回答：“到了那时，我呀，最大的愿望是寻找一位中医大家，从头拜师学艺，好好读书，当一名更好更合格的医生！”



● **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斌对全市地方史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7月17日，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斌对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报送的工作报告作出了重要批示。

孟庆斌在批示中指出：“地方史志是发掘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绵延千载、重在致用。临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杰地灵，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史志工作，集社会之力，修精品佳作。近年来，全市史志系统的干部职工，为传承沂蒙文化、弘扬沂蒙精神，在志书编修、年鉴编纂上尽心尽力，埋头苦干，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下一步，希望全市广大史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牢记使命，潜心研究，全力以赴完成“三全”任务目标，切实推动我市地方志工作不断上台阶上水平，全力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史志人的智慧和力量。”

● **市史志办专题研究学习贯彻孟市长批示和指示精神。**7月17日，中共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斌同志对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报送的工作报告作出了重要批示。为学习贯彻落实好孟市长的批示和指示精神，市史志办党组及时召开党组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部署。

● **临沂市副市长张玉兰、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到省史志办汇报史志工作。**7月18日，临沂市副市长张玉兰，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一行，到省史志办汇报史志工作。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听取了汇报。

● **临沂市副市长张玉兰对全市地方史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7月27日，

张玉兰副市长对市史志办报送的工作报告做出了重要批示。批示中指出：“临沂史志办工作有思路、有创新，各项工作推进力度大、落实力度大。干部职工自我加压、积极作为，工作中抓难点、抓亮点，成效显著，为临沂的史志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 **《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沂蒙精神志》《沂蒙精神概览》编纂人员座谈会召开。**8月27日，《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沂蒙精神志》《沂蒙精神概览》编纂人员座谈会在临沂召开。会议由省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李刚主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临沂市副市长张玉兰出席会议并讲话，临沂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汇报了志书编纂情况。其间，临沂市委副书记张宏伟会见了刘爱军主任一行，并就史志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 **市史志办召开方志馆布展工作推进会。**7月11日下午，市史志办召开方志馆布展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方志馆布展现场，对布展线路、板块流程、展板设计等进行了探讨交流。听取了方志馆建设情况、布展装修进度，对方志馆总体表示肯定，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意见建议。刘志强主任作了总结发言。

● **临沂市史志系统组织收看冀祥德做客人民网访谈。**7月12日上午，临沂市史志办组织全办人员收看了中指组秘书长，中指办党组书记、主任冀祥德做客人民网访谈实况。

● **《郯城县志（2000—2013）》志稿评审会召开。**8月27日，《郯城县志（2000—2013）》志稿评审会在郯城县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

军，临沂市副市长张玉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市及各县区史志办负责人参加会议。

● **《平邑县志（1989—2013）》志稿评审会召开。**8月28日，《平邑县志（1989—2013）》志稿评审会在平邑县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临沂市副市长陈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等省、市、县史志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 **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来我市调研二轮修志工作。**8月7日至9日，省史志办副主任李刚、市县基层志编纂指导处二级调研员杜泉到兰山区、郯城县、罗庄区、河东区、平邑县督导调研二轮区志编修工作，临沂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副主任唐少清等陪同调研。

● **市史志办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8月20日，市史志办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了“慈心一日捐”捐款活动。

● **费县在全省“三全”目标推进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近日，全省史志工作半年总结会议暨“三全”目标推进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费县政协副主席、史志办主任刘露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 **沂水史志人物张德庆获各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8月18日，沂水县史志开发利用服务基地负责人之一、沂水县沂蒙乡医文化展览馆创办人、临沂市“最美乡医”张德庆大夫祖孙四代乡医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健康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无私奉献的事迹被人民日报、新华网、齐鲁晚报、临沂日报等各大主流媒体、网络等宣传报道，这是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唯一一个图文并茂全面介绍的沂水史志人物。